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

06 第六期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目錄

| | |
|--------------------------------------|-----|
| 清乾隆年間朴仔籬土牛界溝的設立、維護 與修葺的研究..... | 1 |
| 菲律賓參與東南亞區域整合的歷史與發展..... | 31 |
| 唐代的蒲津關與蒲津橋..... | 57 |
| 學術史脈絡下的竹塹研究回顧..... | 99 |
| 唐詩中三都內、外關道..... | 139 |
| 1937年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 對中國的報導 | 215 |

清乾隆年間朴仔籬土牛界溝的設立、維護 與修葺的研究

池永歆*

摘要

清官方為防漢人侵墾台灣內山生番地，並防漢人奸棍窩藏於該地，或生番越界侵擾漢民，清初起屢有豎石以定番界之議。官方想以此人文界線作為劃定疆界、隔離族群的措施，而圍定其於台灣的統治空間。自乾隆朝起，這些措施，展現出官方治台的理想化族群政治理念；而其具體景觀，則是當時曾設立的漢番界碑與土牛界溝。此外，多幅圖像化的番界圖繪製，則作為帝國所認可之能對台灣邊區空間掌控的明證。

清乾隆26年1月年間，朴仔籬區域設立番界，並興築土牛與溝界，以實踐官方的族群政治理念。「岸裡大社文書」中留存多份文本，論及朴仔籬的土牛界溝；這是當前最具體地論及土牛界溝的文獻。本研究行文中，除略述朴仔籬土牛界溝設立的番界政策背景外，將進而根據相關文本，探討岸裡社群如何在官方的命令下，執行土牛與溝界的維護與修葺工作。

關鍵詞：朴仔籬、番界、土牛溝界、岸裡社群

* 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任教授。通訊作者：池永歆，621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E-mail：james@mail.ncyu.edu.tw。

Building and repair of the Tu-niu Ditch in Poaly region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in Qing dynasty

Yeong-Shin Chyr**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in Qing dynasty, the Qing official set up aboriginal boundary and built Tu-niu Ditch【土牛溝】 in Poaly【朴仔籬】 region, so as to achieve Qing dynasty's ethic politics ideas.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Archive of An-li-she【岸理文書】 to study the building and repair of the Tu-niu Ditch.

Keywords : Aboriginal boundary, Poaly, Tu-niu Ditch, An-li-she (An-li trib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清官方為防漢人侵墾台灣內山生番地¹，並防漢人奸棍窩藏於該地，或生番越界侵擾漢民，自康熙末葉起屢有官員提出設立界石、界碑或挑築土牛溝景觀以定番界之議²。隨後於乾隆年間，又多次具體「釐定民番地界」。此時的番界政策，演變成了實踐福建布政使高山所主張之「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的族群政治實質作為³；即番界係用以固定生番、熟番與漢人生存空間的人文界線，以之作為劃定疆界、隔離族群的措施，而固定其於台灣的統治空間。番界措施，具體展現出清官方治台的族群政治理念⁴。這種理想化的族群政治理念，自清初起，曾以不同形式內涵，具體被實踐在台灣沿山的邊區空間。原先於康熙末葉議定的界址、界碑，隨漢人越界入墾屢有變動，官方自乾隆中葉起逐漸地將其往沿山邊區地帶勘定，這現象在中北部最為明顯；最終以多幅圖像化的番界圖繪製，作為帝

¹ 本文所稱之「熟番」、「生番」、「番害」，並無任何族群歧視的意涵，而是將其置回古文書的文本，而稱之。清官方對原住民的劃分，常以有無「內附輸餉」、「服教化」、「服從徭役」為標準。在清官方的用語中，熟番、化番（歸化生番）與生番，各具有其法律上的意義：「熟番」指的是歸順官方、遵服教化、服從徭役與輸納餉課的原住民，主要指住在平原區的平埔族群而言；而「生番」與「野番」，則是對未遵教化、服徭役與納餉課的原住民稱呼，大部分是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此外，「歸化生番」或「化番」就是：輸餉，但不薙髮、不衣冠、不服徭役的原住民族。「熟番」為清朝子民；「生番」、「野番」、「化番」或「歸化番」，則非清朝子民。

²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167；《清高宗實錄選輯》，頁51、79、118、126。《台海使槎錄》「番界」一節中有曰：「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當是現存對台地番界的最早的紀錄。

³ 資料來源：《清奏疏選彙》，頁41。高山的奏疏題為「陳台地事宜疏」（頁39-44）

⁴ 有關清治台期間的族群政治策略，可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國對台灣邊區空間掌控的明證。而現存於石岡土牛國小的「朴仔籬漢番界碑」、作為地名的「土牛」，即是清代族群政治具體化的景觀，訴說並見證著這段歷史。

現存清官方文獻論及台灣番界的文本，大都指陳番界的政策面，少見其對政策施行過程的具體描述。然已刊行的「岸裡大社文書」中，尚留存多份論及朴仔籬土牛界溝的文本，有助闡釋番界政策於該地方的具體施行過程。換言之，透過在地的具體文獻，闡述具歷史地理意涵之景觀的內涵，以之深化地方歷史的了解，此即本文撰述的主要目地。以下行文，本研究將首先藉由官方文獻，略述清初治台所擬定的番界政策，鋪陳朴仔籬土牛界溝設立的歷史背景；隨後引述「岸裡大社文書」談及朴仔籬土牛界溝的文本，以之了解官方如何要求岸裡社群進行該番界的挑築、維護與修葺等工作。

貳、清初治台的番界政策：朴仔籬土牛界溝 設立的背景

自康熙以迄光緒年間，隨著漢人高度經濟取向的墾闢活動的挺進，使得界內邊區空間迅速地往界外地擴張，逐漸地深入到隸屬內山原住民的傳統活動領域。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瓚於康熙 61 年 6 月（1722 年 7--8 月）抵台，隨後巡行各地、考察民俗風情（1722-1724）。爾後，他根據巡台期間的見聞，完成的《台海使槎錄》「番界」一節中，就明白地指出漢人遭原住民殺害的本質⁵：

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盧殺人，視為故常；其實起釁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佔侵，

⁵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67。

不奪不饜；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鹿麂，往往據為己有，以故多遭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

黃叔璥所言，儘管是其於康熙、雍正年間其所見之漢人「利在開墾」、「越界佔侵」，因而多遭生番殺戮的情況；但在漢人為獲取土地使用權或取得自然資源之趨利心的驅使下，此一現象延續於整個清治台期間。為遏止此一情勢，黃叔璥提及：「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此時，官方議定在台灣沿山邊區空間設立界碑，嚴禁漢人越界活動；半線地區議定設番界的地點有：「半線之投揀溪澗、貓霧揀之張鎮莊」兩地⁶。

隨後，藍鼎元在《東征集》的〈覆制軍遷民劃界書〉中，曾引述清廷「劃界遷民」的檄文⁷：

……台、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令遷移他處；田地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濠塹，永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

藍鼎元顯然不甚贊同此般作法，而對此檄文提出更為周慮的看法。兩相對照之下，可看出黃叔璥所謂「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的番界主張，頗符合藍鼎元所引述之「劃界遷民」的檄文說法。當時立界

⁶ 資料來源：《台海使槎錄》，頁 167-168。

⁷ 資料來源：《東征集》〈覆制軍遷民劃界書〉，頁 40。

的目的，是要使得漢人無法窩藏於界外、生番亦不能出界為害，由之進而區隔漢人與生番的生存空間。

番界政策的落實，始於乾隆朝初葉；不難想見該時漢人「利在開墾」，而大規模往沿山邊區「越界佔侵」的情況應甚為普遍。據《清高宗實錄選輯》所載，在乾隆朝設屯之前，就曾有多份釐定番界或劃清界限的奏議。

福建布政使高山於乾隆 9 年 12 月 18 日（1745 年 1 月 20 日）上呈〈台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奏摺⁸，提出：

……番民地界之宜，照舊劃清也。……臣於清查莊產之便，順途勘驗。覺從前所立之界，並無山河依阻，易於無憑；但日久相延，又未便紛更改易。相應飭令地方官遴委佐雜，眼同各番土目指出現在管理分界之處，再行立表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清界而後，漢民毋許深入山根，生番毋許擅出埔地；則彼此屏跡，斷絕往來，自不致生釁滋事矣。

此奏摺對於清官方想透過番界政策，而厲行族群政治策略，提出具體且明晰原則。「照舊劃清」的原則，似乎要求依循先前官員清釐、勘界的成果，由地方官隨同各番土目，指出「現在管理分界」的地點，「再行立表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之議，成了清官方構想台灣族群空間分佈理想化的形式⁹。

⁸ 資料來源：《清奏疏選彙》，頁 39-44；《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21 冊，頁 424-437。兩份文本相對照，內文稍有差異。引文已根據《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稍加修正。

⁹ 有關此種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敘述，可參閱：柯志明，〈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台灣史研究》，22 卷 2

乾隆 11 年 5 月 13 日（1746 年 7 月 1 日），戶部議覆「閩浙總督馬爾泰等議奏布政使高山條奏台地民番事宜」有載¹⁰：

番社地界，從前地方官原各查禁，而奸民不顧戕殺，每覬侵越，僅委佐雜微員，不足彈壓。應令地方官，於農隙親勘，傳同土目、通事、鄉保、業戶，立表定界，統限一年內，造冊報竣。

亦即戶部要求地方官親履會勘、並「立表定界」，於一年內完成造冊。前述高山於乾隆 9 年年底的奏摺裡提及「番民地界之宜，照舊劃清也」，即建議不要對舊定界做太大的變動，應被遵循。或即，可視此次的番界勘定，為承襲康熙、雍正時的舊界，而略作調整。

乾隆 15 年 7 月 2 日（1750 年 8 月 3 日），戶部等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定台灣府屬廳縣生番地方界址」¹¹。隨後在乾隆 23 年 3 月（1758 年 4 月）閩浙總督楊應琚奏「酌定防範台灣事宜」：「台民墾種，侵越熟番地界，應查明挑溝，畫清界限」¹²。此次要清查的要點，是漢人侵墾熟番土地的問題，並建議要挑築土牛溝，以之定界。

乾隆 25 年 8 月 3 日（1760 年 9 月 11 日），閩浙總督楊廷璋上奏〈台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奏摺¹³。他表明：「台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酌定章程，以垂永久」；即自乾隆 15 年（1750）閩浙

期（2015 年），頁 45-110。

¹⁰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51。

¹¹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79。

¹² 資料來源：《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118。

¹³ 資料來源：《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第 44 冊，頁 200-212。此奏摺較為精簡內容，亦載於《清高宗實錄選輯》，〈楊廷璋條奏「清釐清釐台屬邊界，酌定章程」〉，頁 126-127。

總督喀爾吉善「清查定界」，繼任總督楊應琚奏明後，委由台灣鎮道率地方官「遍歷查勘」，最後在楊廷璋擔任閩浙總督時完成清釐，進而要「酌定章程」。此章程共分四項，有關當時番界部份提到：「台灣、鳳山、諸羅三縣界限井然，並無私越，番民歷久相安，毋庸再為更定」；即這三縣，因「無私越，番民歷久相安」，因此無需變動；而彰化縣與淡防廳則因「侵墾漸近內山，每致生番逸出為害」，因此擬定多種劃定番界措施（挖深溝、堆築土牛）。他對於彰化縣與淡防廳兩處處設立番界的處置方式，有明確的論述¹⁴：

台郡彰化縣沿山番界，年來侵墾漸近內地，生番逸出為害。今據該鎮道勘明，於車路旱溝之外，各有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遠劃界。其與溪圳不相接處，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為界。至淡防廳一帶，從前原定火焰山等界，僅於生番出沒之隘口立石為表，餘亦未經劃清。今酌量地處險要，即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

由此奏文可獲悉：彰化縣與淡防廳兩地的番界，係以現有的車路旱溝、溪溝水圳與外山山根，這些地形景觀為分界；若無現存地形景觀者，則以挖溝、築土牛為分界。

楊廷璋所擬定的番界清釐與勘定章程，即是朴仔籬漢番界碑與土牛界溝設立的憑藉【圖一、照片一】。

當前位於石岡土牛國小的朴仔籬的漢番界碑，設立於乾隆 26 年 1 月（1761 年 2--3 月）¹⁵，立碑者為當年的彰化知縣張世珍【任期自乾隆 23 年 3 月起、迄 26 年 5 月（1758--1761）】。本石碑的重要性，

¹⁴ 同上註。

¹⁵ 此界碑歷多次遷移，最後才安置土牛國小校園內。。

在於透過碑文，可清楚獲悉乾隆朝所擬定的土牛、溝界景觀的實質大小。番界不再是單純的人文分隔線，而是具體的景觀、據族群政治意義的景觀。石碑的文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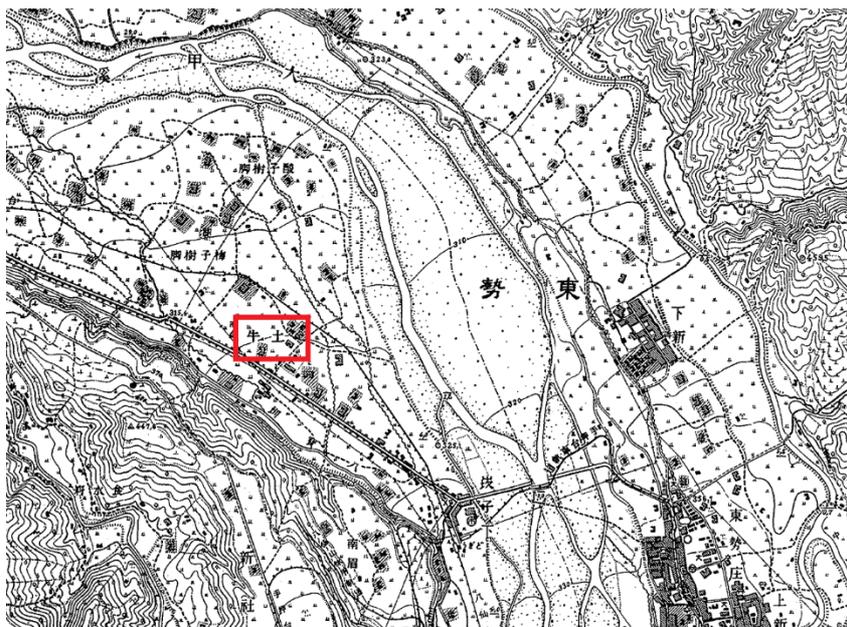
奉憲勘定地界，勘定朴仔籬處，南北計長貳百捌拾五丈五尺，
共堆土牛壹拾玖個，每土牛長二丈、底闊壹丈、高捌尺、頂闊
陸尺，每溝長壹拾伍丈、闊壹丈、深陸尺，禁人民逾越私墾。

乾隆貳拾陸年正月 日 彰化縣知縣 張立

由於預定設立番界的朴仔籬空間周遭，並無「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等實質地形景觀，因之以人工方式「挑挖深溝，堆築土牛」作為番界。

由碑文可獲悉，當時官方對於土牛溝界有如下規定：朴仔籬溝界南北長有 285 丈 5 尺（約 857 公尺），共堆築長 2 丈（6 公尺）、底寬 1 丈（3 公尺）、高 8 尺（2.4 公尺）、頂寬 6 尺（1.8 公尺）的土牛 19 個，預計土牛之間築有多條長 15 丈（45 公尺）、寬 1 丈（3 公尺）、深 6 尺（1.8 公尺）的深溝。不過根據「岸裡大社文書」所載，土牛溝界實際長度為「西南自北，朴子篤山小根橫截至大甲溪洲，計長二百八十九丈五尺」¹⁶，總長約為 869 公尺；此外，根據當時所繪的圖幅所示，最後並未在土牛前後之間挖掘多條長 15 丈的深溝，而是在土牛西側處，築出西南向北的界溝【圖二、圖三、圖四】。

¹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45-01。



【圖一】朴仔籬漢番界碑與土牛溝界位置圖

資料來源：《台灣地形圖》(1925)「東勢」圖幅。



【照片一】921 地震前置於石岡土牛國小的朴仔籬漢番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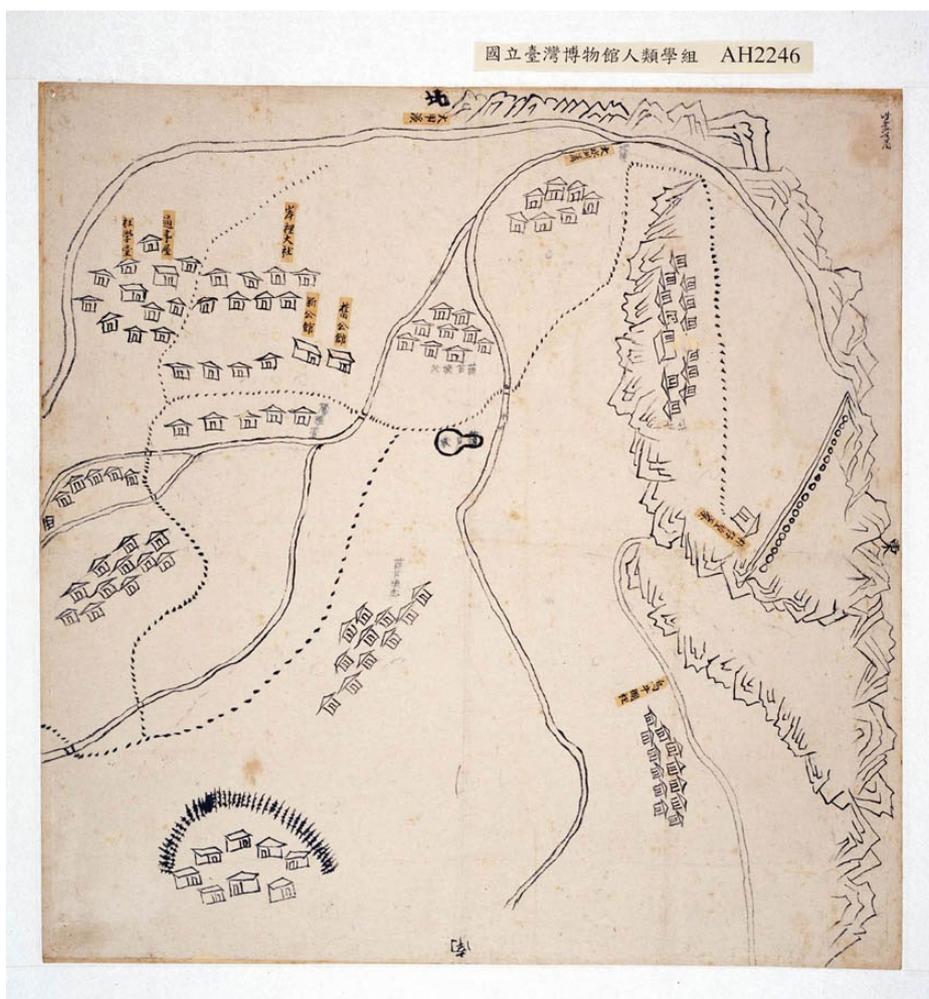
拍攝日期：1994 年 10 月 25 日。



【圖二】乾隆中葉朴仔籬東方的土牛溝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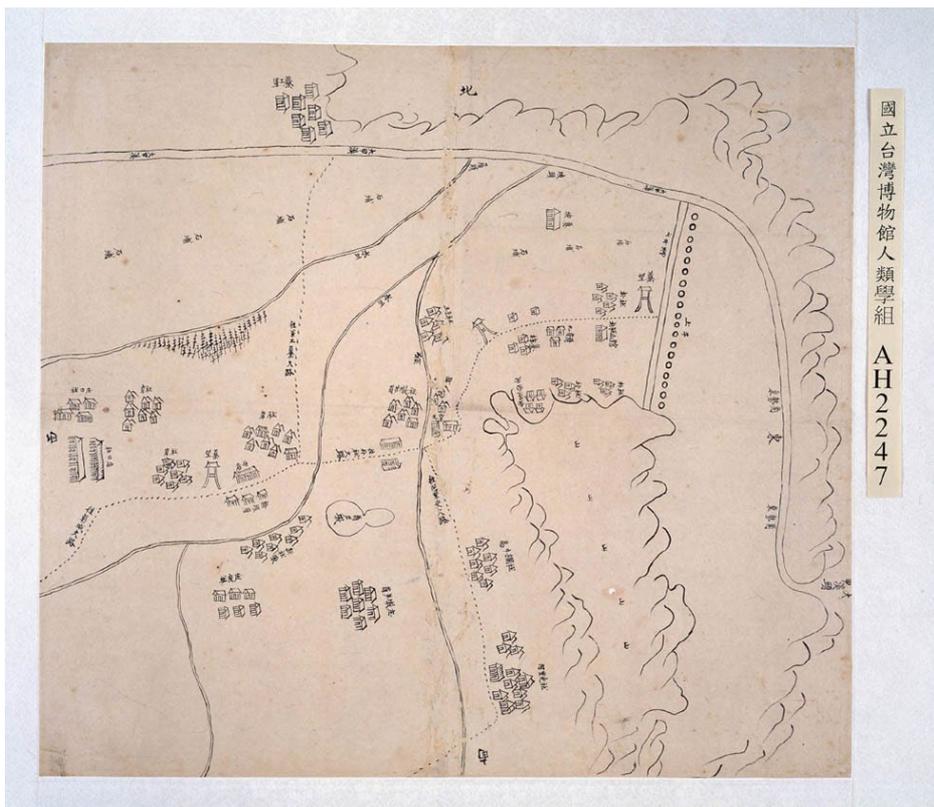
說明：此圖繪製的確切時間不詳，應為乾隆 26 年（1761）設置界碑後所繪；因軍工寮未遷到朴仔籬社域，由此可推測：繪圖時間大約為乾隆 26 年迄 32 年（1761-1767）之間。圖片上特別標明「土牛十九個」，符合界碑所言。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49。



【圖三】乾隆中葉東勢角土牛略圖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46。



國立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組 AH2247

【圖四】乾隆中葉岸裡大社及附近土牛、軍工寮圖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博物館，「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AH2247。

參、圖像化的番界：圖幅上的朴仔籬土牛溝界

清官方所繪多幅台灣番界圖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意涵，就在於其象徵地傳達出乾隆朝期間，帝國官員欲以抽象的地圖，建構出台灣邊區空間的圖像，以之彰顯帝國權力得以對殖民空間進行掌控；並透過漢字的地名命名與書寫，官員自認能為邊區空間建構一套帝國的秩序：土地、資源與人群，均能受帝國掌握——由之確認其於邊陲地台灣的統治邊界，另一方面也滿足遙遠的帝國核心官員對台灣的想像。

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於乾隆 55 年 9 月 28 日（1790 年 11 月 4 日）上呈的〈籌議台灣新設屯所分撥埔地事宜〉奏摺，對於台灣番界的清釐、立碑以及番界圖的繪製，有詳細說明¹⁷：

自乾隆十五年及二十五年節經勘定界址，禁民越墾。復於四十九年，經前督臣富綱奏明清丈。

雖於乾隆十五及二十五等年兩次立碑，並於淡、彰二廳設立土牛以分界限，因閱年既久，日漸廢弛。自應遵奉部行，劃定界址，庶可束邊境而杜爭端。茲據台灣鎮、道等請以此次清查歸屯地段為準，或抵山根，或傍坑坎，令地方官揀用堅厚石料，豎立碑界，詳開年月地方，大書深刻。並稱存檔原圖，從前以紅、藍、紫色畫線為界，今即添畫綠線，以別新舊。

由此段引文可獲悉：清乾隆朝期間，曾於乾隆 15 年（1750）、乾隆 25 年（1760）、乾隆 49 年（1784）以及乾隆 55 年，分四次清釐界外

¹⁷ 資料來源：《台案彙錄甲集》，〈閩浙總督伍拉納奏為籌議台灣新設屯所分撥埔地事宜摺〉，頁 1、15。

土地；而四次清釐後的成果，則分別繪以紅、藍、紫、綠線為界的番界圖而呈現。

由覺羅伍拉納的奏摺來看，似乎清官方想透過番界清釐以及番界圖，達成其對於臨近番界之邊區空間的了解與有效掌控，並有助於隨後而來之屯制的落實。番界圖所再現的台灣沿山景觀，無疑代表了清官方形式上已掌握這些空間。

番界藍線圖，常被稱為「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或「清乾隆二十五年台灣番界圖」¹⁸。該圖面番界繪有紅線和藍線，是乾隆 25 年（1760）閩浙總督楊廷璋、分巡台灣道楊景素完成清釐番界、堆築土牛溝後，根據查勘清釐的成果所繪製，或即以圖像化方式作為勘定界址、立碑的具體成果展現。其繪製的確切年代不詳。學者蘇峯楠根據圖幅上的圖例而推論，認為其可能完成於乾隆 31 年（1766）之後¹⁹。該圖的圖首處載有：「圖內民番界址，以紅線為舊定界，以藍線為新界。臺、鳳、諸三屬用紅線，源其舊也。淡防屬向無通身畫界，只山口設碑耳，今依新訂界用藍色。彰屬則于舊界之外，間置新界，故紅藍線並用……」²⁰；可見彰化縣轄空間的番界多有變動，因而新舊番界同繪於圖上。朴仔籬土牛界溝以藍線繪製，表明其為乾隆 25 年（1760）新勘定的番界【圖五】。

隨後，可能繪製於乾隆 46 年迄 52 年之間（1781--1787）的「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圖幅上亦以紅線、藍線標誌不同時期的番界，

¹⁸ 資料來源：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 期（1991），頁 46-50。

¹⁹ 資料來源：蘇峯楠，〈清治台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台灣史研究》，22 卷 3 期（2015），頁 35-36。

²⁰ 資料來源：「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載於：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 期（1991），頁 46-50。

年代晚於乾隆中葉的番界藍線圖，但約略與番界藍線圖相近²¹。圖幅上對朴仔籬土牛界溝的描繪，甚為簡略，不具參考價值。

乾隆 49 年（1784）的「番界紫線圖」，原題名為「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圖幅上以紅線、藍線以及紫線，描繪出不同時期的番界；其對台灣地表景觀的呈現，則置焦於描述沿山邊區空間。根據柯志明在〈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一文中縝密的考證，確定本圖說的由來是：乾隆 49 年 4 月（1784 年 5--6 月）起，經閩浙總督富勒渾奏准、由卸任臺灣道楊廷樞主持清釐界外土地私墾的工作，隨之各廳縣展開清丈界外已墾田園、未墾荒埔與勘界，根據任務完成後的資料所繪製的地圖；而圖幅上尚未定案的界線則繪為紫線。因之而有這幅台灣番界紫線圖²²。此外，本圖幅最上部有一萬四千多字的四縣一廳圖說，詳述清丈、劃界後對於界外土地的處分，如准墾或禁墾等。因之，「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就是當時為杜絕因爭墾邊區土地所引發之糾紛，而全面對界外地清釐、並加以定界的具體成果²³。將此圖與「清乾隆二十五年台灣番界圖」（番界藍線圖）相比對下，可看出番界紫線圖，係以番界藍線圖為底圖，添加當時詳加清釐界外地所得資料後，繪製而成；可視為是乾隆 49 年全面清釐番界內外空間成果的圖像化產物。

²¹ 資料來源：葉高華，〈導論〉，《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頁 11-34（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7）。

²² 資料來源：柯志明，〈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台灣史研究》，22 卷 2 期（2015 年），頁 48-49、68-70。

²³ 資料來源：（1）林玉茹，〈「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與十八世紀末的台灣〉，《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林玉茹等主編】，頁 14-46（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5）。（2）林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的台灣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台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台灣史研究》，19 卷 3 期（2015），頁 47-94。

因之，此圖可更具體呈現乾隆 25 年迄 49 年之間（1760--1784），將近 25 年期間界外空間的變遷²⁴。番界紫線圖的文化意義，凸顯出乾隆朝末葉時，大清帝國所認定之台灣邊區的圖像，以之確認其於台灣的統治空間。

「番界紫線圖」圖幅上，以藍線與紫線，標誌出舊的朴仔籬土牛界溝（「挑溝築土牛」的舊界），以及依據「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為原則，所清釐勘定的新番界。先前位於溝界外、毗鄰大甲溪的階地土牛角埔地，圖幅上註有「小米田」；此次勘界後，被劃歸紫線以西的新增界內地，並載以「請墾」字樣。該地常被稱之為「鹿皮小米餉」埔地²⁵。其地名由來，始自屋鑿等社於乾隆 31 年（1766）歸化清朝起。當時岸裡社通事潘敦為籌措屋鑿等社的餉稅，而在土牛溝外以權宜的方式設置「鹿皮小米餉」埔地，隨後並招漢佃進行墾闢，由此引發一連串的爭議事件²⁶。圖幅上所載「圖說」，詳列此次清丈、劃界後，對於朴仔籬土牛界溝外的私墾土地，所做處分，有助於了解此次勘界後，當地地權空間變化狀況【圖六】。

²⁴ 資料來源：林玉茹，〈「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與十八世紀末的台灣〉，頁 14-16、21-22。

²⁵ 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頁 93。《東瀛識略》（卷二稅餉）對於「鹿皮小米餉」有如是說明：「鹿皮、小米餉，皆徵之歸化生番；以番之捕鹿獻皮並有獻小米者，名其餉也。鹿皮每張折輸銀二錢四分；淡水番社有獻獐皮者，折輸銀數與鹿皮同。小米，惟彰化社番獻納，每石折輸銀六錢」（頁 21）。

²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65-01；AL00951：066-01；AL00951：070-01；AL00952：070-01。



【圖五】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鄰近「朴仔籬」圖幅

資料來源：「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



【圖六】「番界紫線圖」圖幅上的朴仔籬番界

資料來源：《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

肆、朴仔籬土牛界溝的挑築、維護與修葺

乾隆 49 年（1784）後，朴仔籬番界往東遷定，而依「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為界；因之作為番界之朴仔籬土牛界溝的實質作用，始自乾隆 26 年 1 月設立起、迄乾隆 49 年（1761-1784），這 23 年期間內。「岸裡大社文書」留存多份論及朴仔籬土牛界溝的文本，將有助於了解土牛界溝如何挑築、維護與修葺等事務。

最早提及朴仔籬土牛界溝的文本，係貓霧揀巡檢司戴宏度於乾隆 26 年 8 月 20 日（1761 年 9 月 18 日），所開立的差票²⁷【圖七】；此差票對於官方議決的挑築土牛溝措施，以及朴仔籬土牛界溝的維護與修葺，有如下具體說明²⁸：

……本年八月十一日，蒙 本府憲余 檄開照得淡彰所屬勘定民番界址，劃出界外各處禁地，挑挖深溝、堆築土牛及溪圳定為界限一案。乾隆廿六年四月初一日，蒙 憲檄行奉准 部咨，飭令每年二、八兩月，就近委員前往挑溝、築牛及溪圳各處所費辦，逐加查勘，如有坍塌，即令該廳縣就近派撥佃民及時挑築，仍令該委員于勘竣後，將某處俱係完整、某處已有坍塌，知會地方官挑築緣由，申報 道憲查考等因，移行遵照在案。茲屆八月之期，除將勘定界外禁地、挑溝築牛及溪圳定為界限，各處所開單委員笨港縣丞前往查勘外，合就行知，為此票仰該縣官吏照依事理，即便查照妥辦，毋違等因。蒙此合就飭行。為此票仰該司官，攢照依事理速將朴仔籬、沙歷巴來

²⁷ 戴宏度自乾隆 24 年（1759）6 月起、迄 27（1761）年 5 月，擔任貓霧揀巡檢司。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60。

²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02-02。文本中的「本府憲余」，係台灣府知府余文儀。

積之界外禁地，挑挖深溝、堆築土牛及溪圳定為界限，各處所立，即親往查勘溝牛何處完整、何處坍塌，逐一查明明晰，開具清摺申繳。一面就近派撥佃民及時挑築，毋得遲延，火速以須票等因。蒙此合飭挑築。為此單仰岸裡社通事敦仔，速將朴仔籬界溝、土牛所有坍塌之處，立即派撥社番及就近佃民，照舊修築完整，限三日內報竣，赴 司以憑，親臨查勘。如番佃疲玩，立即稟報究處。事關委員詣勘在即，該通事毋得草率延悞……。

朴仔籬土牛界溝的修築，理應在漢番界碑於乾隆 26 年 1 月立碑之前就已完成。據此差票，可歸納出官方對於朴仔籬土牛界溝的維護與查勘的要點：(1) 每年委由笨港縣丞在二、八兩月前往土牛界溝進行查勘；(2) 土牛與界溝的維護，原先議定由在附近墾耕的「佃民」負責，不過照實際的施行狀況來看，其維護與修葺，最終成為岸裡社通事潘敦需負責的要務，對岸裡社民而言，想必是一項負擔²⁹。當年的 8 月 27 日（1761 年 9 月 25 日），潘敦上呈給戴宏度的稟文，提及：他已經「立撥衆番，速將朴仔籬界溝土牛所查，凡有坍塌之處，照舊修築完固」³⁰。隔年 2 月 5 日（1762 年 2 月 28 日），戴宏度亦發差票，要求通事與土目要去查勘、修葺土牛溝界³¹。隨後，每年二月、八月，岸裡社需調派社番從事土牛溝界「坍塌之處」的「修葺整固」，應成為常態工作。

²⁹ 潘敦（生年不詳、歿於 1771 年），其原名音譯為敦仔阿打歪，漢名潘敦或潘敦仔，為岸裡社群頭目。他於乾隆 23 年（1758）11 月被任命為岸裡社第一位非漢人通事【第三任】，迄 36 年（1771）病逝止，在任 12 年多。資料來源：《台灣歷史辭典》網路版，「潘敦」條目（許進發撰）。

³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07-01。

³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20-02。

乾隆 30 年 9 月 20 日（1765 年 11 月 3 日），貓霧揀巡檢司程鏜所開立的差票上³²，曾提及他與笨港縣丞查勘朴仔籬土牛溝界的結果【圖八】³³：

……朴子籬一處……查為部案，內堆築土十九個。近年拋該通土報稱，僅有土牛一十二個，尚有七個坐落何處，未拋聲名，該通土等朦混已極。

對於現場查勘的結果，程鏜顯然不滿意，因之要求官差立即前往當地查訪，並查明朴仔籬的土牛究竟堆築在何處、有幾個。隨後，潘敦應有遵照諭令，調派眾番堆築另 7 個土牛³⁴。

通事潘敦除需派撥社番維護土牛與溝界外，另也需不時地應付查勘番界之官差的無度需索。在乾隆 34 年 6 月 7 日（1769 年 7 月 9 日），貓霧揀巡檢司楊思聰開立的差票提及弓役陳金禧，曾向其作如下的稟告³⁵：

……再查朴仔籬土牛界溝，其中崩壞一。役屢次催趕修筑，詎該通事竟不理等情到司。拋所查此案業經務差查修去后，延今未據修竣。……

即通事潘敦多次拖延修葺土牛溝界一事，並對進行查勘之官員，不理不採。隨後楊思聰應有對此事，訊問相關人等。潘敦則有如下的辯

³² 程鏜自乾隆 27 年（1762）閏 5 月起、迄 30 年（1765）11 月，擔任貓霧揀巡檢司。資料來源：《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頁 60。

³³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45-01。

³⁴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55-01。

³⁵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2：081-01。

駁³⁶：

通事敦仔為索詐不遂反從稟陷事。緣蒙金諭飭着堂差陳金禧，仝幫夥查明朴仔篙界溝土牛，如遇被水沖崩之處，着敦派撥修築完固等因，敢不凜遵。但敦所管守朴仔篙界溝土牛，虽洪水漲大，敦先親到地查明，毫無損壞。只金差奉票到社，不管溝牛好壞，胆借查票，便要索詐差礼艮四員，方替敦稟明銷票；如無，即欲稟陷。奈窮番無措，差礼何從而出。詎料陳金禧果因索詐不遂，將無作有，遂袒詞稟陷敦等，竟不遵諭修理等詞……。

這張稟文雖未標明日期，但上呈的時間點，應為當年 6 月後。潘敦向官府具稟：官差陳金禧等人，每當奉令勘查溝牛時，不管土牛與溝界是否需修葺，都會索取「差礼艮四員」；若岸裡社不從，則會誣陷潘敦不聽諭令整修溝牛，因之不勝其擾。根據「岸裡大社文書」所示，官方派員查勘土牛溝界的相關文件，最後一筆為乾隆 36 年 3 月 21 日（1771 年 5 月 5 日），由巡檢司楊思聰開立的差票³⁷。

隨後潘敦曾多次透過關係，想要稟請官方「免勘土牛」³⁸。「岸裡大社文書」的文武衙門簿，載有乾隆 36 年 1 月岸裡社餽贈金錢，換取免勘土牛一事：「廿三日，揀司陳元夥記去艸鞋辦乙百文，為諸羅縣勘土牛之事。……廿六日，楊揀司去硃價艮十三員，為笨港分縣免勘土牛之事。……俱係為府憲委笨港免勘土牛事」³⁹。此外，在文武衙門簿載有乾隆 42 年 3 月 28 日（1777 年 5 月 5 日）「揀司王巡

³⁶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1：078-01。

³⁷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186-01。

³⁸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6：008-01、AL00956：03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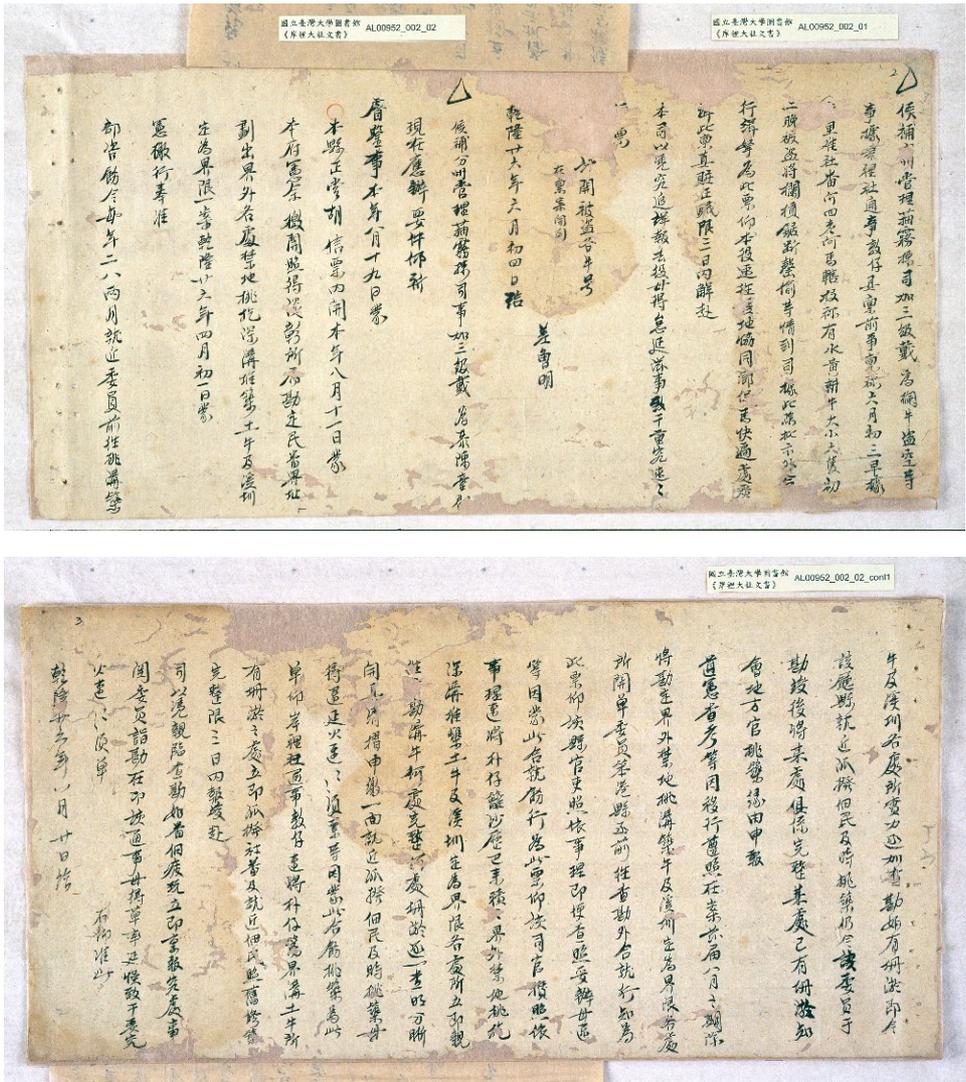
³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6：036-01。

爺去艮十一員，土牛報竣用，三管事出」⁴⁰。岸裡社為了「免勘土牛」，所耗費的費用，對該社而言，想必是一大筆額外的開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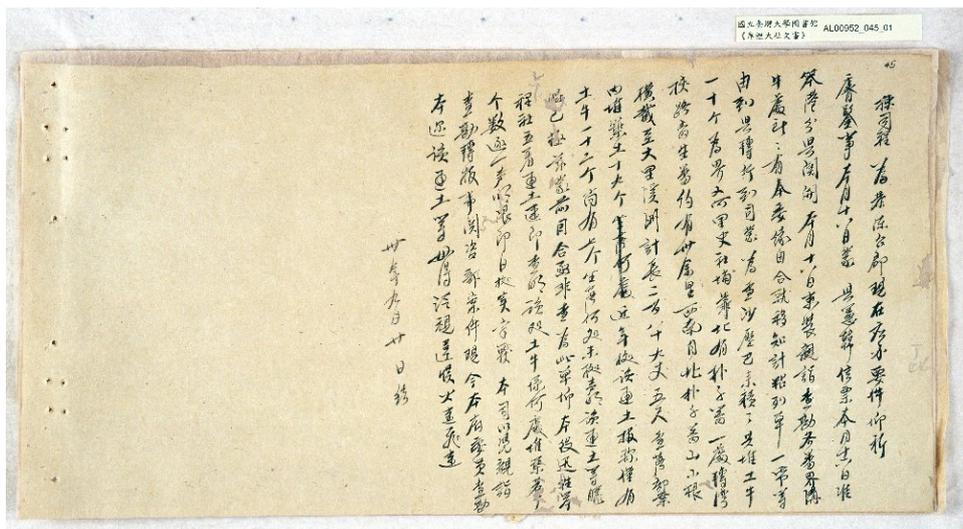
自乾隆 36 年以後，未見官方諭令通事維護溝牛或官方查勘的記載，是否潘敦動用關係，使得官方不再派遣笨港縣丞勘查溝牛的舉動見效，則未有文件得以證實。不過，促使官方不再諭令通事維護溝牛或到此查勘的最有可能原因或許是：自乾隆 35 年 2 月（1770 年 2-3 月）起，匠首就將朴仔籬軍工寮移往界外的東勢角，以方便採製軍需料件⁴¹；自此後，應無積極整修朴仔籬土牛溝界的實際需要。不過番界政策依舊存在，仍嚴禁漢人越界到東勢角界外地活動。

⁴⁰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6_091-01。

⁴¹ 資料來源：「岸裡大社文書」，AL00955：055-01、AL00955：081-01。



【圖七】乾隆 26 年 8 月戴宏度為整修與查勘溝牛所開出的差票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岸裡大社文書》影像檔，AL00952：002-02。



【圖八】乾隆30年9月20日貓霧揀巡檢司程鏗所開立的差票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岸裡大社文書》影像檔，AL00952：045-01。

伍、結語

現存於石岡土牛國小的「朴仔籬漢番界碑」景觀，係於清乾隆 26 年 1 月（1761 年 2--3 月），由當時的彰化知縣張世珍所設立，距今已屆 260 年。此界碑訴說並見證清帝國於乾隆朝期間，在台灣所屬行的族群政治政策。番界（界碑、土牛溝界）景觀，既作為大清帝國所認定之統治邊界，也具體展現出乾隆朝理想化的族群空間分佈理念，即高山所主張之「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的族群政治策略⁴²。

乾隆朝期間，多次的番界勘定、多幅番界圖的繪製，透過漢字的地名書寫，在圖幅上烙印下帝國權力的標誌；這一舉措，清楚地傳達帝國權力得以對台灣邊區空間進行象徵性地掌控，納入帝國的秩序。當然，另一方面遙遠的帝國核心官員，也可透過番界圖滿足其對邊陲台灣空間的想像。

本研究經由相關文本的論述，將朴仔籬漢番界碑景觀、地名「土牛」，回置其歷史地理背景，由此呈顯出界碑所深具的族群政治意涵。此一探究，將有助於了解界碑景觀所在地之石岡「土牛」的在地或地方歷史地理。亦即，對地方或在地的歷史地理闡釋成果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就是構成與再構成地方歷史以及地方過往的訴說，使得在地的各個文化群體，不僅能夠了解其自身的地理與歷史的認同，也了解到其他文化群體的地理與歷史的認同。這亦是本文對此主題所作闡釋的最大目地。

⁴² 資料來源：《清奏疏選彙》，頁 41。高山的奏疏題為「陳台地事宜疏」（頁 39-44）

徵引文獻

一、史料與地圖

「國立台灣大學藏岸裏大社文書」(複製紙本), 岸裏大社文書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1998)。

國立台灣博物館, 「岸裡大社文書」數位典藏影像檔。

【網址：<http://formosa.ntm.gov.tw/dasir/index.asp>】

國家文化資料庫, 「岸裡大社文」影像檔。

【網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載於林玉茹等編著, 2015, 《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載於葉高華編著, 2017, 《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解讀》, 台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載於施添福, 1991, 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 《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9：46-50。

《彰化縣志》, 台灣研究叢刊第48種。

《東瀛識略》(丁紹儀撰), 台灣文獻叢刊第2種。

《台海使槎錄》(黃叔瓚撰), 台灣文獻叢刊第4種。

《東征集》(藍鼎元撰), 台灣文獻叢刊第12種。

《台案彙錄甲集》, 台灣文獻叢刊第31種

《清高宗實錄選輯》, 台灣文獻叢刊第186種。

《清奏疏選彙》, 台灣文獻叢刊第256種。

《台灣地形圖》(1998年遠流出版公司複製)。

二、後人撰述資料

-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柯志明，2015，〈清代台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台灣史研究》，22（2）：45-110。
- 林玉茹，2015，〈「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與十八世紀末的台灣〉，《紫線番界：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林玉茹等主編】，頁14-46，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林玉茹、畏冬，2015，〈林爽文事件前的台灣邊區圖像：以乾隆49年台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台灣史研究》，19（3）：47-94。
- 葉高華，2017，〈導論〉，《十八世紀末「御製台灣原漢界址圖」》，頁11-34，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 蘇峯楠，2015，〈清治台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台灣史研究》，22（3）：35-36。

菲律賓參與東南亞區域整合的歷史與發展

陳希宜*

摘要

東南亞地區無論從地理面積、人口數、抑或區域發展而言，均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市場與焦點，然而不同於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的緊密聯繫，造就彼此間包括人民、貨品、交通往來的相對便利，菲律賓自成一個獨立群島，與其他東南亞地區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成員之間的差異頗大。

就歷史發展的脈絡而言，包括小至生活習慣、行事準則、社會文化思想與宗教信仰，大至國家政策、對外關係等等，菲律賓與東南亞多數國家總顯得格格不入，特別是自杜特蒂當選總統之後，菲律賓對外政策不僅急速轉彎，也對於參與區域內國際事務更顯積極。

本研究試圖分析菲律賓國內情勢與對外關係的發展，並聚焦於2014年至今杜特蒂當選總統前後的這段時間，外交政策的發展與改變，是否影響與周遭鄰近國家的關係？有利於菲律賓更加融入東南亞區域整合的發展中？

關鍵字：菲律賓、東南亞國家協會、區域整合、「一帶一路」倡議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助理教授

Th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ippines Engaging in Southeast Asian Integration

Angel, Hsi-I Chen**

Abstract

The Southeast Asia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largest markets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geographic are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Unlike mo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created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in people, goods, and traffic among each other due to the fact being geographically attached, the Philippines seems to be isolated from other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ASEAN members can be found in history, social development, lifestyles, religions, foreign policies and so on. However, ever since President Duterte has taken up the post, the Philippines has shown an active attitude in launching new foreign policies as well as engaging in the regional affair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 of the Philippines' domestic politics as well as foreign policies before and after President Duterte has taken up the post in 2014. The anticip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al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integration and the relations with nearby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such progress.

Keywords : The Philippines, ASEAN, Regional Integr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壹、前言

菲律賓人口成長率是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的成員中最高的，也是全球人口增加最快的國家之一。截至 2014 年 7 月 27 日凌晨，菲律賓的人口已突破一億，成為全球第 12 個人口超過億人的國家¹，而到了 2021 年 9 月，菲律賓人口已達一億一千萬人，佔世界人口的 1.41%²。菲律賓的人口委員預測按照目前的成長率預測到 2040 年菲律賓的人口應會超過 1.84 億人，晉升世界人口十大國行列，因此照理說，菲律賓應有成為東協領頭羊之一的實力之，但事實上，從現實層面而言，菲律賓並不是東協成員中經濟最進步、對外關係最活絡、影響力最深的國家。

從過去歷史的發展脈絡可知，菲律賓可謂是東南亞地區與其他東協成員差異性最大的國家，其差異性可從地理位置、生活文化以及從國家發展的脈絡中覺察：不同於其他東南亞國家邊境大多互相連接，人民、貨品、交通往來相對便利、緊密，菲律賓自成一個獨立群島，與其他國家在生活上的聯繫原本就較為薄弱，又一國之生活習慣、行事準則、社會文化思想以及人民的價值觀往往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然而菲律賓人民主要信奉天主教，不同於東南亞國家多數受到佛教思想或多神論的浸濡，因此始終顯得格格不入。

本研究試圖分析菲律賓國內情勢與對外關係的發展，並主要聚焦於 2014 年至今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當選總統前後的這段時間，

¹ 楊超，「圍繞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的菲律賓南海戰略轉向及其美國因素」，東南亞縱橫，第 6 期(2015 年 6 月)，頁 26。

² Philippines Population (Live), 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philippines-population/>

以理解菲律賓參與東南亞區域整合的現況與困難，以及未來展望。

貳、菲律賓國內的情勢與發展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內情勢穩定程度與經濟發展程進程將影響其參與區域整合活動的深淺，因此，若想了解菲律賓在東南亞推動區域整合之歷史發展中的參與以及影響，則應從其國內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現況與發展情勢中分析起。黃耀東評價菲律賓「政治基本穩定、但困難重重」：儘管政府近來來經歷了與反政府武裝的激烈鬥爭，包括穆斯林發起的獨立運動、與共產黨的鬥爭、與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恐怖組織份子的對抗³，但基本上政府軍依然佔有相對的優勢，足以掌控情勢，然而真正難以控制的，卻是來自政府內部的貪腐問題始終得不到改善，而其根本原因與其傳統社經結構有關。

回顧菲律賓民主體制的歷史與發展，均是建立在堅實的家族政治傳統上，這些政治家族不僅掌握著強大的影響力，且將這些影響力代代傳承。顏永銘估計約有 70%的國會議員均是出身於傳統的政治權貴家族，而總統、副總統更多是出自這些權貴中的權貴：例如，曾角逐第十六任副總統職位的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參議員為第十任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之子、第十五任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乃第十一任總統柯拉蓉(Maria Corazon Sumulong Cojuangco Aquino)之子、第十四任總統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為第九任總統馬嘉柏皋(Diosdado Pangan Macapaga)之女。此外，也因為家族勢力的護航，無論政績多麼不堪、

³ 黃耀東，「菲律賓：2014 年回顧與 2015 年展望」，東南亞縱橫，第 3 期（2015 年 3 月），頁 21-22。

行徑多麼敗壞，諸如獨裁的馬可仕、貪腐的第十三任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等，皆依舊能穩坐大位、甚至下一代接續受到扶持以確保家族利益的永續長存，學者們因此而批評菲律賓政治實為披著民主外衣的寡頭政體⁴，政治家族所傳承下的不只是政治勢力而已，還包括了各種貪腐的傳統。

根據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調查全球 177 國家所發布的「2013 年全球清廉指數報告」，菲律賓公部門清廉度排名全球第 94 名⁵，世界銀行也曾估算菲律賓因行政貪腐而損失的金額高達 28-43 億美元，以 2014 年的政治分肥醜聞為例，多位議員被揭發涉嫌向虛設的非政府組織撥款，把中央政府撥給國會議員建設地方的經費塞進個人荷包，金額竟然上達百億比索震驚全國。貪腐問題使得菲律賓經濟困頓難以成長，國內人民怨聲載道。

儘管如此，菲律賓國家經濟和發展局局長巴利薩坎(Arsenio Balisacan)卻仍表示菲律賓經濟在亞洲地區表現尚好，成長率 6.1%僅次於中國的 7.4%⁶，但事實上若對比前一年的數值，經濟表現在不如 2013 年經濟成長率為 7.2%。若深究在杜特蒂總統上任之前菲律賓的經濟狀態，在阿奎諾三世 2010-2014 年擔任總統期間，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7.6%、3.9%、6.8%、7.2%⁷，其經濟成長的主要由服務業與工業帶動，而海外勞工大量匯回國內的金額則進一步刺激了國內市

⁴ 顏永銘 2016，新人新政：杜特蒂總統與菲律賓的內外展望，戰略安全研析（13 4） pp.29-30

⁵ 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201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s://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lication/global_corruption_barometer_2013

⁶ 楊天沐，「菲律賓 2014 年經濟增長 6.1%」，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29/c_1114184016.htm，2015 年 1 月 29 日

⁷ 楊超，「圍繞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的菲律賓南海戰略轉向及其美國因素」，東南亞縱橫，第 6 期（2015 年 6 月），頁 23。

場需求的擴張，然而，多數人民並沒有從國家的經濟成長中得到益處，菲律賓國內貧富差距極大，根據富比世的調查，菲律賓 50 大富豪的資產共計 658 億美元，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然而菲律賓統計局計算國民平均收入，每四名菲律賓人卻有一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⁸。而民間組織「社會氣象站」2013 年所做的民調顯示，回顧過去一年的生活，僅有 24% 的民眾認為生活有所改善，但 36% 的民眾卻表示生活更差了。同一年另一家民調機構「亞洲脈搏」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有 28% 民眾感覺經濟進步了，但 29% 的民眾表示經濟變得更差了⁹。

此外，菲律賓政府所發佈的「菲律賓發展規劃 2011-2016 年中期調整」(Philippines Development Plan 2011-2016)報告中設定 2014 年失業率目標為 6.7%~6.9%；2015 年為 6.6%~6.8%；2016 年為 6.5%~6.7%，但卻皆未達成每年產生 100 萬個工作機會以降低失業率的目標，而民間組織所計算的失業率甚至更為驚人：「社會氣象站」定義失業為年滿 18 歲，非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士、或殘疾人士卻沒有工作者，而據此定義所調查的結果顯示，2013 年估計高達 1210 年萬人失業，其中 9-12 月有 250 萬人加入失業行列，使得失業率竟高達 27.5%¹⁰，可見無論是從官方的數據、民間的調查，均呈現一致的結論：菲律賓整體而言經濟並沒有明顯進步、人民的生活也未能如預期獲得改善，也為菲律賓種下企圖改變的種子：包括人民選擇

⁸ 菲律賓貧困人口佔 25%，菲律賓商報網站，<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4/04-30/28954.shtml>，2014 年 4 月 30 日

⁹ 民調：40%菲律賓人認為生活會改善，菲律賓商報網站，<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3/12-19/25017.shtml>，2013 年 12 月 19 日

¹⁰ 民調：菲律賓失業率增至 27.5%，菲律賓商報網站，<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4/02-11/26565.shtml>，2014 年 2 月 11 日

不同於傳統歷史上相似背景出身的領導人、改變參與區域整合的模式、改變對外關係的互動等，以謀求更好的發展，也為杜特蒂 2016 年總統大選之戰埋下伏筆。

參、菲律賓與東南亞區域整合的關係

如同前述，菲律賓長久以來由權貴所把持的政府體制與貪腐風氣，使得國內人民生活窘迫、民怨漸生，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主張不利於民主鞏固的八項負面因素中，菲律賓便有其中五項因素，包括國內叛亂、極度貧窮、社會經濟不平等、大量外債、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廣泛介入¹¹，而這眾多國內問題致使國家總體經濟表現不佳，也造成菲律賓無論在國際上或是區域內都少有掌握話語權之機會。

例如菲律賓位置所在的東南亞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市場之一，而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整合機制莫過於東協，不僅土地面積廣達 446 萬平方公里以上，人口更是超過 6.5 億，其中，東協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成立的單一市場「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為整合區域內經濟活動奠定了基石，在現有的東協提供貨品及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基礎上，繼續朝於 2025 年前達到包括產品、服務、投資、資金及人員的自由流動目前繼續推動區域整合，成為全球供應鏈的生產基地¹²。

東協經濟共同體一舉成為人口超越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及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簡稱「歐盟」的世界第三大市場、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在 2019 年的

¹¹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¹² 新南向政策專網，東協市場概述，<https://newsouthboundpolicy.trade.gov.tw/PageDetail?pageID=39&nodeID=24>

整體經濟規模已達到 3.2 兆美元¹³。以東協經濟共同體每年平均 5%-7% 經濟成長率而言，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 2016 年便已預測東協經濟共同體有望在 2030 年躍升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¹⁴。然而東協經濟共同體成員中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相當大，例如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19 年的調查顯示，最富裕的會員國為新加坡，國民人均收入 58,390 美元，但人均收入最低的會員國緬甸卻僅有 1,360 美元¹⁵。綜觀東協十國成員裡面，印尼與菲律賓是唯二人口破億的國家（如下表 1）¹⁶，如前述，菲律賓的人口在 2014 前已突破一億，不僅是世界第 12 個人口破億的國家，也是全球人口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更是東協會員國中成長率最高的國家。

菲律賓的人口委員會按現今的成長率推估菲律賓人口可望於 2040 年突破 1.84 億人晉身世界人口十大國家之列¹⁷。此外，菲律賓於 1967 年加入東協，乃東協創始會員國之一，在東南亞推動經貿整合中應可佔得先機，成為經濟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但從表 1 中所得最新的統計數據中可見，其國內生產毛額並非前三名，甚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在倒數排名之列，由此看來，菲律賓似乎並沒有從參與東南亞區域整合中獲得太多的利益，也沒有成為東協的主要

¹³ 何善敏，東盟市場概況，經貿研究 Research，<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Mzk5MzcxNjEz>，2021 年

¹⁴ 新南向政策專網，東協市場概述，<https://newsouthboundpolicy.trade.gov.tw/PageDetail?pageID=39&nodeID=24>

¹⁵ The World Bank，2021,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Singapore>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myanmar>

¹⁶ UN, The World Factbook-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east-asia-southeast-asia/>

¹⁷ 楊超，「圍繞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的菲律賓南海戰略轉向及其美國因素」，東南亞縱橫，第 6 期（2015 年 6 月），頁 26。

力量。

表 1：2019 年東協十國人口與經濟數據

| 國家 | 人口 | 國內生產總值 |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
|------|-------------|------------|----------|
| 汶萊 | 460,000 | 134.7 億 | 29,314 |
| 緬甸 | 54,045,420 | 812.5 億 | 1,503 |
| 柬埔寨 | 15,600,000 | 267.2 億 | 1,713 |
| 印尼 | 270,204,000 | 10,596.4 億 | 3,922 |
| 寮國 | 7,163,000 | 188 億 | 2,625 |
| 馬來西亞 | 32,523,000 | 3,646.8 億 | 11,213 |
| 菲律賓 | 108,770,000 | 3,626.4 億 | 3,330 |
| 新加坡 | 5,704,000 | 3,743.9 億 | 65,641 |
| 泰國 | 69,626,000 | 5,018.8 億 | 7,208 |
| 越南 | 96,484,000 | 3,295.3 億 | 3,415 |

資料來源：Country Data, Demographic and economy, <https://countryeconomy.com/countries/groups/asean>

*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單位為美金

肆、杜特蒂的崛起與菲律賓對外關係的轉變

由於上述國內與國際因素，菲律賓國內企圖尋求改變與進步的聲浪日益茁壯，也因此造就了杜特蒂的迅速崛起。杜特蒂發跡的背景完全不同於過去菲律賓政治權力由與地主、資本企業、天主教、和美國連結的政治菁英家族所把持及壟斷的歷史傳統，杜特蒂來自於

貴族菁英家族視為鄉下的民答那峨島，因此它具有明顯而強烈的草根性格，在達沃市擔任二十二年市長的期間以果斷執行「以暴制暴」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雖然達沃市一直以來是菲律賓謀殺案發生率最高的城市，就是在杜特蒂強烈執法之後也依舊犯罪率居高不下，但杜特蒂發言強硬、執法兇狠的形象卻依然深受飽受貪腐與貧窮之苦的菲律賓選民擁護與愛戴，並在 2016 年順利當選總統¹⁸。

杜特蒂當選之後也不負菲律賓人民追求改變傳統之望，在外交政策上面也選擇了明顯不同於傳統菲律賓領導人的路線，包括切割與美國的緊密聯繫、淡化與東協的緊密關係、並轉而尋求新的區域合作對象。

菲律賓自 1899-1942 年間做為美國的殖民地，在獨立之後依然扮演著美國在亞洲最古老的朋友之一，美國的長期駐軍以及兩國之間軍事的訓練與合作，緊密的聯繫使得菲律賓長期被貼上親美的標籤，甚至被視為美國在亞洲延伸的勢力之一，例如菲律賓過去曾一度展現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高度興趣，特別是加強與美國在製造業和信息科技服務外包產業，包括醫療信息和創意產業中的合作，並擴大對美出口¹⁹，然而這種明顯以美國馬首是瞻、缺乏亞洲特色的立場，卻嚴重不利於東南亞區域推動整合，尤其當東協規模與各項合作形式早已日益具體之時，菲律賓自成獨立群島，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上與其他東協成員之間無論就社會文化思想、宗教信仰、抑或國家政策、對外關係等，

¹⁸ 劉光瑩譯，強人杜特蒂會讓菲律賓更慘，天下雜誌 604 期，<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50>，2016 年 8 月 17 日

¹⁹ 楊超，「圍繞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的菲律賓南海戰略轉向及其美國因素」，東南亞縱橫，第 6 期（2015 年 6 月），頁 24。

本就差異頗大，若持續過度在經濟上依賴美國、軍事外交上配合美國，而缺乏自我立場、甚至失去亞洲特色，自然在融入東南亞區域整合的政策上就會更顯重重隔閡與困難。因此杜特蒂當選總統之後迅速調整菲律賓外交政策，迅速選擇擺脫依附於美國羽翼下，公開表示與美國的對手中國、俄羅斯站在一起，「三人對抗全世界」²⁰。

此外，杜特蒂較過往的菲律賓領導人更為主動積極經營對外關係以及爭取區域內話語權，包括與川普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正式會面、川普訪問菲律賓、菲律賓主辦東協五十周年年會、菲律賓主辦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s, EAS）等，以提高菲律賓在國際上的聲望，以及在區域內的能見度、和區域整合的影響力²¹。

若分析為何杜特蒂如此果斷選擇不同於歷史上菲律賓一直以來親美政策的傳統，除了考慮上述融入區域、避免與東協國家立場不一的外部因素之外，其個人背景與成長經驗也為一重要因素，其遠因可追溯自杜特蒂成長於民答那峨島，該地區大部分為穆斯林區，當地居民對 1898 年美軍入侵和接下來的殖民統治仍有怨恨，更不滿 1946 年獨立後的菲律賓被交付給了由美國所扶植的腐敗政治菁英，因此杜特蒂自小便被灌輸根深蒂固的反美思想。

杜特蒂在 1988 年當選市長與美國也多有衝突，以致之後美國拒絕杜特蒂入境²²。而最終引發衝突的導火線則是杜特蒂在 2016 年競

²⁰ 任中原譯，彭博資訊專欄/對付杜特蒂美國要冷靜，經濟日報，<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047441>，2016 年 10 月 26 日

²¹ 許家豪，「川普亞洲行對東南亞政經局勢之影響—以菲律賓與越南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2 期（2018 年），頁 114-124

²² 田思怡，杜特蒂為何反美？從小被灌輸反美思想，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5/2045451>，2016 年 10 月 24 日

選菲律賓總統期間，美國駐菲大使公開批評其出言不遜，不應拿 1989 年一宗澳洲女傳教士遭性侵殺害的事件說笑，而此番指謫的言論極有可能影響杜特蒂的選情，以致杜特蒂心生不滿，並在當選後該年十月訪日行前記者會上說明與美國之間恩怨時，明白指出「齟齬不是我開始的，而是他們。記得這一切的源頭嗎？選舉時美國大使說了不好聽的話」²³。

伍、杜特蒂的外交政策與菲律賓的發展

杜特蒂的外交政策明顯與傳統菲律賓親美反中的立場大相逕庭，他不只反美還刻意親中，並在當選總統之後首次訪問中國之行中公開發明：「讓我們與中國疏遠不是我們自己造成，我將重新擬定政策新方向」；「中國數世紀來，從未侵略我國任何領土」，正式表態與曾經的殖民母國、堅定的軍事盟友美國「分道揚鑣」，從此轉向與中國深化兩國關係²⁴。杜特蒂的此番聲明無疑是嘲諷美國並同時向中國釋出高度的善意，甚至在訪問中國時接受央視訪問，直接明白地表示不指望其他國家能給予協助，只有中國才是菲律賓在經濟上唯一的希望²⁵，對中國如此高度的評價與肯定，是菲律賓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之事。

杜特蒂選擇有別於菲律賓傳統外交政策的「脫美親中」，除了個人成長背景與自身經歷與美國有過太多衝突之外，就提升國家利益

²³ 林行健，對美新仇舊恨杜特蒂一次說明白，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0250304-1.aspx>，2016 年 10 月 25 日

²⁴ 簡長盛譯，菲總統杜特蒂：與美國關係說再見，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0200010-1.aspx>，2016 年 10 月 20 日

²⁵ 杜特蒂：菲律賓經濟上唯一希望就是中國，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60242>，2016 年 10 月 29 日

與融入區域整合發展的現實層面而言，親中政策似乎更能符合菲律賓的發展與未來展望。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資料顯示，在杜特蒂就任總統之前，2014 年菲律賓進口總額為 639 億美元，其中出口額 618 億美元，主要出口國分別為日本、美國、與中國²⁶，其中，菲律賓與中國雙邊貿易飛快成長，菲律賓是中國在東協地區的第六大貿易夥伴，以 2014 年為例，雙邊貿易總額達 432.81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了 13.7%，佔中國與東協 10 國雙邊貿易的 9.3%。此外，菲律賓出口至中國 205.51 億美元，成長率 12.4%；自中國進口 227.8 億美元，成長 14.9 億美元。中國不只是菲律賓第三大的出口市場，也同時是最大的進口來源國²⁷。此外，兩國之間的雙向投資也朝氣蓬勃，菲律賓統計 2000-2012 年間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在菲律賓的投資累積已達 11.8 億美金，是菲律賓第八大的投資來源國，而此一數據尚不包含中國透過第三地前往菲律賓投資的企業²⁸，可見杜特蒂企圖強化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有其基礎及必要性，有相當大的潛力能解決菲律賓內部經濟不振的困境。而在杜特蒂就任之後，2017 年，菲律賓貿易總額到 1,706.01 億美元，總出口金額達 687.12 億美元，總進口金額達 1,018.89 億美元，其中，菲律賓主要出口國依序為：日本、美國、香港、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主要進口國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美國、泰國，中國與美國依然是菲律賓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²⁹，但為何菲律賓依然選擇親中脫美呢？

²⁶ 2014 年菲律賓進口額增長 2.4%，中國商務部網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502/20150200904832.shtml>。

²⁷ 2014 年 1-12 月中國-菲律賓重點產品進出口趨勢分析，南博網，<http://customs.caexpo.com/data/country/2015/03/26/3642197.html>，2015 年 3 月 26 日

²⁸ 菲律賓總統批准 623 億元基礎建設樣目，菲律賓商報網站，<http://shangbao.com/ph/fgyw/2014/05-31/29882.shtml>，2014 年 5 月 31 日

²⁹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簡介，<https://web.wtocenter.org.tw/Node.as>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2月30日菲律賓曾正式向國際海洋法庭提交南海仲裁的申請書，意圖透過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南海問題上對抗中國，儘管仲裁結果有利於菲律賓，但實質控制該水域的中國則是強烈拒絕接受仲裁結果。面對如此明顯無法妥協的衝突，杜特蒂卻能弔詭地宣稱南海仲裁案只是與大陸會談的次要問題：「仲裁結果賦予我們權利，但中國擁有歷史權利，而且很堅持。在此情況下，我們究竟是要爭論或是乾脆談判？我要說，我們還是把這個問題留到以後再說吧」³⁰。為何杜特蒂會如此不顧一切的「轉向中國」？甚至在2017年四月份舉行的第30屆東協領袖峰會閉幕記者會上，杜特蒂直言不諱預期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會給菲律賓更多的援助用以發展菲律賓，他更進一步宣稱「一帶一路」很重要，因為它始於亞洲」³¹。所謂的「始於亞洲」，某種程度上是否該政策有助於深化菲律賓融入東南亞地區的整合？

所謂的「一帶一路」倡議最早乃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9月訪問哈薩克時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隨後10月月於印尼國會演講時又再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定調「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行程全方面開放新格局」，自此「一帶一路」成為中國當前統籌國內國際發展最重要的決策方向。

隨後為求能全面推動「一帶一路」的具體發展，中國再於10月

px?id=66, 2019年

³⁰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與美國關係說再見，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0200010-1.aspx>，2016年10月20日

³¹ 林行健，杜特蒂預期：一帶一路給菲更多援助，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4290302-1.aspx>，2017年4月29日

與包括中亞與東南亞地區 21 個國家共同簽署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以提供亞洲基礎建設的資金。緊接著 11 月又於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中，明確要求儘早確立「一帶一路」的總體佈局以及時間表。同一時期，中國倡議召開了「『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東道主夥伴對話會」，宣佈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會，以提供「一帶一路」沿路國家包括基礎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方面的融資支持。2015 年 3 月由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共建願景」），以做為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規劃與行動指南：絲綢之路經濟帶將重點暢通「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將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洋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洋到南太平洋」。

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是和平崛起的重要象徵，更是一個「走出去」的概念：一方面深化與周邊國家的金融互動、同時推廣中國的優質產能與優勢產業；另一方面透過區域內對貿易與生產要素的協調規劃、交通網路的連結、以及商品、資金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將亞洲地區與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歐盟連結起來³²。然而包括中國國內的評論都承認「一帶一路」更務實的意義是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產能過剩的經濟發展瓶頸、以及平衡內部發展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由於眼下「一帶一路」所連結的周遭國家，多為發展中的國家，基礎設施明顯不足，因此透過由中國的主導帶動投資與產業的轉移，不但

³² 王義桅，「如何應對“一帶一路”中的地緣風險」，徐曉主編，“一帶一路”引領中國—國家頂層戰略設計與行動佈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年）頁 274-280。

能同時解決其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也能帶動出口經濟，並加強貿易擴大所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對中國而言等同於第二次的改革開放，將有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而相關配套亞投行的設立，是發展「一帶一路」的重要金融支持平台，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途徑與管道，有助於中國與沿線國家貨幣互換與結算的範圍和規模，也有利於亞洲金融市場的開放與發展。可見由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雖聲稱具有解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困境和整合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意義，但其核心價值更多程度是針對解決中國自身問題量身定做的政策輸出，而周邊國家則是順勢獲得共榮共存的機會。

但對東南亞地區政治實力或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而言，「一帶一路」的成功推動，不僅有助於東南亞地區的區域整合，更值得關心的是透過參與「一帶一路」、與中國結盟的策略，還能增加達其經濟上的效率與政治上的接受度，因此對於經濟發展長期不振、人民生活長久困頓的菲律賓而言，杜特蒂深信是最快也是最好的機會。

宋鎮照也分析菲律賓已處於南海邊緣的不利位置，若想與亞洲大陸進行經濟整合，勢必需要掌握「一帶一路」的商機，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與中國合作，創造互利共贏的關係³³，然而杜特蒂刻意的親中外交政策實際上卻也暗藏風險，例如菲律賓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能參與多少？又能參與多深？均取決於中國。杜特蒂想要透過中國的經援、參與「一帶一路」的貿易合作商機，由中國來投資改善基礎設施；興建學校、醫院，發電廠及網絡科技等；以及農業合作、解除農業禁令等，來達到菲律賓內部的經濟發展，但尚且不論中國

³³ 宋鎮照，「菲律賓杜特蒂新政府上台後的美中外交戰略轉變」，發表於菲律賓新政府上台後菲中關係發展及其對台灣的影響與意涵學術最談會會議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2016年10月26日），頁2-3。

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經常以失敗收場，甚至中國提供開發貸款的條件到頭來多半是激起對方的憤怒，中菲之間對於南海主權的爭議將是極大的致命傷：中國對菲律賓的根本意圖之一，在於取得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內一些島嶼及礁岩的主權，而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妥協的條件。一旦中國在這些島嶼上建立軍事設施，雙方的關係幾乎可以確定將宣告破裂，因此，菲律賓若想要透過提升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以強化區域整合的參與，眼下看來雖有機會但卻需承擔非操之在己的風險。

儘管爭議頗多，但杜特蒂外交政策的改變與決定是否真有助於帶領菲律賓突破發展困境、提升國家經濟呢？從世界銀行統計中可見自杜特蒂 2016 年就任總統後，菲律賓貧窮率明顯下降，且是近年最低（如下表 2），在某方面而言，最起碼杜特蒂確實達成其政治目標之一，也滿足了人民強烈企圖擺脫貧窮的期望。

表 2：菲律賓歷年國家貧困人口比例

| 時間 | 2003 | 2006 | 2009 | 2012 | 2015 | 2018 |
|-----|-------|-------|-------|-------|-------|-------|
| 貧窮率 | 24.9% | 26.6% | 26.3% | 25.2% | 23.5% | 16.7% |

資料來源：World Bank, Poverty Headcount Ratio at National Poverty line (% of Population) - Philippin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NAHC?locations=PH>

*此處貧窮率所指為菲律賓處於貧窮線以下之人口占全國總人口之百分比

陸、結論：挑戰與展望

菲律賓雖為東協創始會員國之一，但由於地理位置、宗教背景、以及殖民母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一直處於格格不入、難以全面融合於東南亞區域整合的發展進程中，儘管杜特蒂自就任總統之後試圖改變外交政策以「脫美親中」來謀求菲律賓更好的發展，但若想全面脫美親中也困難重重，畢竟美國在菲律賓境內依然擁有高度的支持：超過四分之三的菲國人表示「非常信任」美國，而「非常信任」中國者卻不到四分之一，因此杜特蒂盛讚習近平已在國內引起一些不滿。

又軍事上，美菲也難以拆夥：自 1950 年代起，菲國一直靠著美國援助以加強軍隊：1951 年華盛頓和馬尼拉簽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MDT)，規定若其中一方遭受攻擊，合約方有義務互相支援；2014 年美菲又再簽訂了「加強國防合作協定」(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明訂馬尼拉需阻止中國船隻進入菲律賓西海岸的 200 海哩以內的專屬經濟區³⁴，以上種種，恐怕將導致杜特蒂在菲律賓與美國正式劃清界線之前，還必須先面臨國內親美與反美兩派勢力的政治分裂與鬥爭。

此外，人算不如天算，自 2019 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國際情勢丕變，不僅世界各國、各區域經濟貿易發展停滯，國際輿論風向也大為轉變，從民間到政府均有不少抨擊中國的言論，再加上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已是檯面上兩不相讓的局面，兩國均競相拉攏菲律賓，杜特蒂儼然已成了最大的贏家，從兩邊都得到了包括軍事援助與貿

³⁴ 外交政策髮夾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親中面臨國內民意考驗，美國之音，<http://www.storm.mg/article/181906>，2016 年 10 月 25 日

易採購合約的實質利益，許書豪評價菲律賓實現了自己版本的「亞洲再平衡」，而杜特蒂則是讓菲律賓再度偉大的領導人³⁵，因此，菲律賓不見得還需要選邊站，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菲律賓國內低迷的政治與經濟情勢導致難以積極對外發展強化其區域內的參與與影響力，其根本原因與其傳統社經結構有關，然而在杜特蒂當選總統之後，其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轉變，確實帶給了菲律賓發展的機會，整體而言，杜特蒂最主要考量乃是著眼於借重中國之力發展菲律賓國內經濟：「我的國家很窮，我在 6 年總統任期內必須做一些事情。我必須向菲國人民證明，他們沒有浪費他們的選票，他們可以期望在我 6 年任期內生活得到改善。我不期望奇蹟發生，但或許我祈禱的奇蹟是，中國將決定真正幫助我們，並持續下去。幫助我們強化國家，至少讓菲國國民都能吃飽肚子」³⁶。

然而，目前由中國所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個極大的計畫，不僅主要決定權在中國，中國與周邊國家所建立的關係，並不能直接轉換成菲律賓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緊密的外交、經濟或軍事合作關係，且若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而言，菲律賓需要美國的支持還更勝於中國，再加上菲律賓人民普遍親美的內部因素以及與中國南海主權爭議的外部因素，杜特蒂很大程度難以實質上貫徹脫美親中的政策，甚至很有可能招致兩面不討好的結果，而藉由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以更加融入東南亞區域整合的理想恐怕也是過多的期待，有待觀察。特別是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此時，世界各地包括美國、中國、東南

³⁵ 許家豪，2018，川普亞洲行對東南亞政經局勢之影響——以菲律賓與越南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2 期，P121

³⁶ 杜特蒂：不排除與中俄軍演、訪華計劃向中國購買武器，鉅亨網新聞中心，<http://news.cnyes.com/news/id/3578228>，2016 年 10 月 17 日

亞等國均陷入難以有效控制疫情蔓延的困境，而杜特蒂總統任期也將至，對菲律賓對外關係及國內政治而言，或許又將是新的轉變與挑戰，特別是在東南亞區域整合的路徑上，在杜特蒂卸任之後，菲律賓極有可能再度走向親美遠中、積極參與東協的傳統套路上。

參考資料

1. 2014年1-12月中國-菲律賓重點產品進出口趨勢分析，南博網，
<http://customs.caexpo.com/data/country/2015/03/26/3642197.html>，
2015年3月26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22日。
2. 2014年菲律賓進口額增長2.4%，中國商務部網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1/j/201502/20150200904832.shtml>。檢索日期2021年4月22日。
3. 王義桅，「如何應對“一帶一路”中的地緣風險」，徐曉主編，“一帶一路”引領中國—國家頂層戰略設計與行動佈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頁274-280。
4.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簡介，
<https://web.wtocenter.org.tw/Node.aspx?id=66>，2019年。檢索日期
2021年5月11日。
5. 外交政策髮夾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親中面臨國內民意考驗，美國之音，
<http://www.storm.mg/article/181906>，2016年10月25日。
檢索日期2021年4月6日。
6. 民調：40%菲律賓人認為生活會改善，菲律賓商報網站，
<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3/12-19/25017.shtml>，2013
年12月19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15日。
7. 民調：菲律賓失業率增至27.5%，菲律賓商報網站，
<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4/02-11/26565.shtml>，2014
年2月11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23日。
8. 任中原譯，彭博資訊專欄/對付杜特蒂美國要冷靜，經濟日報，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047441>，2016年10月26日。檢索

日期2021年4月23日。

9. 何善敏，東盟市場概況，經貿研究 Research，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Mzk5MzcxNjEz\(2021年\)](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Mzk5MzcxNjEz(2021年))。檢
索日期2021年5月21日。
10. 宋鎮照，「菲律賓杜特蒂新政府上台後的美中外交戰略轉變」，發
表於菲律賓新政府上台後菲中關係發展及其對台灣的影響與意
涵學術最談會會議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2016年10月26日)，
頁2-3。
11. 杜特蒂：不排除與中俄軍演、訪華計劃向中國購買武器，鉅亨網
新聞中心，<http://news.cnyes.com/news/id/3578228>，2016年10月17
日。檢索日期2021年3月31日。
12. 杜特蒂：菲律賓經濟上唯一希望就是中國，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60242>，2016年
10月29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7日。
13. 林行健，杜特蒂預期：一帶一路給菲更多援助，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4290302-1.aspx>，2017年4
月29日。檢索日期2021年3月31日。
14. 林行健，對美新仇舊恨杜特蒂一次說明白，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0250304-1.aspx>，
2016年10月25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22日。
15. 許家豪，「川普亞洲行對東南亞政經局勢之影響—以菲律賓與越南
為例」，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2期(2018年)，頁114-124
16. 田思怡，杜特蒂為何反美？從小被灌輸反美思想，聯合報，
<https://udn.com/news/story/5/2045451>，2016年10月24日。檢索日
期2021年4月21日。

17. 菲律賓貧困人口佔 25 % ， 菲律賓商報網站 ，
<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4/04-30/28954.shtml> ， 2014
年4月30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21日。
18. 菲律賓總統批准 623 億元基礎建設樣目 ， 菲律賓商報網站
<http://shangbao.com/ph/fgyw/2014/05-31/29882.shtml> ， 2014年5月
31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21日。
19.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與美國關係說再見，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0200010-1.aspx> ，
2016年10月20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7日。
20. 黃耀東，「菲律賓：2014年回顧與2015年展望」，東南亞縱橫，第
3期(2015年3月)，頁21-22。
21. 新南向政策專網，東協市場概述，
[https://newsouthboundpolicy.trade.gov.tw/PageDetail?pageID=39&
nodeID=24](https://newsouthboundpolicy.trade.gov.tw/PageDetail?pageID=39&nodeID=24)。檢索日期2021年5月20日。
22. 楊天沐，「菲律賓 2014 年經濟增長 6.1%」，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29/c_1114184016.htm，2015年
1月29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7日。
23. 楊超，「圍繞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 E D C A ）的菲律賓南海戰
略轉向及其美國因素」，東南亞縱橫，第6期(2015年6月)，頁23-
26。
24. 劉光瑩譯，強人杜特蒂會讓菲律賓更慘，天下雜誌604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50>，2016年8
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7日。
25. 簡長盛譯，菲總統杜特蒂：與美國關係說再見，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0200010-1.aspx> ，

- 2016年10月20日。檢索日期2021年4月7日。
- 26.顏永銘，「新人新政：杜特蒂總統與菲律賓的內外展望」，戰略安全研析，第134期(2016年)，頁29-30。
- 27.Country Data, Demographic and Economy, <https://countryeconomy.com/countries/groups/asean>。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 28.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201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s://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lication/global_corruption_barometer_2013。檢索日期2021年3月15日。
- 29.Philippines Population (Live), 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philippines-population/>。檢索日期2021年9月1日。
- 30.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1.The World Bank, Myanmar,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myanmar>。檢索日期2021年4月23日。
- 32.The World Bank, Singapore,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singapore>。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 33.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2021>。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 34.The World Factbook-East Asia/Southeast Asia,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east-asia-southeast-asia/>。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 35.The World Bank, Poverty Headcount Ratio at National Poverty line (% of Population)- Philippin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NAHC?locations=PH> 檢索日期2021年5月12日。

唐代的蒲津關與蒲津橋*

蔡坤倫**

摘要

唐代關中四面以山、河、關形成的地理形勢。山者，西面隴坻(隴山)、賀蘭山，北面鄂爾多斯高原、陰山，南面秦嶺。河者，自西向北往南如門字型的黃河環繞關中西、北、東三面。關者，以黃河而言，大致於兩岸置關、津，即所謂河上關、河上津，古代渡河透過船隻或橋樑。總計唐代關中河上關有十座，從上游至下游依序是會州黃河段有會寧關、烏蘭關，勝州有榆林關、河濱關，延州有永和關，丹州有烏仁關，同州有龍門關、蒲津關，華州有潼關與、渭津關。本文以河上蒲津關，以及連接河兩岸的蒲津橋為論述核心，微觀關與橋的名稱沿革、位置、形制、維修等面向，藉此宏觀唐代關中東北面的軍事地理。

關鍵詞：唐代、關中、蒲津關、蒲津橋、黃河

* 拙稿受益於學報兩位學者的審核，承蒙提供諸多寶貴的卓見與幫助，謹致謝忱。唯文章疏漏之責仍由筆者自負。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Pujin-Guan and Pujin-Bridge in Tang Dynasty

Kun-lun Tsai***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Guanzhong in Tang Dynasty was formed by mountains, rivers and Guans on all sides. Mountain, Longdi (Longshan) and Helan Mountain to the west, Ordos Plateau and Yinshan Mountain to the north, and Qinling Mountain to the south. River, Yellow-River as 冂-shaped from west to north to south surrounded the west, north and east of Guanzhong. Guan, as far as the Yellow-River was concerned, the Guans and Jins were roughly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the so-called guans and jins on the River. In ancient times, the river was crossed through ships or bridges. A total of ten guans on the River of Guanzhong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upper reaches to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uizhou are Huining-Guan and Wulan-Guan, Shengzhou has Yulin-Guan and Hebin-Guan, Yanzhou has Yonghe-Guan, and Danzhou has Wuren-Guan, Tongzhou has Longmen-Guan and Pujin-Guan, Huazhou has Tong-Guan and Weijin-Guan. The article takes Pujin-Guan on the river and Pujin-Bridge that connects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as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By micro name history, location, shape, maintenance of guan and bridge in order to macro military geography of

*** Doctoral degree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resent.

the northeast of Guanzhong in Tang Dynasty.

**Keywords : Tang Dynasty, Guanzhong, Pujin-Guan, Pujin-Bridge,
Yellow-River**

壹、前言：蒲津關、橋在同州、蒲州的地理形勢

李吉甫記載唐代蒲津關位置有同州與蒲州(河中府)兩種說法，¹蒲津橋則是連接黃河兩岸的蒲津關。蒲津關與蒲津橋在唐代交通歸屬「長安太原驛道」，概觀長安至太原驛道，大抵沿渭水北岸分南、北道東至同州，北道由長安北經中橋渡過渭水，經涇陽縣、三原縣、富平縣、奉先縣至同州治所馮翊縣；南道由長安東行經東渭橋過渭水，經高陵縣、櫟陽縣、下邽縣至同州。南、北道中以南道路徑較捷，唐人多取道於此。又馮翊縣東行朝邑縣、蒲津渡口、蒲津關，跨蒲津橋渡黃河至蒲州治所河東縣，東北循涑水而上至絳州，絳州東北循汾水經晉州、汾州至太原府。²蒲津關、橋可謂京城長安東北行往河東乃至河北道之鎖鑰。

《隋書·食貨志》：「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³隋文帝時地方貢物每年運抵京師，出自黃河以南由潼關西入，來自黃河以北由蒲津關西進，顯見蒲津關作為河東、河北道物資西運長安的轉輸要關。錢穆也說：「入關中有三道：潼關為入關正道也；武關為入關孔道，高祖由此入咸陽；及後往來關中，常由臨晉，又入關之隙道也」，⁴「正道」大抵沿黃河南岸，「孔道」是穿越秦嶺東南段，至於「隙道」所在的臨

¹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6，1版)，卷2，〈關內道·同州·韓城縣〉，頁37。同書卷12，〈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頁326。

²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長安太原驛道〉，頁91-128。

³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8，1版)，卷24，〈食貨志〉，頁681-682。

⁴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7，1版)，卷8，〈秦地名〉，頁374。

晉關即蒲津關，因須跨越黃河天險，尚需搭配橋樑。

若從蒲津關、橋隔黃河兩側的同州與蒲州而論，《新唐書·李晟傳》：「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⁵河東道的河中府西入京師，同州首當其衝。代宗大曆中，元載為相，再次議請蒲州建為中都，論其河中府形勢：「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黃河北來，太華南倚，總水陸之形勝，鬱關河之氣色」；「有羊腸、底柱之險，濁河、孟門之限，以輾轅為襟帶，與關中為表裏」，⁶河中府左側是關中黃河段「」字型最右筆畫「丨」，大河自北向南流，同時受制華山、太華山於此轉彎續而東流，境內並有各式天險，地理形勢險要。總之，蒲津關夾黃河兩岸的同州與蒲州而置，同州是西都京師東北往北都太原必經政區，同時也制約蒲州西入京城，蒲津橋不但連接黃河兩岸關城，也將同州與蒲州納入長安-太原驛道之途。蒲津關與蒲津橋在關中東北面扮演「河上關」關鍵地位，⁷無怪乎唐玄宗開元年間將此關劃分為上關層級，⁸蒲津橋且由國營工匠維修，⁹顯見此關、橋在唐代的特殊地位。

⁵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1版），卷154，〈李晟傳〉，頁4869。

⁶ 《元和郡縣圖志》，卷12，〈河東道·河中府〉，頁324。

⁷ 唐代關內與河東兩道隔黃河為界，兩道間交通往來皆有置關以查出入。嚴耕望考證河上諸關津計有：榆林關、河濱關、君子津、合河津、合河關、孟門津、孟門關、永和關、馬門關、烏仁關、采桑津、龍門關、蒲津關。詳見氏著，《唐代交通圖考》（一），〈關內河東間河上諸關津及其東西交通線〉頁289-313。關中黃河「」字型的河上關有十座：會州黃河段有會寧關、烏蘭關，勝州有榆林關、河濱關，延州有永和關，丹州有烏仁關，同州有龍門關、蒲津關，華州有潼關與渭津關。詳見蔡坤倫，《唐代關防——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秀威出版社，2020.5），頁143-222。

⁸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1，1版），卷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195-196。

⁹ 《唐六典》，卷7，〈尚書工部〉，頁226。

唐代蒲津關、橋以嚴耕望〈長安太原驛道〉視為較早期研究，¹⁰嚴氏考證長安東經同州、渡河至蒲州，東北行絳州、晉州、汾州至太原的路線，於同州處佐以綱目體形式分論蒲津關、中渾城、蒲津橋。在關城方面，論蒲津關險要、名稱溯源、東西關城分峙於黃河兩岸的同州與蒲州，得出此關乃夾河分置。在橋樑方面，追溯蒲津橋出現點、形制（鐵牛、鐵人、鐵山）、增修原因推測，由於蒲津橋連接黃河兩岸關城，中渾作為橋身中段的襟束，並於中渾上置有中渾城。嚴文著重在交通路線考證，凡沿線涉及地名等則以史料排列於底下，對於後繼研究者提供按圖索驥之效，可在此基礎上，結合更多資料填補其不足之處，如嚴氏認為蒲津關以東、西關城分置黃河兩側，西關城在同州，東關城在蒲州，筆者對比史籍後發現此關涉及政區調整而有隸屬改易現象，不全然是夾河分置兩地的關。至於蒲津橋由於後來有出土實物資料，這部分因時空背景為嚴氏在撰寫時未見，這也是本文著墨之處。

關治中、李金俠〈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是繼嚴文之後，以臨晉關（蒲津關）為題的單篇論文，關、李二氏從關的位置、蒲津橋、歷朝涉及此關橋戰爭三主題分述。¹¹主張關城建在黃河西岸，即唐代同州，這與嚴文夾河分置關觀點不一，史籍記載蒲津關位置有同州與蒲州兩說，導致學者對關的位置出現意見分歧，此部分恐須更多資料排比與闡述。相對於蒲津關文章鮮少，蒲津橋研究成果則較為豐富，陸敬嚴〈蒲津大浮橋考〉，陸氏針對橋的位置、興廢、

¹⁰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長安太原驛道〉頁 91-128。

¹¹ 關治中、李金俠，〈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00 年第 3 期，頁 111-115。

形制、維修、改建、鐵牛面向而論。¹²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屬泛論性質，未有鎮密註解。¹³

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接踵陸文而作，由於 1989 年蒲津橋東岸出土唐代鐵牛等材料，一方面是陸文未見；另一方面作者加入 1995 年實地考察，進而對橋的位置、名稱、改建、規模構造、管理維修、宋以後橋的廢棄西岸鐵牛崩毀等層面而論，¹⁴可說是目前論述蒲津橋較完整的篇章。劉永生〈古城古渡古橋——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以自身所處的博物館單位揭露蒲州、蒲津渡、蒲津橋的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¹⁵蘇涵、景國勁〈黃河蒲津渡開元鐵牛雕塑群考論〉以中文、美學角度，將鐵牛雕塑的藝術與盛唐景象作連結。¹⁶姚春敏、趙曉峰〈試論唐王朝修建「蒲津橋」的經濟目的與動機〉則從經濟視角切入，認為運送河東糧食、鹽業等資源往京城是橋樑修建原因。¹⁷雖然蒲津橋的研究不少，但各篇在論述橋的面向有所偏重，總有見樹不見林，或見林不見樹之憾，筆者以為從史籍細節處理蒲津橋與蒲津關之外，或許更應將關、橋兩者置於同一篇文章來做整體考量與闡述。

本文除前言與結語之外，中間分三章，首先從蒲津關的位置談起。《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蒲津關有位於同州與蒲州兩種說法，何說

¹² 陸敬嚴，〈蒲津大浮橋考〉，《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頁 35-41。

¹³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8 年第 4 期，頁 5-8。

¹⁴ 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文物季刊》，1999 年第 3 期，頁 52-58。

¹⁵ 劉永生，〈古城古渡古橋——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文物世界》，2000 年第 4 期，頁 4-8。

¹⁶ 蘇涵、景國勁，〈黃河蒲津渡開元鐵牛雕塑群考論〉，《晉陽學刊》，2004 年第 4 期，頁 88-91。

¹⁷ 姚春敏、趙曉峰，〈試論唐王朝修建「蒲津橋」的經濟目的與動機〉，《運城學院學報》，2008 年第 6 期，頁 18-21。

為真？涉及蒲津關位於一處或二處。其次是蒲津橋的歷史變遷與形制，以時間軸方式呈現唐以前蒲津橋的發展與使用，以及唐代蒲津橋的質材、維修單位、雜匠來源等。最後蒲津橋在玄宗開元九年與十二年的兩次增修，增修的原因與內容為何？希冀藉由連結蒲津關與蒲津橋，管窺唐代關中東北面的軍事地理。

貳、從《元和郡縣圖志》看蒲津關的位置

唐代蒲津關位置據《通典·州郡》記載，同州朝邑縣：「有蒲津關」，¹⁸《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同州朝邑縣亦載：「縣西南有蒲津關。」¹⁹此關在同州朝邑縣西南（東南之誤），北往南流之黃河右岸說法。不過，《元和郡縣圖志》對蒲津關位置有另一種說法，河中府河東縣：「蒲坂關，一名蒲津關，在縣西四里。《魏志》曰：『太祖西征馬超、韓遂，夜渡蒲津關』，即謂此也。」²⁰這段資料有三處問題須進一步解釋，第一是河中府是由哪個州升格？第二是蒲津關本在關內道，何以又出現在河東道？第三是關名何以又稱蒲坂關？首先河中府本蒲州，《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本蒲州，……開元八年置中都，為府；是年罷都，復為州。乾元三年復為府。」²¹玄宗開元八年（720）蒲州升為中都河中府，該年又降為蒲州，才會有肅宗乾元三年再次升為府。

其次是蒲津關究竟在關內道抑或河東道？《舊唐書·地理志》關

¹⁸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12，1版），卷173，〈州郡·同州·朝邑縣〉，頁4514。

¹⁹ 《元和郡縣圖志》，卷2，〈關內道·同州·韓城縣〉，頁37。

²⁰ 《元和郡縣圖志》，卷12，〈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頁326。

²¹ 《新唐書》，卷39，〈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頁999。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1版），卷38，〈地理志·關內道·同州〉，頁1400：「乾元三年，以蒲州為河中府。」

內道同州：「乾元三年，以蒲州為河中府；割朝邑縣入河中府」，²²《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河西縣記載：「開元八年析河東置，尋省。乾元三年更同州之朝邑曰河西，來屬。大曆五年復還同州，……有蒲津關，一名蒲坂。」²³比對兩唐書，河西縣乃玄宗開元八年蒲州升為河中府同時，由河東縣分置，不久又廢，才有肅宗乾元三年河中府再次出現同時，將同州朝邑縣劃歸入河中府河東縣，但朝邑縣又在代宗大曆五年（770）回到同州。換言之，蒲津關位置本在同州朝邑縣，因肅宗乾元三年朝邑縣政區調整，隸屬河中府河東縣，爾後代宗大曆五年再次回歸同州，關的位置無改變，只是隨著人為因素政區調整而隸屬有異，這也是李吉甫書中對蒲津關位置記載兩種說法原因。

又為何在同州設關？同州韓城縣東北的禹（門）口至潼關之間平曠百里，在此黃河河谷北段東邊是中條山，西邊是高原，大道難以形成，因而不需設關；南段洛河、渭河會黃河匯流其間，河道多變，黃河很難渡過，亦無需設關。唯獨中段河谷開闊，兩岸地勢平坦，水流平緩，易於渡河。²⁴中段河谷正是蒲津關設置所在，在此置關可控制關中東北行至河東、河北兩道，更因黃河天險而設有蒲津橋。

前引《新唐書·地理志》中的「乾元三年更同州之朝邑曰河西」，此處的「河西」非河西縣，而是代稱河中府，即《舊唐書·地理志》所謂「割朝邑縣入河中府」，因河西縣在玄宗開元八年分河東縣而置，不久即「尋省」，因此，肅宗乾元三年至代宗大曆五年間的蒲津關位

²² 《舊唐書》，卷 38，〈地理志·關內道·同州〉，頁 1400。

²³ 《新唐書》，卷 39，〈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頁 1000。

²⁴ 關治中、李金俠，〈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頁 111。任穎卮，〈唐代蒲州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4.4），頁 142。

於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蒲津關位於河東縣的說法即指這個時期，又《太平寰宇記》河東道蒲州河東縣：「蒲津關，在縣西二里。亦子路問津之所。魏太祖西征馬超、韓遂，夜渡蒲坂津，即此也」，²⁵同樣延續李吉甫此說而來。至於《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河西縣「開元八年析河東置，尋省。……有蒲津關」，應拆開兩部分來說，前半段「開元八年析河東置，尋省」是指河西縣由河東縣分置，後半段「有蒲津關」指的是河西縣「尋省」後，蒲津關仍在河東縣。

最後是蒲津關稱蒲坂關的原因。蒲津關初始位置在同州朝邑縣，《元和郡縣圖志》同州朝邑縣：「以北據朝阪，故以為名。」²⁶縣名與位於北側的朝阪有關，朝阪據《水經注·補洛水》：「洛水東南歷強梁原，俗謂之朝坂」，²⁷朝坂即強梁原俗稱說法，原是黃土地形上高而平坦處，朝邑縣位於強梁原上，處於縣東南的蒲津關亦在原上。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記載：

秦王即秦惠文王也。蒲版，舜舊都，其北有長版，為邑之險要，故曰蒲版。魏既獻河西之地於秦，因險設關以備秦寇，故曰蒲版關，此魏之界上關也。後其地入秦，改曰臨晉關。²⁸

朝坂在舜時稱長版，因地勢險要而曾設置為舜的都城（蒲版），

²⁵ 北宋·樂史，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11，1版），卷46，〈河東道·蒲州·河東縣〉，頁954。

²⁶ 《元和郡縣圖志》，卷2，〈關內道·同州·朝邑縣〉，頁37。《太平寰宇記》，卷28，〈關西道·同州·朝邑縣〉，頁601。

²⁷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4，1版），卷16，〈補洛水〉，頁310。

²⁸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版），〈魏紀〉，頁149引。

戰國時秦、魏兩國爭河西之地，魏國最終獻河西地於秦國，因而在此地設蒲版關作為西禦秦國之邊界關，隨著秦國勢力的增強，蒲版關周圍土地入秦國，此關亦成為秦國內關。史載秦始皇二十五年（222B.C.），即墨見齊王曰：「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²⁹魏國乃三家分晉而來，秦國索性改名稱為臨晉關。

總之，舜時有長版之稱，即後來的朝坂（阪）、強梁原，蒲版源自長版之險而置為舜舊都，蒲版關沿用「蒲版」之意，初始成為魏國設置的關隘以防秦國，爾後秦國擁其地而改稱臨晉關，終兩漢之際關皆以臨晉名稱為主。³⁰此關臨黃河而在西漢時另有河關之稱，《史記·淮陰侯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河關」依唐人司馬貞《索隱》注解：今蒲津關。³¹顯見蒲版（坂、阪）關名稱是以所在長版、朝坂（阪）、蒲坂之強梁原地形命名，³²至於蒲津關則是以臨河川而命名，³³此從河關已可見端倪，又前引《太

²⁹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1版），卷7，〈秦紀〉，頁233。前漢·劉向編集，繆文遠校注，《戰國策新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7.9，1版），卷13，〈齊六·齊王建入朝於秦章〉，頁404。

³⁰ 文獻可見前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11，2版）；後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6，1版）；前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7，1版）等。出土資料可見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1版），簡492，頁307。王子今、劉華祝，〈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頁44-52。

³¹ 《史記》，卷92，〈淮陰侯傳〉，頁2613。

³² 「蒲坂」說法可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4，1版），卷3，明皇帝〈早度蒲津關〉，頁35-36：「鳴鑿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卷64，宋璟〈蒲津迎駕〉，頁751：「回鑿下蒲坂，飛旆指秦京。」

³³ 蒲津關名稱溯源：《元和郡縣圖志》，卷12，〈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頁3

平寰宇記》稱為「蒲坂津」，這都說明此關臨河而置有渡口，不僅是陸關且是水關。《晉書·載記·苻健》：「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³⁴蒲津、蒲坂津是蒲津關渡口名稱，渡口且設有監員層級的官員駐守。

參、蒲津橋的歷史變遷與形制

一、唐以前蒲津橋的沿革

唐代蒲津橋位於河東道蒲州河東縣西，以及關內道同州朝邑縣東之間。橋樑的起源可上溯至春秋，《春秋左傳》魯昭公元年：「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杜預注：「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³⁵西元前 541 年，秦景公后子欲至晉，於黃河上建造舟橋，作為通往秦、晉間的通道，關治中、李金俠認為這就是臨晉道。³⁶《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五十年十月：「初作河橋。」張守節：「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³⁷秦昭襄王（秦昭王）50 年（257B.C.）

26 引《魏志》曰：「太祖西征馬超、韓遂，夜渡蒲津關。」《資治通鑑》，卷 172，〈陳紀〉，頁 5354 引《漢書》：「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關。」案：查閱《魏志》與《漢書》並無此記載。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11，1 版），卷 39，〈韋瑱傳〉，頁 694：「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可見南北朝後期已有蒲津關之名。

³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11，1 版），卷 112，〈載記·苻健〉，頁 2871。

³⁵ 戰國·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錄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1 版），卷 41，〈昭公〉，頁 1154。王元林以此時間為建橋時間，「西元前 541 年前，至明洪武二年（1369），約 1920 年。」詳參氏著，〈蒲津大浮橋新探〉，頁 52。

³⁶ 關治中、李金俠，〈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頁 112。

³⁷ 《史記》，卷 5，〈秦本紀〉，頁 214。陸敬嚴以此時間為橋樑修建時間，「此橋修

「初作河橋」，意味因春秋后子時舟橋毀壞，此時再建。

楚漢相爭後期，劉邦自分封地巴、蜀、漢中，暗度陳倉而後定三秦擁有關中。《史記·淮陰侯傳》記載：

漢二年，……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³⁸

魏王魏豹利用探親時機，回到自己封國後，封鎖臨晉關（河關即蒲津關），陳兵蒲坂連楚反漢。劉邦派遣韓信擊魏豹，韓信製造欲從臨晉關渡船假象，實則從左馮翊東北夏陽渡河，襲擊河東郡安邑，繞到魏豹後方使其措手不及。這裡的「陳船欲度」也說明漢初以船渡河，沒有架橋，王元林認為與黃河小北幹流河道向西擺動有一定關係，³⁹黃河河道頻繁異動，也使架設橋樑相對不易。

相較於漢代以船渡河模式，魏晉時有所改變，據《周書·文帝紀》記載：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持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

建於西元前三世紀，十三世紀廢除，約 1600 年。」詳參氏著，〈蒲津大浮橋考〉，頁 37。

³⁸ 《史記》，卷 92，〈淮陰侯傳〉，頁 2613。

³⁹ 王元林，〈隋唐以前黃渭洛匯流區河道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 年第 3 輯，頁 71、81-82。作者指出：小北幹流是指黃河禹門口至潼關段。又漢武帝中葉，小北幹流已向西擺動。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頁 53。

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鬪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眾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⁴⁰

西魏文帝大統三年（537），東魏侵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黃河，其中之一是蒲津橋，又派遣竇泰至潼關，高敖曹圍攻洛州。宇文泰以竇泰驕兵之心，且軍隊不易在五日以內完全渡橋，故先敗竇泰，高歡自然不戰而走。果然竇泰軍「未及成列」，即被宇文泰斬殺，高敖曹雖剛攻陷洛州，亦因此棄城而走，高歡為免追兵，亦撤橋退兵，可見架於黃河上的蒲津浮橋在東、西魏爭奪戰中扮演關鍵角色，而蒲津橋兩側的同州與蒲州更是兵家必爭之地。⁴¹

《通典·州郡》蒲州河東縣：「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為防。」⁴²《太平寰宇記》河東道蒲州河東縣：「蒲津關，在縣

⁴⁰ 《周書》，卷2，〈文帝紀〉，頁22。

⁴¹ 徐寧、張煥君，〈北魏末期「河東」交通及其戰略地位〉，《山西檔案》，2015年第2期，頁147-148。

⁴² 《通典》，卷179，〈州郡·蒲州·河東縣〉，頁4726。

西二里。……後魏大統四年造舟為梁，九年築城，亦關河之巨防」，⁴³究竟是西魏大統三年或四年造蒲津浮橋，或因史籍記載稍有落差，此時的浮橋仍是舟橋性質，王開認為「舟橋又稱舟梁或浮橋」，⁴⁴將舟橋與浮橋畫上等號。徐安貞〈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詩「虹橋闢晉關」、「一曲度河灣」，⁴⁵宋璟〈蒲津迎駕〉詩「長橋壓水平」，⁴⁶虹橋、長橋是時人對蒲津橋的別稱，一曲則是對橋外觀的形容。閻伯璵《河橋賦》且說此橋「屈而且抱」、「浮梁西截於長河」、「崎嶇，似火龍之飲川」，⁴⁷崎嶇有險峻或骨瘦之意，蒲津浮橋地險且細長地橫躺於黃河上，如火龍飲川。後人據此稱曲浮橋、⁴⁸（圖1）雙曲橋。⁴⁹可見蒲津橋並非直橋，而是外觀略為彎曲的舟橋。

⁴³ 《太平寰宇記》，卷 46，〈河東道·蒲州·河東縣〉，頁 954。

⁴⁴ 舟橋又稱舟梁或浮橋。詳參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8，1 版），頁 236。

⁴⁵ 《全唐詩》，卷 124，徐安貞〈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頁 1229。

⁴⁶ 《全唐詩》，卷 64，宋璟〈蒲津迎駕〉，頁 751。

⁴⁷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11，1 版），卷 395，閻伯璵《河橋賦》，頁 4024-2 至 4025-1。

⁴⁸ 唐震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1，1 版），頁 230。

⁴⁹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頁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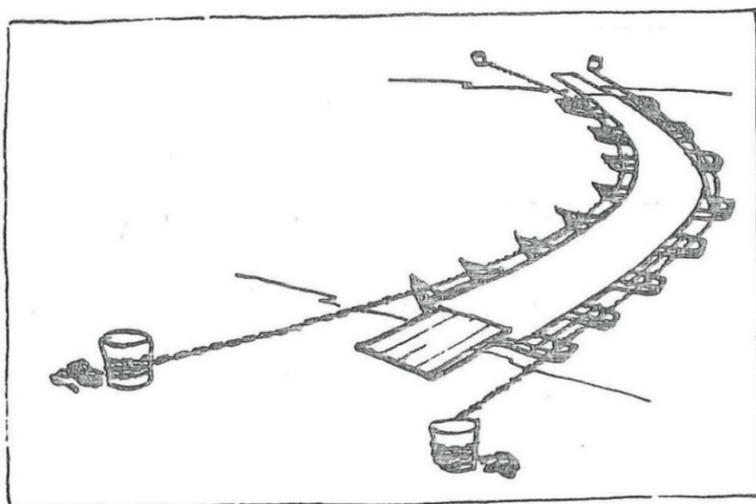


圖 1：曲浮橋

出處：唐震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頁 229。

《資治通鑑》隋紀恭皇帝義寧元年記載：「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胡三省注：「朝邑縣，……其地當蒲津橋西，唐改為河西縣，梁大河為橋，故有中潭。」⁵⁰又《冊府元龜》：「靳孝謨，仕隋朝邑縣法曹。及義兵濟河，以蒲津、中潭二城歸義，授正議大夫。」⁵¹隋末恭帝義寧元年（617），李淵西進長安，朝邑縣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投降，蒲津城疑似蒲津關城省稱，中潭是橋身中段的河中沙洲，中潭城則設置於沙洲上。胡注「梁大河為橋，故有中潭」，指蒲津橋橫跨黃河中的沙洲，由此可知隋末唐初仍有蒲津橋。

總之，唐以前唯兩漢時以舟船渡人，其餘時期皆架舟橋作為渡河方式，架橋於河上須考慮到兩岸地形、交通、河流流速、河床寬窄

⁵⁰ 《資治通鑑》，卷 184，〈隋紀〉，頁 5754。

⁵¹ 北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12，1 版），卷 766，〈總錄部十六·攀附二〉，頁 8859。

等問題。前引關治中、李金俠指出同州韓城縣東北的禹門口至潼關間，中段黃河河谷開闊，兩岸地勢平坦，水流平緩，易於渡河。禹門口北、黃河兩岸設有龍門關，陸敬嚴進一步說「從龍門到潼關一段，河床開闊，流水平緩，是架設浮橋的理想地帶」，⁵²可見此地段因地勢平，水流緩，適合設關置守，架設浮橋而過。

二、蒲津橋的形制

蒲津橋是渡黃河三橋之一。張說《蒲津橋贊》：「域中有四瀆，黃河是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衛，河東之輻輳，必由是也。」⁵³四瀆依《爾雅·釋水》記載：「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⁵⁴瀆為大河川意思，終點流向大海，如長江注東海，黃河、濟水注渤海，淮河注長江，濟水因黃河多次改道被侵占，今黃河下游就是原濟水河道。唐代橋樑依材質分舟橋、石柱橋、木柱橋三類，《唐六典·尚書工部》：

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盟津，一名河陽。洛則孝義也。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洛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也。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橋、中渭橋、東渭橋，此舉京都之衝要也。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⁵⁵

玄宗開元時朝廷修建十一座橋樑，舟橋有四，蒲津、大陽、盟津

⁵² 陸敬嚴，〈蒲津大浮橋考〉，頁 36。

⁵³ 《全唐文》，卷 226，張說《蒲津橋贊》，頁 2277-2。

⁵⁴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1 版），卷 7，〈釋水〉，頁 225。

⁵⁵ 《唐六典》，卷 7，〈尚書工部〉，頁 226。

(河陽)三座在黃河，孝義在洛水。石柱橋有四，天津、永濟、中橋三座在洛水，灞橋在灞水。木柱橋有三，便橋、中渭橋、東渭橋皆在渭川。十一座橋因居於進出京師要衝，由國營工匠負責維修，其餘橋樑則由所在州、縣隨時修繕。(表 1)

| 位置 材質 | 黃河 | 洛水 | 灞水 | 渭川 |
|----------|------------------|----------|----|------------|
| 舟梁 | 蒲津、大陽、盟津 (河陽) | 孝義 | | |
| 石柱梁 | | 天津、永濟、中橋 | 灞橋 | |
| 木柱梁 | | | | 便橋、中渭橋、東渭橋 |

出處：依《唐六典》，卷 7，〈尚書工部〉，頁 226 整理而成。

四座舟橋所需竹索、雜匠、腳船、渡船、水手等具體內容依《唐六典·尚書工部》記載：

河陽橋所須竹索，令宣、常、洪三州役工匠預支造，宣、洪二州各大索二十條，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條。大陽、蒲津竹索，每年令司竹監給竹，令津家、水手自造。其供橋雜匠，料須多少，預申所司，其匠先配近橋人充。浮橋腳船，皆預備半副；自餘調度，預備一副。河陽橋船於潭、洪二州造送；大陽、蒲津橋於嵐、石、隰、勝、慈等州採木，送橋所造。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橋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蒲津橋一十

五人。孝義橋所須竹索，取河陽橋退者以充。⁵⁶

首先是維護舟橋兩側安危，以及固定橋身的竹索。蒲津橋與大陽橋同，每年由司竹監提供竹子，司竹監隸屬中央九寺之一的司農寺，屬正七品下層級，「掌植養園竹」，⁵⁷交付津家、水手製造。從四座舟橋的竹子供應商而言，大陽與蒲津兩座橋由直隸中央司農寺轄屬司竹監提供，並且能由諳水性的「津家」、「水手」製造，規模較大。河陽橋由地方供應與州內工匠製造，重要性次於大陽與蒲津兩橋。孝義橋竹索則取自河陽橋汰換後的，受重視程度最低。

其次是供橋樑使用的雜匠，預先申報所需人數、維修材料給所屬單位，由離橋較近的人員擔任。再者，運送浮橋（舟橋）的腳船預留半副，其餘則預留一副。復次是船隻的製造，蒲津橋與大陽橋同，由嵐、石、隰、勝、慈等州採木後，再送往橋樑處製造，想見規模之大才能自行造船。最後是水手數量，蒲津橋水手僅 15 人，黃河上的蒲津、大陽、河陽三橋兼有船與水手，但蒲津橋水手數量較河陽橋、大陽橋少許多，可見唐代渡黃河中段有蒲津橋與船隻兩種方式，但過橋渡河仍是主要模式。

⁵⁶ 《唐六典》，卷 7，〈尚書工部〉，頁 226。案：「校勘記」（頁 237）認為「河陽橋所須竹索」之「橋」下有「每年」二字。「每年令司竹監給竹」之「每年」作「每三年一度」。

⁵⁷ 《舊唐書》，卷 44，〈職官志〉，頁 1887。

肆、蒲津橋的兩次增修

一、玄宗開元九年（721）

唐代蒲津橋的增修始於玄宗開元九年（721）。《唐會要·橋梁》：「開元九年十二月九日，增修蒲津橋，絙以竹葦，引以鐵牛，命兵部尚書張說刻石為頌。」⁵⁸《資治通鑑》玄宗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以繫絙。」⁵⁹絙是緹的異體字，《說文解字》釋「緹」：「大索也」，⁶⁰此次增修蒲津橋主要是以鐵牛繫綁大竹索，強化橋樑的穩定度，同時令張說刻石稱頌。

關於這次增修蒲津橋的原因有二種說法。第一是與蒲州升格為中都河中府有關，前引《新唐書·地理志》玄宗開元八年（720）蒲州升為河中府，《通典·州郡·蒲州》記載：「大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仍舊」，⁶¹蒲州升格為府的時間在史籍記載上些許落差，但皆在蒲津橋增修前，王開、嚴耕望皆以為「增修蒲津橋可能與河中府建『中都』有關」，⁶²州升府，層級提升，對於境內建設經費相對增加，是以有後續修建。

第二是與河東道資源有關，《新唐書·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

⁵⁸ 北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5，1版），卷86，〈橋梁〉，頁1350。

⁵⁹ 《資治通鑑》，卷212，〈唐紀〉，頁6748。

⁶⁰ 後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2版），十三篇上「糸」部，頁659。

⁶¹ 《通典》，卷179，〈州郡·蒲州〉，頁4726。

⁶²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236。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102-103。

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⁶³姚春敏、趙曉峰認為河東地區有肥沃、平坦土地，且黃河不遠處有鹽池，蒲津橋居通往長安的門戶要道，卻在開元初瀕臨破敗，是以張說奏請玄宗建新橋。⁶⁴高顯則以河東的池鹽採鹽便利，產量很高，與兩京的距離又比較近，對關中尤為重要。⁶⁵丁俊提出所謂「京邑所資」的河東地區，就是指山西中南部的黃河流域及其支流所在的蒲、晉、絳、汾諸州。⁶⁶

牛忠菁、馮俊則從蒲州升格為河中府原因談起，認為一方面蒲州是河東地區通往關中的物資供應樞紐有關，更重要的一面乃是河中府是長安的東面防線，起著屏障長安的作用。⁶⁷河東蒲州鹽池產鹽，利潤占天下賦稅之半，睿宗景雲四年，令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⁶⁸

⁶³ 《新唐書》，卷 54，〈食貨志〉，頁 1377-1378。

⁶⁴ 姚春敏、趙曉峰，〈試論唐王朝修建「蒲津橋」的經濟目的與動機〉，頁 18、20。趙曉峰以為唐朝重視河東地區原因有三：王朝的根基、糧食、鹽業資源。詳參氏著，〈唐代河東倍受重視探因〉，《運城學院學報》，2009 年第 3 期，頁 37-39。

⁶⁵ 高顯，〈論蒲州在唐代軍事中的重要地位〉，《運城學院學報》，2015 年第 5 期，頁 33。

⁶⁶ 丁俊，〈唐玄宗置中都之始末及其深層意義〉，《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4 期，頁 49。

⁶⁷ 牛忠菁、馮俊，〈唐宋時期河中府的遷革〉，《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 年第 4 期，頁 11。

⁶⁸ 《舊唐書》，卷 48，〈食貨志〉，頁 2110。關於睿宗景雲四年「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此事，李錦綉以為「景雲二年太平公主被太子黨排擠到蒲州後，利用其黨羽裴談身為蒲州刺史、又跨行政區劃兼關內鹽池使的機會，控制京師地區和朔方軍的食鹽供應，迫使太子李隆基低頭，主動請求太平公主回京，由此太平公主成為唐朝歷史上第一個用鹽進行政治鬥爭之人。」詳見氏著，〈「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與景雲政治〉，《學術集林》第十卷（1997.8），頁 282-297。于賡哲則持不同意見，「京師、朔方軍的「食鹽短缺」是不存在的，而朔方軍的控制權在這段時間裡非但沒有旁落，反而被太子黨愈加牢固地握於手中。」詳見氏著，〈對「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與景雲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頁 104-107。

河東蒲州控制關內道鹽池，進一步連結河東道與京師關係。對於河東蒲州鹽的取得，乃至於蒲州作為關中東面屏障與西入長安的轉運地，重視蒲州進而升格於府，也連帶影響蒲津橋增修，此橋畢竟起到連接河東道與關內道的軍事國防與經濟作用，具有維繫與往來長安東面交通舉足輕重地位，當然不能允許它不堪使用。總之，此次增修橋樑兩種原因皆與河東道的蒲州相關。

二、玄宗開元十二年（724）

玄宗開元九年對蒲津橋增修只能說是小規模，開元十二年（724）算是徹底改造，甚至以「重新建造」來形容亦不為過。⁶⁹依張說《蒲津橋贊》載：

舊制，橫絕百丈，連艦千艘，辦修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白、如堆如阜、或縱或捩、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於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受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蒞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煉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鎖，鎔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潭，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

⁶⁹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頁5。

疏其舟閒，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溢。⁷⁰

舊有蒲津橋以竹索百丈連結數艘舟船，四周以圍木加以固定，兩側以竹纜拉起橋樑。然而，黃河冬天易結冰，春天時未完全結冰的冬冰，以及初融春冰隨流傾瀉而下，冰塊之堅，流速之快，如利刃般，往往使竹索斷裂，舟船破壞，年年如此，徒增耗費，罪及官員挨告，工匠徒勞。因此，開元十二年玄宗「授彼有司」，針對先前問題重修此橋。

1. 俾鐵代竹，伏牛連鎖

開元十二年蒲津橋改善方針，首先是「俾鐵代竹」，舊制「竹索」連結舟船方式，改為鐵索，上鋪木板，兩側的「竹纜」也改成鐵鏈，以鐵鏈的堅取代竹纜的脆，所謂「取堅易脆」，延長使用時間。正如閻伯瓊《河橋賦》云：「鐵牛駭浮川之魍魎，……竹竿其維，不虞於奔濤擘赫；金鑠斯纜，何懼於層冰皜峨？」⁷¹目的在以鐵代竹，抵抗冬、春之際融冰的切割。

《元和郡縣圖志》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蒲津關記載：「今造舟為梁，其制甚盛。每歲徵竹索價謂之橋腳錢，數至二萬，亦關河之巨防焉。」⁷²憲宗時用於蒲津橋的竹索，每年課徵二萬錢，可見此時用竹索。鐵索橋在德宗時是一個轉折點，據《資治通鑑》德宗興元元年（784）三月條：

（李）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怒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及富平，……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

⁷⁰ 《全唐文》，卷 226，張說《蒲津橋贊》，頁 2277-2。

⁷¹ 《全唐文》，卷 395，閻伯瓊《河橋賦》，頁 4025-1。

⁷² 《元和郡縣圖志》，卷 12，〈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蒲津關〉，頁 326。

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⁷³

呂鳴岳以兵少恐無法擋住李懷光，故焚毀蒲津橋使懷光無法渡河至河中府，鐵索蒲津橋可能毀於此時，才有後來憲宗時的竹索橋。又《新唐書·李固言傳》：「武宗立，……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⁷⁴武宗時，年年河水損壞蒲津橋，於是官員撤舟橋，改用船渡人。換言之，玄宗開元十二年以前是以竹索固定舟橋，以後改用鐵索，德宗時鐵索橋毀，憲宗時（806-820）用竹索橋，武宗（841-846）撤橋改舟，唐代使用鐵索橋百年或者不到，竹索橋仍是此橋主要方式，竹的材質雖不如鐵堅硬，但較柔韌，或許更能適應河水之柔。

為使鐵鏈有所憑藉，於河兩岸鑄鐵牛繫之。⁷⁵《通典·州郡》蒲州河東縣：「大唐開元十二年，河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⁷⁶蒲津橋兩側的同州與蒲州各有四鐵牛、鐵人（圖2、3），鐵人駕鐵牛。《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記載：「有蒲津關，一名蒲坂。

⁷³ 《資治通鑑》，卷230，〈唐紀〉，頁7417。

⁷⁴ 《新唐書》，卷182，〈李固言傳〉，頁5358。

⁷⁵ 丁宏認為中國古代的大型銅、鐵鑄件（如鐵牛）在河流邊鑄造，一方面是鐵牛等鐵鑄件用來鎮水的傳統文化習俗；另一方面水流旁便於使用臥輪式水排作為鼓風設備，從而提升冶鑄效率的實際技術。水排是中國古代最早利用水力進行冶鐵的鼓風設備，蒲津橋旁的鐵鑄件即是運用此概念。詳見氏著，〈水排在古代大型冶鐵工程上的應用—以蒲津橋的冶鑄實物為例〉，《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2年第2期，頁71-76。

⁷⁶ 《通典》，卷179，〈州郡·蒲州·河東縣〉，頁4726。「鐵牛分南北兩組。兩牛一組，前後擺列，面朝西。」詳參劉永生，〈古城古渡古橋——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頁7。

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⁷⁷1989年8月《中國文物報》記載「唐開元有鐵牛、鐵人、鐵山、鐵柱」，鐵牛外觀「高約1.9米，長約3米，寬約1.3米，牛尾後有橫軸，直徑約0.4米，長約2.3米，前腿作蹬狀，後腿作蹲伏狀，矯角、昂首、瞋目，牛體矯健強壯。尾施鐵軸，以繫浮橋」，鐵柱「6根直徑0.4米，長約3.6米的鐵柱斜前連接，每根鐵柱分別有反向出伸鐵足各一，功能同地錨。」⁷⁸比對文獻記載與出土資料，「牛下有山」的「山」即鐵山，類如坐墊般的鐵盤，鐵牛底下有鐵山（鐵盤），盤下有鐵柱，牛尾有鐵軸用來繫浮橋兩旁的鐵鏈。⁷⁹鐵柱一端連結鐵牛腹部，一端「入地丈餘」，支撐鐵牛與鐵盤，鐵人在側各自駕馭鐵牛。⁸⁰

⁷⁷ 《新唐書》，卷39，〈地理志·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頁1000。

⁷⁸ 劉永生，〈古城古渡古橋——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頁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黃河蒲津渡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3，1版）。

⁷⁹ 陸敬嚴認為鐵柱除有穿過鐵牛腹部而入地之外，另有一種是設置在鐵牛前，上呈球形，繫鐵鏈用。詳參氏著，〈蒲津大浮橋考〉，頁39。案：陸氏所說設置在鐵牛前的鐵柱，與置於鐵牛尾巴的鐵軸，同樣皆用來繫鐵鏈用，是否有差別？筆者以為鐵牛前的鐵柱可能是作為牽引船隻靠岸用，鐵牛尾的鐵軸則是專用於固定橋樑的鐵鏈。

⁸⁰ 「四尊鐵人服飾神貌各不相同，身高均在1.9米至2米之間，體重均有2噸之多，分置於鐵牛兩側，各作吆喝或牽曳之狀。」詳參蘇涵、景國勁，〈黃河蒲津渡開元鐵牛雕塑群考論〉，頁89。白燕培分析出土四尊鐵人，表情不盡相同，分別代表維吾爾族、蒙古族、藏族、漢族。詳見氏著，〈黃河蒲津渡唐開元鐵牛及鐵人雕塑考〉，《農業考古》，2018年第1期，頁228-229。



圖 2：鐵牛



圖 3：鐵人與鐵牛

出處：劉永生，〈古城古渡古橋——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頁 6-7。

出土資料所示 6 根鐵柱斜前連接鐵盤，無法與《通典·州郡》記載「前後鐵柱十六」數量吻合，意味仍有未出土鐵柱。又嚴耕望提及「每一牛下並鑄前後鐵柱各一」，⁸¹可見連接鐵牛腹部的鐵柱，以前後各一鐵柱同時連接著鐵盤，一隻鐵牛前後二隻鐵柱，河兩岸各四隻鐵牛，一側八根鐵柱，合計十六根鐵柱。⁸²唐代用鐵鑄造大型工程可說已達到高峰。⁸³

2.襟束於中渾

蒲津橋橫跨黃河兩岸，為使舟橋於河中有緩點，免於河流湍急時造成橋身擺動，是有設置中渾，讓橋分兩段，河水分流。薛能《題河中亭子》詩云：「河擘雙流島在中，島中亭子正南空」，⁸⁴島居河中，黃河雙擘分流。日僧圓仁於文宗開成五年（840）8 月 13 日由絳州南

⁸¹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100。

⁸² 「鐵牛各重約 30 噸左右，下有底盤和鐵柱，各重約 40 噸。」詳參姚春敏、趙曉峰，〈試論唐王朝修建「蒲津橋」的經濟目的與動機〉，頁 21。

⁸³ 白雲翔，〈隋唐時期鐵器與鐵器工業的考古學論述〉，《考古與文物》，2017 年第 4 期，頁 72。

⁸⁴ 《全唐詩》，卷 560，薛能〈題河中亭子〉，頁 6506。

行：

到河中節度府。黃河從城西邊向南流。黃河從河中府已北向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東流。從北入，舜西門出，側有蒲津關。到關得勘入。便渡黃河。浮船造橋，闊二百步許。黃河西流，造橋兩處。南流不遠，兩派合。……十五日發，西行卅里，到朝邑縣。⁸⁵

圓仁從河東道絳州南行至河中府（蒲州），西行渡蒲津關，關門官員勘過所憑證後，僧人即透過蒲津橋渡河，此處蒲津關顯然位於蒲州，與同州蒲津關隔橋對峙於河兩岸。換言之，蒲津關在文宗朝是兩關兩處而同名，有別於先前行政區調整的一處關名。（圖 4）

⁸⁵ 日·圓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著，周一良審閱，《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11，1版），卷3，頁329-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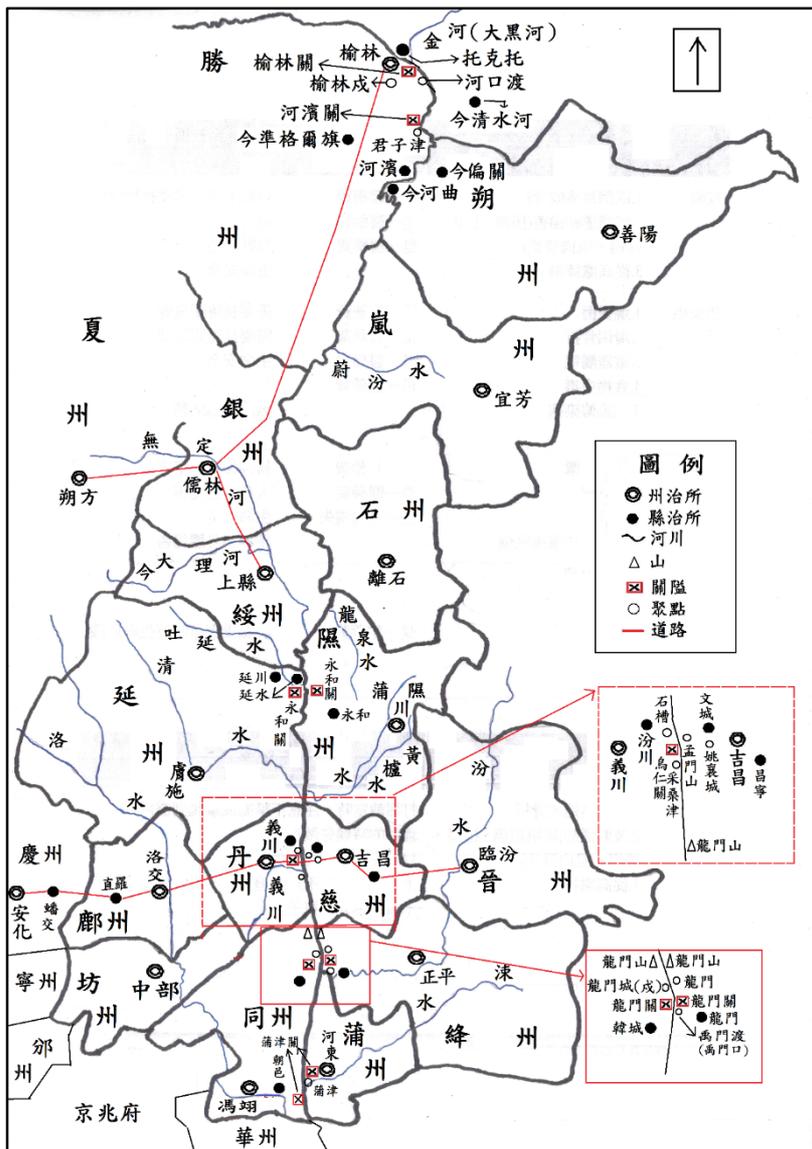


圖 4：勝州至同州黃河段諸關考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46-47 改繪。

蒲津浮橋寬 200 多步，唐時 1 步 5 尺，⁸⁶若取整數則寬度是 1000 唐尺，根據陳夢家說法，1 唐（大）里=1800 唐尺=531 米，⁸⁷則橋的寬度 295 公尺（ $\frac{531 \times 1000}{1800}$ ），實際上當是超過這寬度。圓仁從河東過橋渡河，見到橋中間有中渾，不僅黃河在此分流，也使橋分兩段，故曰「造橋兩處」，過中渾後，黃河又往南流匯合。《爾雅·釋水》：「渾，沙出」，郭璞注：「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渾。」釋曰：「言渾者是沙堆出於水中之名也，故名沙出。」⁸⁸渾是水中沙堆為洲，即沙洲之意，蒲津橋跨黃河之河中沙洲（渾），中渾又稱雞心灘、⁸⁹河心州、⁹⁰洲渚。⁹¹（圖 5）中渾不僅能使橋身於河中有緩和點，減緩河水沖刷力，同時縮短橋身製造時的長度，架橋更為方便，穩定度也相對提高，可見中渾具有「襟束」黃河兩岸蒲津橋於河中之效，亦如薛能詩中所謂「島在中」，至於「島中亭子」指的是中渾上設置的中渾城。

⁸⁶ 王元林：二百步許以二百一十步當之，則唐代蒲津橋長應為：210×5=1050（唐尺）=105 唐丈，折合今制應為 309.75 米。詳參氏著，〈蒲津大浮橋新探〉，頁 55。「闊二百步許」，關治中、李金俠與王元林同，皆將「闊」釋為長度，詳參氏著，〈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頁 113。

⁸⁷ 陳夢家，〈畝制與里制〉，《考古》，1966 年第 1 期，頁 40-41。

⁸⁸ 《爾雅注疏》，卷 7，〈釋水〉，頁 219。

⁸⁹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頁 7。

⁹⁰ 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頁 52。

⁹¹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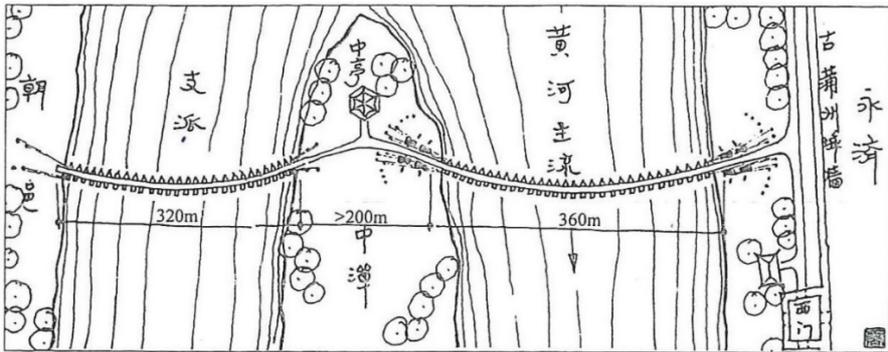


圖 5：唐代蒲津橋復原示意圖

出處：唐震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頁 232。

中潭城的設置始於東魏。《元和郡縣圖志》：「中潭城，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築之，仍置河陽關」，⁹²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538）設置中潭城，並於城中置有河陽關。北朝後期東、西魏在此城互有角力戰，《北齊書·暴顯傳》：「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潭城。」⁹³東魏高歡曾命暴顯據守中潭城。《周書·韋瑱傳》：「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⁹⁴西魏文帝大統八年（542），高歡侵襲汾、絳，韋瑱跟隨宇文泰抵禦，事後，韋瑱以原官職鎮守蒲津關，兼中潭城主。又圓仁過橋時經過「七重門」，⁹⁵每道門理應有駐守人員嚴守，⁹⁶「七重門」或許即在中潭城內。《舊唐書·高祖紀》大業十三年九

⁹² 《元和郡縣圖志》，卷 5，〈河南道·河南府·河陽縣〉，頁 144。

⁹³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11，1 版），卷 41，〈暴顯傳〉，頁 535-536。

⁹⁴ 《周書》，卷 39，〈韋瑱傳〉，頁 694。

⁹⁵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 3，頁 329。

⁹⁶ 關治中、李金俠，〈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頁 113。

月：

戊午，高祖親率眾圍河東，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還。文武將吏請高祖領太尉，加置僚佐，從之。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來降。庚申，高祖率軍濟河，舍于長春宮。⁹⁷

先是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李淵率眾包圍河東（蒲州）的屈突通，未果，即由絳州西趨龍門，龍門南下再至蒲州，經蒲津橋至同州，避開由絳州西南直至蒲州，⁹⁸加上華州華陰縣令李孝常以永豐倉來投降後，李淵得以順利渡河，駐軍長春宮。⁹⁹

長春宮歷史背景，據《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同州朝邑縣記載：「長春宮，後周武帝置。隋大業十三年，高祖起義兵，自太原舍於此宮，休甲養士，而定京邑。」¹⁰⁰宋人對此宮有較詳細記錄，《太平寰宇記》同州朝邑縣：

長春宮，在強梁原上。周武帝保定五年，宇文護所築，初名晉城。武帝建德二年置長春宮。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增構殿宇。煬帝大業十三年，高祖起義兵，自太原赴京師，九月大軍濟河，舍於此宮，休甲養士，而西定京邑。自後凡牧此州，多帶長春

⁹⁷ 《舊唐書》，卷1，〈高祖紀〉，頁4。

⁹⁸ 史念海，〈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收錄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版），頁9。

⁹⁹ 關於李淵入關中的渡河地點，方亞光考證河東郡城（山西永濟縣）與臨晉（陝西韓城）兩處說法，得出韓城是先遣之師所經地，河東郡城才是渡河入關的主力。詳見方亞光，〈關於李淵集團入居關中的兩個問題〉，《齊魯學刊》，1985年第3期，頁33-34。

¹⁰⁰ 《元和郡縣圖志》，卷2，〈關內道·同州·朝邑縣〉，頁38。

宮使。¹⁰¹

北周武帝保定五年(565),宇文護在強梁原上興建長春宮,初名晉城。同州朝邑縣亦在強梁原上,原上西北有洛水流經,又稱朝坂。¹⁰²建德二年(573)晉城改稱長春宮,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增建殿宇,由於地理位置特殊,李淵西入長安後,凡為同州牧者,多兼長春宮使。正因為唐軍駐紮於原上長春宮,身為朝邑縣法曹的靳孝謨備感壓力,是以恭帝義寧元年(617)九月以蒲津(關)、中潭二城投降。¹⁰³

3.厭水物、奠浮梁/疏其舟間、畫其鷁首/石堤

中潭與中潭城使橋分兩段,支撐橋身中段,提高穩定與降低架橋難度。除此之外,也可透過「厭水物、奠浮梁」方式,使用與水不相容物放置於橋下(類如橋墩)以墊高浮橋,使橋身更為平穩。「疏其舟間、畫其鷁首」指疏畫舟間與鷁首,鷁首指船頭,泛指船,疏通舟船行駛的河道,清除浮橋附近障礙物,務使黃河於初春冰融之際能暢通無阻。這兩項皆是在提高橋樑穩定度與延長使用時間,減少其受到破壞。

橋樑河岸邊建有護岸石堤,此部分不見於《蒲津橋贊》,而出現在唐詩記載。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長堤春樹發」,¹⁰⁴張說《奉和聖製度蒲關應制》:「樓映行宮日,堤含宮樹春。」¹⁰⁵護岸長

¹⁰¹ 《太平寰宇記》,卷28,〈關西道〉,頁602。

¹⁰² 《水經注校釋》,卷16,〈補洛水〉,頁310。

¹⁰³ 《資治通鑑》,卷184,〈隋紀〉,頁5754。

¹⁰⁴ 唐·張九齡著,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11,1版),卷1,〈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頁3-5。

¹⁰⁵ 《全唐詩》,卷88,張說〈奉和聖製度蒲關應制〉,頁964。

堤不僅存在唐，明清乃至現代皆有在維修與重建，《永濟縣志》記載：

明清兩代，在蒲州城西屢築護岸堤，以保護城池。同時也保護了部分河灘地。……1967年，在蒲州老城西北角修築護岸石堤，長4.8公里，修護城堤280米。¹⁰⁶

河岸、城池的石堤一方面起到保護河道的作用；另一方面與蒲津關、橋形成大河兩岸系列防禦體。（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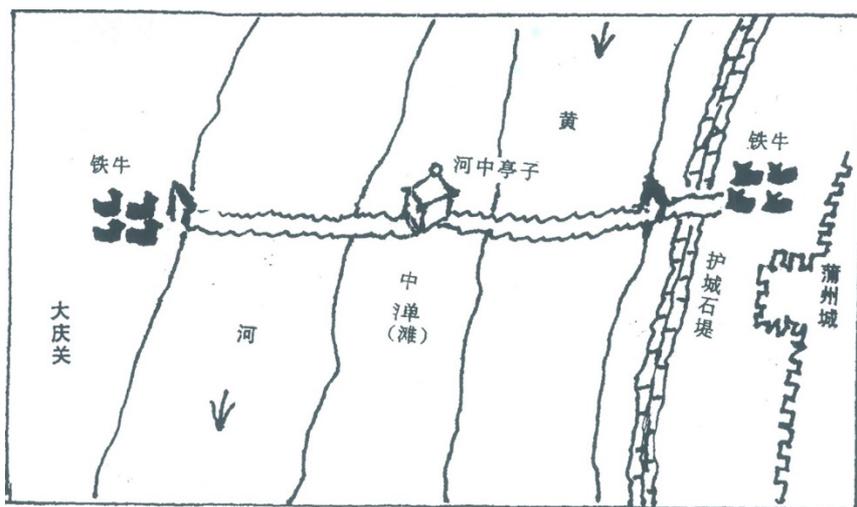


圖6：唐代蒲津大浮橋示意圖

出處：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頁7。

伍、結語

史載唐代蒲津關位置有關內道同州朝邑縣東南，以及河東道蒲

¹⁰⁶ 永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永濟縣志》（第七卷）（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2，1版），〈灘塗開發·開發工程〉，頁114築堤。

州（河中府）河東縣西兩種說法。比對文獻可知，蒲津關本在同州朝邑縣，因肅宗乾元三年朝邑縣政區調整，隸屬河中府河東縣，爾後代宗大曆五年再次回歸同州，關的位置無改變，只是隨著人為因素政區調整而隸屬有異，屬於一關同名而位於河的西岸。又從日僧圓仁於文宗開成五年由絳州南行至河中府，再西行渡蒲津關，可見此時的蒲津關確實是兩關同名而位於河兩岸。

同州朝邑縣的蒲津關居強梁原上，俗稱朝坂，舜時稱長版，戰國時魏國因獻河西地予秦，故設置蒲版關以防秦國，爾後秦國擁其地而改稱臨晉關，此關臨黃河而在西漢時另有河關之稱，並設有蒲津或蒲坂津渡口，有監員層級的官員駐守。總之，蒲版（坂、阪）關名稱是以所在長版、朝坂（阪）、蒲坂之強梁原地形命名，蒲津關則是以臨黃河而名之。至於稱蒲津關或蒲關則是南北朝後期普遍用語。同州韓城縣東北的禹（門）口至潼關間地勢平坦，水流平緩，正是蒲津關與蒲津橋設置於此原因。地方貢物每年運抵京師，經河東、河北者由蒲津關西進長安，作為古代入關中三道之一的「隙道」，控制著長安往同州，以及由同州跨黃河至河東道的路線，大抵長安東行微北分南、北道至同州，以南道較捷，唐人多取道於此。

蒲津橋是渡黃河三橋之一，唐以前唯兩漢時以舟船渡人，其餘時期皆架舟橋作為渡河方式。橋的材質屬舟橋，因位於進出都城要衝，由國營工匠負責維修。首先，每年直隸中央九寺之一的司農寺轄屬司竹監提供竹子，同時交付諳水性的「津家」、「水手」製造竹索。其次，供橋樑使用的雜匠，預先申報所需人數、維修材料給所屬單位，由離橋較近的人員擔任。復次，運送舟橋的腳船預留半副，船體由嵐、石、隰、勝、慈等州採木後，再送往橋樑處製造，想見有自行造船的規模。最後是水手數量，蒲津橋水手僅 15 人，可見唐代渡黃

河中段有蒲津橋與船隻兩種方式，但過橋跨河仍是主要模式。

唐代蒲津橋的增修始於玄宗開元九年（721），內容是以鐵牛繫綁粗大竹製繩索，強化橋樑的穩定度。原因有二，第一是蒲州升格為中都河中府，層級提升，增加境內建設經費，是以有後續修建。第二是河東地區土地肥沃且離黃河不遠處有鹽池，此橋對於河東資源與往來長安的交通，具有國防與經濟地位，當然不能允許它不堪使用。兩種原因皆與河東道蒲州有關。第二次增修在開元十二年（724），涉及層面有四：首先是「俾鐵代竹」，鐵索取代竹索的連結舟船方式，兩側亦改為鐵鏈，以鐵代竹，有助於抵抗冬、春之交融冰的切割。憲宗時用竹索，武宗撤橋改舟，可見唐代使用鐵索橋方式百年或者不到，竹索橋仍是主要方式，或許是竹的柔韌，反而更能適應河水之柔。為使鐵鏈有所憑藉，於河兩岸鑄鐵牛繫之，橋的兩側各有四鐵牛、鐵人，鐵牛底下有鐵盤，盤下有鐵柱，牛尾有鐵軸用來繫鐵鏈。鐵柱一端連結鐵牛腹部，一端「入地丈餘」，以前後各一鐵柱同時連接著鐵盤，一隻鐵牛前後二隻鐵柱，鐵柱支撐鐵牛與鐵盤，鐵人則在側各自駕馭鐵牛。

其次是「襟束於中渾」，中渾乃是河中沙洲，又稱雞心灘、河心州、洲渚。一方面使橋分兩段，河水分流；另一方面縮短橋樑製造時的長度，降低製橋難度，使架橋更方便，穩定度相對提高。中渾上設有城與城主，中渾城的設置始於東魏，內有「七重門」，每道門有人員嚴守。接著是「厭水物、奠浮梁」，與水不相容物放置於橋下（類如橋墩）以墊高浮橋，使橋身更為平穩。又「疏其舟閒、畫其鷁首」指疏通河道，務使黃河於初春冰融之際能暢通無阻。最後是河岸興建的「石堤」，一方面具有保護河道作用；另一方面與蒲津關、橋形成防禦體系。綜上所述，黃河中段所以設置蒲津關與蒲津橋，自然因

素是水流平緩適合置關、橋戍守；人為因素是連結關內道與河東道涉及的軍事安全與經濟考量，關與橋的搭配，以及河岸的附屬建築，宿衛著唐代關中東北面的國防安危。

參考書目

一、文獻與出土資料

-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版。
- 戰國·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錄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1版。
- 前漢·劉向編集，繆文遠校注，《戰國策新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7.9，1版。
- 前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11，2版。
- 前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7，1版。
- 後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6，1版。
- 後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2版。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1版。
-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4，1版。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1，1版。
-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12，1版。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

- 1983.6, 1版。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11,1版。
-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11,1版。
-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11,1版。
-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8,1版。
- 唐·張九齡著,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11,1版。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1版。
-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1版。
- 北宋·樂史,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11,1版。
-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1版。
- 北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5,1版。
- 北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12,1版。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4,1版。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11,1版。
- 日·圓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著,周一良審閱,《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11,1版。
- 永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永濟縣志》,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2,1版。
-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1版。

二、專書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黃河蒲津渡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3，1版。
-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8，1版。
- 唐寰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1，1版。
- 蔡坤倫，《唐代關防——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秀威出版社，2020.5。
-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7，1版。
- 簡錦松，《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10，初版。
- 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9，1版。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10，1版。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

三、期刊、學位與專書論文

- 丁宏，〈水排在古代大型冶鐵工程上的應用—以蒲津橋的冶鑄實物為例〉，《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2年第2期，頁71-76。
- 丁俊，〈唐玄宗置中都之始末及其深層意義〉，《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頁48-55。
- 于賡哲，〈對「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與景雲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頁104-107。

- 方亞光，〈關於李淵集團入居關中的兩個問題〉，《齊魯學刊》，1985年第3期，頁33-35。
- 牛忠菁、馮俊，〈唐宋時期河中府的遷革〉，《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頁10-15。
- 王子今、劉華祝，〈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頁44-52。
- 王元林，〈隋唐以前黃渭洛匯流區河道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頁71-87。
- 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頁52-58。
- 史念海，〈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收錄氏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版，頁1-57。
- 白雲翔，〈隋唐時期鐵器與鐵器工業的考古學論述〉，《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4期，頁65-76。
- 白燕培，〈黃河蒲津渡唐開元鐵牛及鐵人雕塑考〉，《農業考古》，2018年第1期，頁228-231。
- 任穎卮，〈唐代蒲州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4.4，頁1-231。
- 李錦綉，〈「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與景雲政治〉，《學術集林》第十卷（1997.8），頁282-297。
- 姚春敏、趙曉峰，〈試論唐王朝修建「蒲津橋」的經濟目的與動機〉，《運城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頁18-21。
- 徐寧、張煥君，〈北魏末期「河東」交通及其戰略地位〉，《山西檔案》，2015年第2期，頁146-149。
- 高顯，〈論蒲州在唐代軍事中的重要地位〉，《運城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頁32-35。

-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頁5-8。
- 陳夢家，〈畝制與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頁36-45。
- 陸敬巖，〈蒲津大浮橋考〉，《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1期，頁35-41。
- 趙曉峰，〈唐代河東倍受重視探因〉，《運城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頁36-39。
- 劉永生，〈古城古渡古橋——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文物世界》，2000年第4期，頁4-8。
- 關治中、李金俠，〈臨晉關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五〉，《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頁111-115。
- 蘇涵、景國勁，〈黃河蒲津渡開元鐵牛雕塑群考論〉，《晉陽學刊》，2004年第4期，頁88-91。

學術史脈絡下的竹塹研究回顧

牟立邦*

摘要

自1990年代起，地方性研究逐步興盛，地方學已成為形塑臺灣各地區的重要顯學，是建構對當地研究的基礎，也是呈現地域多元發展特色的依託所在。竹塹多族群文化的歷史，使得其地域發展充滿豐富的多元性，加以書香世家迭出，相關文獻浩繁，不少資料得留存至今。這樣的特殊性和機緣性，也促成現今新竹地方學研究的鼎盛蓬勃。但是在深入竹塹地域空間，進行學術回顧探究之時，或許是礙於研究者對主題的設置，多數涉及學術回顧的歷史書寫，時常聚焦在單一議題或僅侷限於本身學科之上，未能充分擴展至整體發展脈絡的演繹剖析，因此甚難真正完整詮釋竹塹地域和空間研究的連貫性及立體性。本文亦試圖由此作為突破，梳理由戰後以來竹塹地域空間中的關鍵推動學者，兼及是重要之題材研究創新，除打破制式條例摘要性的研究回顧寫作外，同時將臺灣社會演變的歷程，同步納入竹塹學整體學術發展中進行參照，勾勒出研究脈絡的整體，與社會氛圍交織的情況，冀盼能為竹塹地域空間的學術研究，描繪出一基本學術史輪廓，亦為現今臺灣地方學盡一絲綿薄貢獻。

關鍵字：新竹學、地方學、地方志、學術綜述、臺灣學術史

*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Review of Zhu-Qia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Li-Pang Mou**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have flourish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Taiwan's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has built the foundation of Taiwan's history and served a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diverse society. Due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Zhu-Qian area, the local development has been full of diversity in the past. Thank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local society, many historical documents have been collected. Such a special opportunit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local studies in Hsinchu. At present, probably due to the themes, most of the existing academic reviews of Zhu-Qian studies focus on a single topic, or are confined to their own disciplines, failing to expand the discussion to the whol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change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literature review,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key scholars who have promoted Zhu-Qian studies since 1950, discusses the creativity of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society, so as to present a whole picture of Zhu-Qian studies. Finally,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and Taiwan history.

**Keywords : Hsinchu Studies, Local Historical, Chorography, Studies
Zhu-Qian, Studies History of Taiwan Scholarship**

壹、緒論

竹塹為現今新竹的古地名稱呼，緣由來自於當地以前的道卡斯族族語中，該居住地發音音譯「竹塹」而來。

¹其地理區域大抵為頭前溪、鳳山溪所形成沖積平原區塊，大抵正是今日新竹縣市的行政區域。其東南北三面受丘陵環拱，西則臨臺灣海峽，北銜湖口臺地及飛鳳山丘陵，南倚竹東丘陵，故地勢由東南向西北遞降。自古境內東部丘陵、山地便是泰雅族、賽夏族的生活領域，²西半部平地帶則為道卡斯族的活動場所。³即便是荷西殖民統治臺灣時期（1624-1662年），竹塹地域多半仍保持原始態樣。⁴明清以降，漢人的移墾遷入，不時引發漢原民衝突，故1761年（乾隆26年）劃設土牛溝，作為漢、原域界，橫切兩造文化。相較此時南臺灣土地的開發情況，地處丘陵地帶的竹塹地域，呈現各族群（除原住民族外亦包含客家族群、閩南族群）或分立自處、或競爭合作的多樣面特性存在。日治及民國以後，蓋諸多各式因素，行政區域歷經多次調整，至1982年新竹縣市分治，遂演變為其今形日貌。

竹塹多族群文化的歷史進程，使得本身的地域發展充滿豐富的多元性，加以書香世家迭出，相關文獻浩繁，不少資料得留存至今。這樣的特殊性和機緣性，也促成現今有關新竹地方學之研究的鼎盛

¹ 竹塹名稱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是取原居住新竹平原上的道卡斯族所用之「竹塹社」音譯；二是因為「環植荊竹圍城」而得名。經考證，第一種為稱呼用語緣起，後者則為用詞附加確定，兩者相輔相成，方得竹塹。

²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官方網頁（檢索時間2021年4月8日）：https://indigenous.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299&s=4222

³ 參原住民族文獻編輯部，〈尋根—道卡斯族專題〉《原住民族文獻》第12期，2013年12月，頁2-3。

⁴ 見拙文，〈16-17世紀竹塹地域延展的歷史意義〉發表於2020年第一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六屆南臺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蓬勃。隨著學術研究的積累，以及 1970 年代以來，學界興起倡議社會科學的整合運用，無形中亦逐步型塑出學術研究計畫的寫作範本藍圖。以社會科學和新歷史學為例，便特別強調「研究回顧」的梳理寫作，透過對文獻資料進行歸納整理、綜合分析，以闡明有關主題的歷史背景、現狀和發展方向，以對相關該議題延展的充分掌握使研究的問題意識能準確地反映在研究計劃之中，並展開出更具精練明確、邏輯層次的章節寫作配置。正因為「研究回顧」具備上述中的實用性與科學性，因此，「研究回顧」討論的角度、觀點、甚至是深淺，便顯得至關重要。也正因為「研究回顧」的研究撰寫，研究者方能更具備洞察問題與展望學術的能力。

在早期的當代學界，礙於數位資訊尚未全面發展，學術資料檢索多是以「紙卡」方式進行，即所謂的卡片式目錄；⁵相對更具研究成果之重點學科、學門，則另有專業的書本式集合目錄可以翻閱使用。⁶此時對「文獻回顧」的撰寫，多泛也是以此梳理出相似相近之研究，再以分類疊合的方法摘要描述，但相關問題意識與學術發展之脈絡線圖的把握，則相較精簡淡薄。1980 年代以來，受社會科學方法引進和臺灣政治環境解嚴的影響，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興起，臺灣學界漸有新氣象成形，⁷至《新史學》刊物問世，中央研

⁵ 參林呈潢，〈現代圖書館目錄的功能與角色〉《大學圖書館》2 卷 2 期，1998 年 4 月，頁 62-82。

⁶ 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支持的《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計畫出版系列為例。不置可否，在 2021 年資訊量核爆的時代當下，各中心或學門之相關檢索系統、資料庫網站未能完整單一統合，此外，除有長期經費維護，相較小型或個人式經營，不少亦有更迭或失聯情況，都不免阻隔資料的有效運用及查詢；此時，對於傳統專業性的書本式集合目錄，就彰顯出有其作為工具書實用的功能，雖說紙本未具更新能力，但是針對社科人文等初始研究者，在面對漫天海量文獻中，便能有效率地進行初步重要核心研究議題的檢視和查閱。

⁷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o eds.,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成立，大幅帶動起學術的更替換新。1995年正值臺灣戰後50週年整，也是馬關條約日殖臺灣回顧起始100年，可謂學術關鍵一年。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臺灣大學歷史系合辦之「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專題研討會」，除是對臺灣史研究的重視外，亦同時揭示「研究回顧」的本質及意義，⁸與此同期，相關「研究回顧」等各領域議題亦同步展開，⁹至2008年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更以所每年出版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為基礎，於年終之際舉辦前一年度（或二年）臺灣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揀選成果較為豐富的專題史進行評析，藉此希望深入探討該領域的研究狀況並策勵將來。¹⁰

聚焦回顧有關竹塹（新竹）地域之綜述類的學術文章、會議發表，首先是2004年國科會計畫中，由林玉茹、李毓中完成的《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 第七冊》，該系列書籍稱得上近十幾年來，最具規模系統的臺灣學術史研究統合，也算首度初步對相關竹塹地域研究進行梳理分類的成果書目。不過或許是礙於該計畫目標和成書系列篇幅，故僅能著重相關研究的分類並簡單介紹，尚未

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⁸ 參見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等，《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7年。

⁹ 1995年新史學雜誌、東海大學歷史系主辦「五十年來臺灣的歷史學研究之回顧」研討會，計有論文十七篇。1999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承辦之「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便是十分具典型代表性之一。張炎憲，〈張炎憲序 從1995年的學術研討會反省臺灣歷史意識〉，《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頁1。許雪姬、林玉茹，《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9年。

¹⁰ 〈研討會緣起〉，〈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官方網頁（檢索時間2021年4月8日）：<http://thrrp.ith.sinica.edu.tw/about.php>

有更多當代性或即時性成因分析與脈絡連結呈現。¹¹2007年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史料研究》，刊載剛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所陳志豪的〈臺灣隘墾史的研究與回顧—以竹塹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一文，該篇就學者吳學明和施添福兩位學術前輩的研究成果進行展開，闡述了北臺灣有關隘墾研究的學術發展軸線，透過對相關研究的梳理，剖析了竹塹隘墾史研究中關於移墾方式與背景、拓墾型態及差異、地方菁英活動等幾項重大方向性的研究，稱得上統整了以該專業議題為導向的學術回顧發展，對臺灣竹塹學術史頗具初步貢獻性。¹²

之後陳志豪又在此基礎上，於2013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之際，發表〈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該篇除擴大研究回顧範疇外，並將歷史、地理、人類學在竹塹地區進行的跨學門合作進行分析陳述，更值得一提的是，陳志豪深入談及了中央大學、臺灣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相關開設課程研究對學術歷程的關係影響，各師生間的學術承累及研究成果，算是另一再深入的學術史探究撰寫，使普通讀者也得一窺認識學界領域的傳承發展。¹³繼陳志豪二篇相關竹塹地域研究回顧後，2019年政治大學民族所博士廖志軒撰寫了〈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該篇是在陳志豪二篇回顧架構中，再度聚焦于竹塹平埔族的相關文獻探究，並以時間

¹¹ 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 第七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¹² 陳志豪，〈臺灣隘墾史的研究與回顧—以竹塹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臺灣史料研究》第30期，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7年，頁70-85。

¹³ 陳志豪，〈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主辦，2013年。

為軸線，結合運用民族學田野調查的議題分類方式，區段性劃分三段時期加以探討，當中又以 1984 年學者吳學明碩士論文為始，闡明了前後研究的變革性，可謂進一步精細了竹塹研究回顧的書寫。¹⁴

回顧陳廖二者共三篇竹塹地域的相關研究回顧綜述，除先後不斷深化、再分類，嘗試由不同面向剖析整體研究史之發展外，雙方不約而同的共同點，都是將觀察的視野放在研究成果的文獻本體之上，雖說在本質上並無任何問題，但若放諸於宏觀的臺灣史學脈絡歷程、臺灣社會發展史下，就又稍顯現出距離感。在廖志軒的〈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一文中，有試圖橫貫起日治至當今的竹塹社研究回顧，但在 1906-1980 年時期，僅僅只用數行文字約略提及，多數論述仍以民族學視野聚焦於 1980 年代之後。其實，自「古」以來，所謂的「地方學」便一直存在於官方的〈府誌〉、〈縣誌〉、〈鄉誌〉、〈地誌〉之中；以該領域研究最權威的學者吳學明為例，回顧其相關各篇大作，亦也是新舊史料綜合交叉運用。因此，若要完整對竹塹「地方學」進行回顧及展望，勢必需延伸討論臺灣戰後相關方志增修、80 年代的社會巨變、及現今地方學的發展生態，方能勾勒出當代臺灣竹塹學術史的進程性。

貳、官修下的地方方志

連橫〈臺灣通史序〉開宗明義點出立書之因，言及：「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而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

¹⁴廖志軒，〈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民族學界》43 期，2019 年，頁 163 - 194。

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¹⁵從史學史角度，連橫畢竟承襲傳統中國史學觀念，其所言並非臺灣真未有歷史紀事，而是長期以來，社會民間尚未有治史立傳之重視風氣。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於2002年劍橋大學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演講中，也開門見山談到：「臺灣的史學發展當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在此之前，清帝國二百一十二年(1683-1894)的統治沒有培養學問家，日本五十年(1895-1945)殖民後期建立的短暫學術傳統，當她戰敗退出臺灣時，也隨之斷絕。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有一些歷史學者隨之來臺，其中的領袖人物可以算做近代中國新史學的第一代人物。過去五十年臺灣的史學是這批人及以後幾代學生的業績」。¹⁶如上所敘，臺灣史學史之發展起始，大抵為1950年代，因此，有關竹塹地方學的回顧，勢必也需從此溯及探起，以銜續起學術的發展脈絡。

1949年兩岸分治以後，原臺灣省通志館亦仿中國大陸各省改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如同官方所揭櫫的：「臺灣文獻資料亟待保存」，因為「方志是民族精神之所繫，區域研究的起點，而為國史之鎖匙和鄉土之歷史」。¹⁷同年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倡議設立縣(市)文獻委員會推行；翌年元旦蔣介石發起社會與文化改造運動，旋即內政部函囑臺灣省政府轉飭各縣(市)依《地方志書纂修辦法》展開，¹⁸積極設立文獻委員會，著手纂修地方志書，以弘揚國家

¹⁵ 連橫，〈臺灣通史序〉，《臺灣通史》，臺北：五南，2017年。

¹⁶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十三卷三期，2002年9月，頁21-23。

¹⁷ 林熊祥，〈臺灣修志的理論與實際〉，《臺灣文獻》10卷第4期，1959年12月，頁3。

¹⁸ 「分存單地方志書纂修辦法」，〈地方志書纂修辦法〉，1944年5月16日，國史館檔案史料數位典藏：001-016122-00001-001

意識，發揚民族精神。¹⁹事實上，對於當時政府中樞的變遷，透過修志，確實有維護正統，鞏固政權進而以名譽收攬當地勢力的效用。至此 1951 年新竹縣文獻委員會成立，主任委員便由臺灣省通志局編纂兼編纂組長、且為地方大儒的黃旺成擔任，²⁰積極開展纂修地方志書的文獻工作。至此，正式開啟新竹地方學的學術治史發展里程。另件有意思的事，戰後 1950 年代所開啟的官方纂修地方志書的人員，不少背景和大儒黃旺成有雷同性質，亦是當時政府有意針對日治時期、二二八事件，對相關地方勢力的攏絡安降之意。²¹

《臺灣省新竹縣志》（縣市未分家前）四巨冊，於 1955 年起先後陸續付印出版。該縣志詳細記載了自 1691 年（清康熙 30 年）到 1951 年（民國 40 年）的新竹地區發展的大小流變，其內容包括瞭疆域、地理氣象、名勝古蹟、物產、人民、行政、地方自治、財政、地政、戶政、保安、農業、林業、水利、水產、商業、金融、特產、交

¹⁹ 臺灣省政府轉飭各縣（市）應積極設立文獻委員會，以纂修地方志書，其要旨有三：1.本省光復後，適政府實施憲政，實為我國政治史上之盛舉，他如地方各種政教設施，經濟建設，以及興革諸事，均應載之方志，永昭後世。至於先哲、先賢、先烈之言行、事功、志節，尤須加以表彰，應迅纂修志書，以宏揚國家意識，發揚民族精神；2.本年元旦，總統蔣介石曾昭告全國軍民推行社會及文化改造運動，以達到敦親睦族、明禮尚義之目標，則纂修地方志書，適足以促進此等運動之展開；3.本省自 1950 年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後，各地文獻委員會均已紛紛設立或籌備成立，而依照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各縣（市）纂修志書事宜，應由各縣（市）政府督促各縣（市）文獻委員會負責辦理。王世慶，〈光復後臺灣省通志之纂修〉，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前揭《機關志講義彙編》，頁 226。

²⁰ 莊永明，《臺灣百人傳 3》，臺北市：時報文化，2001 年，頁 63-94。

²¹ 在〈戰後臺籍菁英對政府施政之肆應——以林獻堂與吳新榮為探討中心（1945-1955）〉論文中，有其同議題相近探討，但尚未有以編纂修的視角剖析各方人馬的後續情況，礙於本篇主題和篇幅限制，故不再多做展開。參黃冠彰，〈戰後臺籍菁英對政府施政之肆應——以林獻堂與吳新榮為探討中心（1945-1955）〉，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

通、教育、宗教、人物、衛生、藝文等。透過該志之目錄及內文，得展現戰後新竹地區最早進行編輯的方志工作情況。然而畢竟是官方主編下的方志記敘，加上傳統治正史氣氛濃厚，刻意對清代乃至日治時期的相關反抗事件用筆著墨，以顯現異族統治臺灣的暴政情況。就體例而言，該志整體大致承襲舊有分類方式，所以另一方面內容又以蒐集在地相關文獻史料為主，相關的人物篇幅敘述也以漢族本位立場居中為重；即便種種如此，不可抹煞的是該縣志撰寫體例嚴謹，內容厚實，因此，向來也被學界尊為地方志書中的經典之作。²²

在國民黨政府中樞遷臺後，隨著海峽局勢趨緩，中央政府與臺灣省政府因為治域的高度重疊，於行政職責發生多次激烈衝突，²³為落實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分化，以戰時疏散防空襲名義，在 1956、1957 年分別將原位於臺北市臺灣省政府主要廳處，遷移至臺中霧峰及南投草屯。²⁴ 1958 年行政院又訂《精簡機構員額實施方案》，臺灣省政府因而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自廳處級的省政府二級機關，降級為三級機關，²⁵導致其地位與象徵的意義，以及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²⁶除將各縣（市）文獻委員會裁撤外，並規定各縣（市）文獻委

²²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臺灣省新竹縣誌稿》，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印，1955-1957 年。

²³ 參見郭佩瑜，〈戰後初期臺灣省級政府的地位轉變(1945-1953)〉，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²⁴ 見陳胤宏，〈遠離臺北：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²⁵ 「奉總統交下裁員減政意見報告所研提之「精簡機構員額實施方案」已奉批示擬遵照辦」，〈行政院〉，1958 年 2 月 20 日，國史館檔案史料數位典藏：014-000205-00156-001

²⁶ 謝嘉梁，〈臺灣文獻業務之沿革發展〉，《臺灣文獻》第 50 卷 1 期，1999 年 3 月，頁 10；另參閱黃文瑞，〈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沿革〉，《臺灣文獻》第 45 卷 2 期，1994 年 6 月，頁 210。

員會事務及工作應移由各縣(市)政府民政局接管,以進行志書的重修或續修工作;然而受到 1960 年代兩岸臺海危機衝突,和島內蔣經國掌權後的一系列威權政治高峰影響,使包含方志等臺灣多數在地研究同步陷入低潮。²⁷由於中央未編列預算給地方政府纂修,加上 1972 年後內政部廢除原設方志審查委員會,便是考量各地方纂修理念、事實認定、撰寫水平的高下難有標準,內政部較不便要求、催促地方政府定期纂修方志,以符合條列上「二十年一修、十年一修」的規定。²⁸

至 1973 年,縣(市)文獻工作座談會更因人力與經費大為縮減,亦停止召開,各縣(市)志的編纂或重修工作遂改由民政局主其事,承接各縣(市)文獻委員會之文獻工作。²⁹這也間接造成在 1951 年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新竹縣志》後,產生達 40 年的空窗期。期間,雖同步有民間團體零星修纂,包含 1952 年張谷誠編《新竹叢志》³⁰、1958 年畢慶昌等人《新竹新志》、³¹1960 年黃鐘生《新竹風物誌》。³²稍可注目的是《新竹新志》的新體例,基本上是主張用現代地理學區域地理的研究方法來纂修方志,反對缺乏科學精神的采風式方志,這也是從戰後初期,以盛清沂為主的傳統歷史學派之修志體例,及以張其昀為首的新地志學派主張,³³雙方在體例較量的展

²⁷ 林玉如,〈知識與社會: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9 年,頁 42-43。

²⁸ 詹素娟,〈方志纂修與內政部〉,《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0 期,1991 年 9 月,頁 14-16。

²⁹ 王國璠,前揭〈臺灣地區文獻工作研討會記盛〉,《臺北文獻》直字第 34 期,頁 23。

³⁰ 張谷誠編,《新竹叢志》,新竹:張谷誠,1952 年。

³¹ 畢慶昌等,《新竹新志》,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年。

³² 黃鐘生,《新竹風物誌》,新竹:聯合版新竹分社,1960 年。

³³ 宋晞,《方志學研究論叢》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169-170;蕭

現在新竹地方方志之上。然而總歸而言，由於纂修方志卷帙浩繁，比起官方編修的巨大動員投入，民間團體、個人私修皆甚難達到同級規模，因此不論是何種體制，其內容及篇幅皆縮限不少，從正史方志的內容角度來論，僅能盡到點綴增補之效。

隨著 1970 年代臺灣經貿逐漸發達，及國際格局與自身立場的諸多轉變，同步帶動的政治、社會氛圍步入變革開放。來自民間的鄉土意識開始萌芽，尤其在 70 年代中葉引發「鄉土文學論戰」、黨外推展本土民主運動等，也直接或間接刺激鄉土意識的開展。相對於官方縣志纂修的擱置臨停，在此背景下，民間各地亦有纂修鄉志的展開，其中就新竹地區而言，便由當時北埔鄉長發心推動，由鄉公所秘書姜仁森纂修，於 1977 年所完成的《北埔鄉誌》。對於《北埔鄉誌》的獨立纂修，除更具體強調富有地方性歷史和在地族群意義的金廣福移墾、北埔抗日事件等，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有別當時期前後的多數鄉、市志，在《北埔鄉誌》體例其中，特別另立「碑文」篇章，³⁴亦是借鏡了社會科學中的田野調查，加入傳統史學方志纂修的成果，這或許是受到 1970 年代張光直的濁大計畫影響，此舉也象徵了新竹地方研究已慢慢醞釀起轉變的契機，視角領域也更微觀聚焦於地方地域開展深入探究。

1982 年新竹縣、市分治，新竹市升格改制為省轄市，縣政府則遷至竹北鄉。同年間內政部《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章程》廢止，各縣（市）政府民政局又將文獻課裁併為禮俗文物課，各縣（市）依情況設置課長一人，以及課員數人，但課員最多不超過五人；其業務

明治，〈論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以鄉鎮志為例〉，《臺灣文獻》第 58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130-131。

³⁴ 姜仁森，《北埔鄉誌》，新竹：北埔鄉公所，1977 年。

除原有的編纂文獻志書、調查保存與維護古蹟之外，還增加禮俗、祭祀等業務。於是在經費短絀，員額編制不足，業務繁重，以及修志人才闕如的情況下，各地志書纂修工作成果未臻理想。³⁵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也使新竹縣、市的修志情況充滿未定之數。至 1990 年新竹市政府始著手新竹市志叢書之修訂，並委託張永堂進行《新竹市志》編纂，新竹縣府亦以同步接續第一階段的修志事業，在其基礎上從事《新竹縣志續修（民國 41-80 年）》。於相互歷經 7 年的資料整理、編輯，方使新竹縣、市志得以成稿和出版。³⁶

在 1996 年底出版《新竹市志》共八卷 16 冊志書中，依序為土地志、住民志、政事志、經濟志、文教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將新竹市從史前至 1986 年（民國 75 年）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地方經濟及人物等內容一併納入；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地方學、多元文化已逐步萌芽興起，《新竹市志》〈土地志〉，便是將地理空間融入修志之中，運用多元的地方學研究視野，主張擴大探討人類生活的空間關係，之中分別描述地理、氣候、災害、市街(城池)、史前遺址與名勝古蹟，呼應傳統歷史的連結發展情況，故特將土地志列於卷一。³⁷1997 年成稿 2008 年出版《新竹縣志續修（民國 41-80 年）》，同樣有地理學、社會學的調查融入實況，並又針對不同鄉鎮市各展特色著墨，充分顯現地方學對志史修纂的影響與改變。但不可否認，回顧戰後官修下的竹塹方志歷程，可謂由盛而緩，雖說

³⁵ 陳清添，〈當前地方文獻工作的體認〉，《臺灣文獻》第 38 卷 1 期，1987 年 3 月，頁 262。

³⁶ 〈新竹縣志續修〉，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檢索時間 2021 年 4 月 21 日）網址：<https://www.hchcc.gov.tw/Tw/Publication/BooksDetail?filter=ed718424-8884-4814-beff-5cc0f1a1d017&id=4e8a16ad-d804-4717-81d0-33ebf5b1bf00>

³⁷ 《新竹市志卷首下》〈新竹市志凡例〉，頁 3。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檢索時間 2021 年 4 月 21 日）網址：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HCLR_his/150889

後續修志情況逐步多元豐富，不過整體氛圍亦不復早年的觀瞻矚目。

38

參、契機下的研究變革

綜觀纂修地方志前後體例及內容的轉變歷程，最關鍵的契機則是來自濁大計畫的影響。1970年代初，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與美國耶魯大學共同合作，以學者張光直為首的一批人文和自然研究團隊，針對濁水溪、大肚河流域，以古今居民的歷史及其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作為主要科考研究目標，並命名為「臺灣省濁水溪大肚溪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劃」（即是學界史中簡稱的濁大計畫）。該計畫之下設立七個學科：考古、民族、地質、地形、動物、植物、土壤，其中又以考古學與民族學為主，至此亦開啟臺灣區域研究和跨學科整合的濫觴。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1970年代正是臺灣考古學在臺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進行已告段落的階段，對於臺灣史前文化史的初步架構已有了解，因此得以深入進行研究探討，提出新的議題；³⁹而「濁大計畫」的制定和推行，可說是臺灣考古學新階段的開始，雖

³⁸ 郭佳玲，〈論戰後臺灣縣（市）志的纂修（1945～2008）〉《臺灣文獻》，第61卷第1期，頁221。

³⁹ 對於臺灣考古而言，從1896年到1972年「濁大計畫」進行之前，主要的目的就在於「史前遺物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史前文化的分類，以及史前文化的來源問題，尤其是與中國或與東南亞大陸史前文化的關係問題。換言之，即集中於『文化史』方面的問題，而有以文化史的因素，亦即以起源的紛歧與歷史接觸、文化交流關係，來解釋文化變異的傾向。」直到「濁大計畫」開始才轉變為研究人類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臺灣考古經歷了近80年以來的第一個大轉變。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7年；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頁》臺北市：聯經，1995年，頁208。

然至 1976 年因經費籌措問題難以為繼，最終計畫並未圓美完全，⁴⁰但同時卻也培養了不少具有學科合作精神的年青學者，⁴¹在此後續更帶動起學術一波波的漣漪改變。

以當代新竹地方學研究鼻祖之一的學者吳學明為例，在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所改寫出版的《「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發展(1834-1895)》一書，於頁首便闡明道：「中研院民族所『臺灣省濁水溪大肚溪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開創風氣以來，其利用人類學等科際整合的方法從事區域發展研究，已成為一項重要研究方法。故本文採用此一方法，來做墾隘研究。」然而學者吳學明對於新竹學的貢獻，不單僅是帶入學科整合觀點，更大的突破在於落實其運用效果，在後續田野調查中獲得珍稀一手資料（北埔姜家文書），開展了對金廣福墾隘的運作與發展金脈，該書也成為新竹地方學創學研究的經典之一。⁴²後續莊英章、陳運棟更得接力以「金廣福」為題，深掘擴大相關研究，⁴³可見吳學明研究之突破成效斐然；這反映出「濁大計畫」所提倡的區域史研究，對後續新竹學發展起到關鍵的啟蒙性作用。

吳學明和莊英章、陳運棟等人對新竹當地的古文書、地契的發掘，逐漸開啟後續以新竹為焦點的田野調查契機。1986 年院士張光

⁴⁰ 高有德、邱敏勇，《東埔一鄰遺址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類聚落史研究（一）》，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8 年，頁 104-105。

⁴¹ 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頁》臺北市：聯經，1995 年，頁 129。

⁴²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發展(1834-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 14，1986 年，頁 1〈致謝〉、頁 1。

⁴³ 莊英章、陳運棟，〈晚清臺灣北部漢人拓墾型態的演變：以北埔姜家的墾闢事業為例〉，收入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文化變遷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 年，頁 1-43。

直等人結合中研院史語所、民族所、近史所、中山社科所之人力資源，再次推動跨學科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新竹地區因而成為重點個案，並由張炎憲、莊英章與施添福向國科會提出以「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為主題的合作計畫。其中，學者施添福先後發表〈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一)——試釋土牛紅線〉和〈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及〈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等多篇文章。之中便以地理學的研究方法，配合相關歷史古文獻運用，拓寬了新竹研究成果，甚至解構了臺灣清代的移墾情況認知，⁴⁴可謂繼學者吳學明另一位突破性的深耕學者。而該計畫中王世慶、李季樺、張炎憲等對竹塹的族群發展、祭祀公業、婚姻型態之研究分別展開，同樣頗具意義價值；⁴⁵雖說後續並未如學者吳學明、施添福，持續投入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發展研究，但亦是加大了對新竹學的研究範疇和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在鄉土文學論戰後不久，臺灣文學呈現出多元共生的發展局勢，母語文學興起，加上同受「濁大計劃」的薰陶，學科整

⁴⁴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卷2期，1989年，頁95-98。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卷3期，1989年，頁95-98。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卷4期，1989年，頁33-69。

⁴⁵ 李季樺，〈清代番兒老而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9年，頁99-101；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27-172；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入《平埔研究論文集》，頁173-218。

合運用的的推廣，接連帶動對在地文學歷史的關注。⁴⁶首度真正開始探及竹塹地區傳統文學領域的論文研究有二：一為 1991 年徐慧鈺的〈林占梅先生年譜〉，該文以清代竹塹知名文人大儒林占梅一生為經，詩作為緯，詳細繫年，是以文學結合歷史的方式為導向，探究林氏生平經歷，亦是對在地人文的深入側寫刻劃。⁴⁷，二為同年謝智賜的〈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詩文研究〉，則是在探究竹塹文人林占梅同時，又加入對清代竹塹進士鄭用錫的研究，對二人之生平及作品進行梳理，以分析該地人文之特色。⁴⁸上述二篇論文，大抵均屬結合在地地域人文研究，對個別作家展開的討論，對於竹塹區域文學發展之全貌則仍待更具體之勾勒。

較能普遍反映該地文壇梗概的著述，則是要待 1994 年由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的《塹城詩薈》，該書乃新竹地方人士蘇子建參酌梓里先賢文獻和新竹相關之地方志資料編撰而成，之中〈詩掇篇〉輯錄清代、日治時期、近代等竹塹詩壇古今詩人之片稿，〈詩畫篇〉則敘述新竹詩社及詩人之故事。⁴⁹整體而言，該書對於新竹傳統詩壇之作者及其創作有整理介紹之功；唯獨其研究論述稍有不足。真能夠集其大成，則是 1999 年由學者曹永和、沈謙聯合指導的博士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論文。該論文以竹塹區域社會中之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特性與文學傳統關係的進展推演為研究對象，從而釐清了移墾社會邁向文治化社會的努力軌跡。文中深入探

⁴⁶ 以目前竹塹地域文學研究執牛耳的黃美娥為例，在其博士論文〈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中的〈序〉及〈緒論〉，便提及了此寫作成因的背景和所撰題延伸的脈絡性。

⁴⁷ 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⁴⁸ 謝智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詩文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⁴⁹ 蘇子建，《塹城詩薈》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 年。

析鄭用錫、鄭用鑑、林占梅、鄭如蘭等四位重要本土作家及其作品，並又導入楊浚、林豪、查元鼎、林維丞等四位重要流寓文人及其作品，加以探討參與競技的文壇互動，描繪文人間彼此的交遊網絡。可以說綜合歸納了竹塹地區此一地理空間中，本土及流寓文人在文學表現及創作上的共相，藉以凸顯本地文學在長期發展後，所形塑出來的特色，進以確立竹塹文學在臺灣文學中的地位與價值。⁵⁰

而 1980 年代後期，臺灣體制逐步解嚴，政治邁向民主化，加以社會母語文學議題興起，連帶促使原住民族團體發起一系列自治和正名運動，⁵¹在整體多元氛圍下，學界得以更關注對原住民族的文化探討，乃至族群間（平埔族為其主要）相關歷史的研究。對於竹塹地域原住民族的研究，又以民族學相關研究為眾。其中，於 1987 年張瑞恭〈賽夏族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紙湖、向天湖社群的探討〉碩士論文，便是運用「文獻資料」與「田野工作」加以整理分析，全貌建構了賽夏族的分布、人口資料，並又分別敘述了傳統與變遷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命禮俗、語言及文字等文化範疇，用形貌觀來審視賽夏族文化的綜合獨特性。⁵²由於資料紮實，頗受後續研究者肯定，⁵³更成為此後有關賽夏族書籍寫作的結構範本。⁵⁴

相較原住民族的文化調查研究，另一研究重熱區則是泛屬平埔族竹塹社的地方族群史研究，在新竹學創始鼻祖吳學明對在地「金

⁵⁰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

⁵¹ 參見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 年。

⁵² 張瑞恭，〈賽夏族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紙湖、向天湖社群的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

⁵³ 林修澈主編，《賽夏學概論》，苗栗縣文化局，2006 年，頁 770。

⁵⁴ 在此為筆者本身於後續相關成書觀覽所見心得。

廣福文書」的研究助力下，帶動起在地相關古文書文獻研究的「淘金潮」。1989年中研院研究員李季樺接連發表〈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田野拾穗：竹北番仔祠堂田野劄記〉與〈清代「番兒至老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等三篇文章，⁵⁵而此年更被評作「竹塹社研究的發端」⁵⁶，足見其學術影響份量。之後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與施添福等學者，相繼投入展開對竹塹社的研究。王世慶、李季樺的〈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和李季樺、張炎憲的〈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主要是針對竹塹地域家族史和祭祀公業的專題研究，透過「祭祀公業」的切點，成功開啟對該地族群認同與凝聚的探討，更豎立起往後竹塹文史研究的特色之一。⁵⁷而施添福的〈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文章，解釋了平埔族竹塹社土地流失的原因，進而剖析了竹塹社的歷史發展與族群關係。⁵⁸

而在「濁大計畫」中，民族學部門在田野調查中所獲得之資料，既有針對傳統鄉民社會之人群組織祭祀圈的概念分析，⁵⁹也帶出「客

⁵⁵ 李季樺，〈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0期，頁11-14；李季樺，〈田野拾穗：竹北番仔祠堂田野劄記〉，《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期，頁24-26。李季樺，〈清代「番兒至老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收入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史蹟研究中心，頁73-106。

⁵⁶ 廖志軒，〈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民族學界》43期，2019年，頁170。

⁵⁷ 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於潘英海、詹素娟合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27-172。；李季樺、張炎憲的〈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173-218。

⁵⁸ 施添福，〈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期，1990年，頁67-92。

⁵⁹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

家族群」的研究議題；⁶⁰ 新竹作為全臺客家族群大縣，在初期中的客家研究中雖對此有所涉及，但多半是含括於客家民謠、客家語言等專業學門探討。⁶¹與此同時，驟變下的臺灣社會，在 1988 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後，帶動一連串客家運動的興起，⁶²以《客家雜誌》（前身為《客家風雲》）為首的客家議題刊物平臺，亦逐步擴大其能見度與話語聲。⁶³1980 年代末，莊英章與 Arthur B. Wolf（武雅士）利用今隸屬於新竹縣竹北的日治時期村莊戶籍資料，進行婦女與婚姻的比較研究，⁶⁴之後又再加入臺中、南投、彰化、臺南、屏東等地的戶籍資料，透過招贅婚情況顯示出漢人聚落的中心與邊緣關係，⁶⁵可謂新竹區域客家研究及資料運用之開山。後續有關客家族群研究且較具代表性的包含：1987 年施添福的《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便是認為祖籍地原鄉的生活方式，與後續

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5 年，頁 191-208。

- ⁶⁰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5 年，頁 165-190。
- ⁶¹ 羅烈師，〈臺灣地區二十年來客家博碩士論文簡述〉，客家委員會研究報告（檢索時間 2021 年 4 月 30 日）網址：<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Id=625&PageID=36792>
- ⁶² 詳參黃子堯，〈臺灣客家運動—文化、權力與族群菁英〉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2006 年，頁 35-64。
- ⁶³ 詳參李雅婷，〈1987-2008 年臺灣客家議題發展之研究：以客家雜誌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 ⁶⁴ 莊英章、武雅士，〈臺灣北部閩、客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一個理論假設的建構〉，莊英章、潘英海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 年，頁 97-112。
- ⁶⁵ Chuang Ying-Chang and Arthur P. Wolf “Marriage in Taiwan, 1881 - 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4, Issue 3, August 1995, pp. 781 -795；亦見莊英章，《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社區的比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1994，頁 207-226。

來臺後(客籍移民)對於擇丘陵地居住有某種選擇性親近關係。⁶⁶1997年羅烈師的《新竹大湖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個客家農村的歷史人類學探討》，透過對19世紀新竹大湖口地域的宗族、廟會組織研究分析，還原竹塹社群眾的地域化及社經結構聯屬關係。⁶⁷在種種新視野、新方法、新角度的研究中，皆反映出竹塹地域、族群、文化等諸多特殊性和多面性。

肆、當今竹塹學之發展

環伺現今對竹塹地域空間研究的多元盛況，最終得以統籌發展為地方學之中的顯學焦點，緣由是行政院於1981年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簡稱文建會)，以作為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施政的最高機關，並推動起各縣市文化局籌建；⁶⁸至解嚴以後，學界的大中國史觀轉向調整，臺灣史學研究得以興起。1994年行政院文建會更開始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舉凡建立社區文化、推廣鄉土教育、成立文史工作室等，強化在地文史工作者投入地方研究的行列之中。⁶⁹另一

⁶⁶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叢刊第15號，1987年。

⁶⁷ 羅烈師，《新竹大湖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個客家農村的歷史人類學探討》，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⁶⁸ 〈成立沿革〉文化部(檢索時間2021年5月13日)網頁：https://www.moc.gov.tw/content_246.html

⁶⁹ 有關臺灣文史工作者之發展，約在1970年後期大量興起，從政治社會角度而言，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歷經退出聯合國之後，臺灣朝野焦點，移轉到自己土地的關懷，例如：救國團「上山下海」的活動反應熱烈、「校園民歌」與「黨外活動」的風起雲湧……等；又再加上1980年後期，政治上解嚴與開放的風氣，日趨激烈，形成有利氛圍。二方面是臺灣第二次「鄉土文學」的興起，促使長久以來壓抑的「鄉土意識」，逐步甦醒；而臺灣本土的文史、建築、歌謠、戲劇、藝術……等研究，也逐步進入大學的學術殿堂。再從經濟科技觀點而論，則為臺灣成就「經濟奇蹟」的繁榮發展階段，促成了資金的不斷流動，加上有

方面隸屬宜蘭文化局的宜蘭縣史館，首度舉辦「宜蘭研究」演討會，搭建在地的學術研究平臺。種種發展積累，亦是激發起臺灣地方學研究之濫觴。⁷⁰而同年，吳學明再一連發表四篇專論，首發表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鄉村社會的變遷—以新竹北埔為例〉，說明新竹北埔地區進入日治時期後的歷史變遷。⁷¹接著〈清代竹塹城周姓族人研究〉一文中，補充「金廣福」閩籍墾戶首的發展歷程。⁷²〈新竹頭前溪中上游的土地開墾（上）、（下）〉二篇，則更加完整探討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史，特別是今日的芎林、竹東、橫山等區域。⁷³可謂再續

心志士的結合，使地方文史工作室、文史工作會、文史研究協會等社團組織，相繼成立與運作；而 1980 年後期，行政院的文建會、內政部，也編列了相關科目的預算補助申請，形成了鼓勵的機制。再拜科技技術的革新關係，不論是小型錄音機、錄音筆，乃至於照相機、攝影機，都更加平民化；若再加上 Windows 家庭電腦的上市，皆大幅襄助了文史工作的推展。筆者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對知名文史工作者繆正西先生訪談得知。正西，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文學士、韓國國立全北大學中語中文研究所碩士、香港珠海大學文學博士；「臺灣徐霞客研究會」立案發起人之一，現職東南科技大學觀光系兼任助理教授。早年亦投入地方文史工作，曾田調新北市汐止區、走訪全臺百餘老舊眷村，研究臺灣歷史文化多年，略具名聲。其知名代表著作，有：《水返腳人文影像》（與高燈立、李圃芳合作編寫，內政部營建署社區總體營造經費補助）、《竹籬、長巷與麵疙瘩：高雄三軍眷村憶往》（與劉治萍、郭聖華合著，2015 年文化部教育部全國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尋覓臺灣老眷村》。

⁷⁰ 張炎憲，〈臺灣史的建構—從縣史研究談起〉，《彰化縣建縣二百八十週年系列活動 2003 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994 年，頁 11-17。

⁷¹ 吳學明，〈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鄉村社會的變遷—以新竹北埔為例〉，《臺北文獻》直字 107 期，1994 年，頁 23-67。

⁷² 吳學明，〈清代竹塹城周姓族人研究〉，《明志工專學報》26 期，1994 年，頁 219-232。

⁷³ 吳學明，〈新竹頭前溪中上游的土地開墾（上）〉，《臺北文獻》直字 108 期，1994 年 9 月，頁 1-48；吳學明，〈新竹頭前溪中上游的土地開墾（下）〉，《臺北文獻》直字 109 期，1994 年 12 月，頁 16-67。

推進了新竹東南山區的區域史研究，增進帶動新竹學的後勢發展。⁷⁴

與此同時，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於1993年正式招生，旨在培訓研究生從事明清以來的中國史以及臺灣史等的研究。⁷⁵加上原有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以及2002年由時任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賴澤涵教授協助籌備，並於2003年8月正式成立全球首創之客家學院，⁷⁶至後續2004年國立交通大學(現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成立客家文化學院、2006年國立聯合科技大學設置全球客家研究中心、⁷⁷2013年國立中央大學增設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逐步構成了對桃竹苗在地區域的研究學術群。以2002年轉往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服務的吳學明教授為例，即帶領碩士生投入該區域史研究。諸如，2006年陳志豪的碩論〈北臺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⁷⁸陳鳳虹的碩論〈清代臺灣私鹽問題研究--以十九世紀北臺灣為中心〉、⁷⁹2008年吳聲焱完成的碩論〈隘墾區伯公研究：以新竹縣北埔地區為例〉、⁸⁰許世賢的碩論〈劉銘傳裁

⁷⁴ 此後吳學明還陸續針對家族史、族群關係等議題，發表〈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閩粵關係與新竹地區的土地開墾〉等專論。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臺灣史研究》2卷2期，1995年12月，頁5-52。吳學明，〈閩粵關係與新竹地區的土地開墾〉，《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期，1999年12月，頁15-19。

⁷⁵ 「學院簡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檢索時間2021年11月3日)網址：<http://hakka.ncu.edu.tw/hakkastudy/introduction/>

⁷⁶ 「歷史所介紹」，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檢索時間2021年5月13日)網址：

⁷⁷ 詳見張陳基，〈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介紹〉，《全球客家研究》第13期，2019年11月，頁211-218

⁷⁸ 陳志豪，〈北臺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6年。

⁷⁹ 陳鳳虹，〈清代臺灣私鹽問題研究--以十九世紀北臺灣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6年。

⁸⁰ 吳聲焱，〈隘墾區伯公研究：以新竹縣北埔地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

隘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的隘墾社會為中心〉、⁸¹2011年杜立偉的碩論〈清代芎林地區漢人社會的建構〉⁸²等。整體來說，上述的新竹區域史研究，大抵受到吳學明的指導及影響，故可視為延續自1980年代累積而來的研究成果。⁸³

民間文史團體方面，在新光集團吳家支持下，以「保存客家文化、維護一級古蹟」為宗旨，於1995年設立非營利文教組織「金廣福文教基金會」為例。⁸⁴該基金會同時亦致力於推展在地文史，於成立十周年之際，籌資經費，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研究所規劃、吳學明引領籌辦，於北埔姜阿新故宅合辦「北埔姜阿宅故宅學術研討會」，最終合計篩選16篇論文，計有13篇論文通過審查出版專刊。其中有吳學明的〈姜阿新歷史研究初探〉、邱顯明的〈北埔茶業發展史初探〉、陳志豪的〈日治時期交通建設與地方社會—以北埔地區的輕便軌道為例〉等，分別以歷史學角度探析過去當地社會關係及經濟產業情況；范明煥的〈北埔地區的婚嫁禮俗〉、楊國鑫的〈北埔客家歌謠的出現與變遷〉、吳聲淼的〈北埔伯公與社會變遷關係之研究〉等，以在地社會生活文化視野，探究過往北埔的發展變遷。其次，亦

文化所碩士論文，2008年。

⁸¹ 許世賢，〈劉銘傳裁隘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的隘墾社會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年。

⁸² 杜立偉，〈清代芎林地區漢人社會的建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碩士論文，2011年。

⁸³ 有關吳師門之指導各碩士論文研究情況，可參陳志豪，〈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主辦，2013年，頁4。

⁸⁴ 見彭瑞麟，〈金廣福文教基金會參與客家地區社區營造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論文，2009年，頁85。

有數篇高質量的古蹟建築文章，亦一併收入至專刊之內。⁸⁵這場 2005 年北埔地域研討會的開辦，展現了新竹地方學的發展積累，其學術貢獻更是顯著。

隨著各校系所的設立與推動，包含吳學明等在內的臺灣地域、社會族群議題的專家學者，相繼培育起相關議題的指導研究；同時作為桃竹苗地方的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現今國立清華大學），也於 2012 年起展開籌備竹塹學術研討會，加上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的支持，並又獲行政院補助，翌年「傳統與現代—竹塹學術三百年：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順利正式開辦。會前並特邀相關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以透過多面向的研究和論述，來建構竹塹學的文化殊趣、文學脈絡與學術特色。首屆竹塹學國際學術會議共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美國、日本、馬來西亞等各地學者，共 6 主題場次 19 篇發表論文，同時將海內外學者會議發表論文，透過專業審查，編輯後集結成書，申請國際標準書號，俾便於國際間出版品的交流與統計。至此，固定每屆舉辦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亦成為新竹學專門的學術平臺，對新竹地域研究而言，乃將其推上另一高峰。⁸⁶

同期，1996 年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成立，亦逐步開始進行新竹文史研究專書出版，2000 年改制為新竹縣文化局，同步規劃新竹縣縣史館，以展開對相關檔案、史料文獻的保存，及在地文史、社會的研究推廣。期間，靈魂人物黃卓權倡議，經得歷任局長的支持，開編起「研究叢書」、「文獻叢書」等。在黃卓權肩負起初期編輯工作的開展

⁸⁵ 詳見吳學明主編，《地方菁英與地域社會—姜阿新與北埔》，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7 年。

⁸⁶ 陳惠齡，〈從「傳統竹塹」到「現代新竹」—「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意義與省思〉，《竹塹文獻》第 58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4-115。

下，後續出版包含有：2001年施添福的《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為相關原有5篇主論文和6篇附錄論文研究集合為冊，從清代至日治時代臺灣各地社會、空間性質探討，並以「地域社會」總括全書研究旨趣；⁸⁷2005年由莊英章指導賴玉玲碩士論文改寫的《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以楊梅聯庄為例》、⁸⁸同年間范明煥碩士論文改寫的《新竹地區客家人媽祖信仰之研究》、⁸⁹和林桂玲碩士論文改寫的《家族與寺廟—以竹北林家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1895）》、⁹⁰以及2007年何明星碩士論文改寫的《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⁹¹四本都圍繞著當地信仰、族群、家族等議題關聯展開探討研究。其後還有2008年羅烈師的《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⁹²梁宇元的《清末北埔客家聚落構成之研究》，乃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地域關係研究。相關叢書皆歷經審查後，方獲補助出版，故頗具一定學術研究價值。

至新竹縣史館正式啟用，以累積地方豐富文史資產，加強客家史料文獻紀錄與典藏為職志。於2012年縣政府文化局制定〈文化叢書出版審查作業要點〉，以鼓勵在地各類文化叢書出版，由以補助有關新竹地方之各項人文題材，含史地、社會、經濟、建築、藝術、文學…等領域之學術性相關研究著作。同時開放碩、博士學位論文修

⁸⁷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

⁸⁸ 賴玉玲，《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以楊梅聯庄為例》，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

⁸⁹ 范明煥，《新竹地區客家人媽祖信仰之研究》，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

⁹⁰ 林桂玲，《家族與寺廟—以竹北林家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1895）》，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

⁹¹ 何明星，《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7年。

⁹² 羅烈師，《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8年。

改成書，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以一同提出申請。⁹³相關研究叢集有2012年蔡雅蕙的《彩藝風華：以客籍邱氏彩繪家族為主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傳統彩繪之源流》，⁹⁴2013年吳憶雯碩士論文改寫的《從隘庄到茶鄉：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與社會發展（1834-1911）》，⁹⁵2015年更以竹塹社為系列專書，推出包含有楊毓雯的《平埔客：從『去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⁹⁶邱美玲的《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⁹⁷廖志軒的《當熟番遇到客家：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的客家化》等；⁹⁸過去竹塹地域平埔族和在地族群的發展互動關係。2016年李科旻的《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各音系社群分布與「閩人濱海，客家近山」之形成》。⁹⁹綜合上述可看出，新竹縣文化局的支持挹注下，亦使竹塹學研究更加發光發熱。

⁹³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文化叢書出版審查作業要點〉，2012年5月3日。（檢索時間2021年5月11日）網址：<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Detail?filter=3a8c648f-0b06-4f29-9ec4-1f3f05686c78&id=d0c46fda-3b0d-4d10-b67d-33fa27ce27d1>

⁹⁴ 蔡雅蕙，《彩藝風華：以客籍邱氏彩繪家族為主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傳統彩繪之源流》，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2年。

⁹⁵ 吳憶雯，《從隘庄到茶鄉：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與社會發展（1834-1911）》，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3年

⁹⁶ 楊毓雯，《竹塹社專書—平埔客：從『去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⁹⁷ 邱美玲，《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⁹⁸ 廖志軒，《當熟番遇到客家：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的客家化》，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⁹⁹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各音系社群分布與「閩人濱海，客家近山」之形成》，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6年。

伍、結論

戰後以來的臺灣學術，著重於承接大中國史觀之道，相對於地方文史則通歸於方志記載。1970年代的「濁大計畫」給予了臺灣學術研究新的取徑方向，學科的整合運用和有志者的投入，擴大了相關史料的運用研究，使得竹塹地域空間研究得以興生發展。以近期2019年陳惠齡的〈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為例，便是結合當下學界新興議題—「歷史記憶」，將具有新竹背景之作家的「地方經驗」視為一個問題意識，經由歷史與知識背景探討，進而造就新竹「地方意識」的特質，觀點十分跳脫，頗具開創新意。¹⁰⁰這種由拓展研究方法與學術視野而取得突破的成績，便是從1980年代以來一脈相傳的精神。當下新竹地方學的蓬勃茁壯，亦是在此方式上，再結合相關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學校系所，彼此互助推波。尤以政府單位的大力支持，使之在研究的歷程本質中，不僅擴大研究意義範疇，最終更得加深對地域空間的認識、理解乃至彼此價值的認同。

西方社會學者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以批判哲學而著稱；嘗道：「『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是令人驚異的說法，空間的生產，在概念上與實際上是最近才出現的…今日，對生產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¹⁰¹

¹⁰⁰ 陳惠齡，〈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六十七期，2019年，頁227-260。

¹⁰¹ 法國社會學者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年6月16日—1991年6月29日），以批判哲學而著稱，主要宗旨在於揭發人們日常生活過程中，有意無意間涉及到的各種社會空間，並致力定義出各式在世俗價值中，被忽略或被刻意隱藏的空間意義。」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 W.(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Irvington.

確實，透過新的研究視角觀點，開啟竹塹地域空間研究的契機；然而對於空間向度的把握，卻也因此受限於此！由於現今地方學多受政府單位加持資助，而地方政府又以縣市行政區劃為範圍，以新竹縣市各自的地方學發展為例，新竹市自古為城區所在，而新竹縣則含括於新竹平原丘陵，因而形成一主攻文學文人，一擅長族群地域，難免有「各施其政」現象，無形中更割裂了整體發展性。若能突破固有行政區劃範圍的限制，以水域、族群、社會、文化、產業等主題于新空間向度探討；同時，再配合區域研究的跨學科性質，整合不同研究方法，咸信不但可以使之內涵更加深加廣，亦將有助於提升地方學的發展及空間。

徵引資料

(一) 史料文獻

「奉總統交下裁員減政意見報告所研提之「精簡機構員額實施方案」已奉批示擬遵照辦」，〈行政院〉，1958年2月20日，國史館檔案史料數位典藏：014-000205-00156-001

「分存單地方志書纂修辦法」，〈地方志書纂修辦法〉，1944年5月16日，國史館檔案史料數位典藏：001-016122-00001-001

繆正西先生訪談紀錄。

(二) 專書

何明星，《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7年。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發展(1834-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4，1986年。

吳學明主編，《地方菁英與地域社會—姜阿新與北埔》，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7年。

吳憶雯，《從隘庄到茶鄉：新竹峨眉地區的拓墾與社會發展（1834-1911）》，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3年

宋晞，《方志學研究論叢》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李科旻，《清代新竹鳳山河流域：各音系社群分布與「閩人濱海，客家近山」之形成》，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6年。

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 第七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林修澈主編，《賽夏學概論》，苗栗縣文化局，2006年。

- 林桂玲，《家族與寺廟—以竹北林家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1895）》，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
- 邱美玲，《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 姜仁森，《北埔鄉誌》，新竹：北埔鄉公所，1977年。
-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
-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叢刊第15號，1987年。
- 范明煥，《新竹地區客家人媽祖信仰之研究》，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
- 高有德，邱敏勇，《東埔一鄰遺址玉山國家公園早期人類聚落史研究（一）》，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8年。
- 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頁》臺北市：聯經，1995年。
- 張谷誠編，《新竹叢志》，新竹：張谷誠，1952年。
- 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年。
- 畢慶昌等，《新竹新志》，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
- 莊永明，《臺灣百人傳3》，臺北市：時報文化，2001年。
- 莊英章，《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社區的比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1994。
- 許雪姬、林玉茹，《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9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五南，2017年。
- 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等，《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

-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7年。
- 黃鐘生，《新竹風物誌》，新竹：聯合版新竹分社，1960年。
-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臺灣省新竹縣誌稿》，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印，1955-1957年。
- 楊毓雯，《竹塹社專書—平埔客：從『去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 廖志軒，《當熟番遇到客家：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的客家化》，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年。
- 蔡雅蕙，《彩藝風華：以客籍邱氏彩繪家族為主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傳統彩繪之源流》，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2年。
- 賴玉玲，《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以楊梅聯庄為例》，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
- 羅烈師，《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8年。
- 蘇子建，《塹城詩薈》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

（三）期刊專書論文

- 王世慶，〈光復後臺灣省通志之纂修〉，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前揭《機關志講義彙編》，頁226。
- 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於潘英海、詹素娟合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27-172。
- 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27-172。
- 王國璠，前揭〈臺灣地區文獻工作研討會記盛〉，《臺北文獻》直字第

- 34期，頁23。
- 牟立邦，〈16-17世紀竹塹地域延展的歷史意義〉發表於2020年第一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六屆南臺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 吳學明，〈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鄉村社會的變遷—以新竹北埔為例〉，《臺北文獻》直字107期，1994年，頁23-67。
- 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臺灣史研究》2卷2期，1995年12月，頁5-52。
- 吳學明，〈清代竹塹城周姓族人研究〉，《明志工專學報》26期，1994年，頁219-232。
- 吳學明，〈新竹頭前溪中上游的土地開墾（上）〉，《臺北文獻》直字108期，1994年9月，頁1-48。
- 吳學明，〈新竹頭前溪中上游的土地開墾（下）〉，《臺北文獻》直字109期，1994年12月，頁16-67。
- 吳學明，〈閩粵關係與新竹地區的土地開墾〉，《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期，1999年12月，頁15-19。
- 李季樺，〈田野拾穗：竹北番仔祠堂田野筭記〉，《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期，頁24-26。
- 李季樺，〈竹塹社的「三」姓——一位客家化平埔族人的訪問記要〉，《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0期，頁11-14。
- 李季樺，〈清代「番兒至老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收入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史蹟研究中心，頁73-106。
- 李季樺，〈清代番兒老而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9年，頁99-101。

- 李季樺、張炎憲的〈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173-218。
-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十三卷三期，2002年9月，頁21-23。
- 林玉如，〈知識與社會：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9年，頁42-43。
- 林呈潢，〈現代圖書館目錄的功能與角色〉《大學圖書館》2卷2期，1998年4月，頁62-82。
- 林熊祥，〈臺灣修志的理論與實際〉，《臺灣文獻》10卷第4期，1959年12月，頁3。
-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6期，1975年，頁191-208。
- 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卷4期，1989年，頁33-69。
- 施添福，〈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期，1990年，頁67-92。
-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筭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卷2期，1989年，頁95-98。
-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筭記(二)——竹塹、竹塹埔和「鹿場半被流民開」〉，《臺灣風物》，39卷3期，1989年，頁95-98。
- 原住民族文獻編輯部，〈尋根一道卡斯族專題〉《原住民族文獻》第12期，2013年12月，頁2-3。
- 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臺北：中央

-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7年。
- 張炎憲，〈臺灣史的建構—從縣史研究談起〉，《彰化縣建縣二百八十週年系列活動2003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994年，頁11-17。
- 張炎憲，〈張炎憲序 從1995年的學術研討會反省臺灣歷史意識〉，《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頁1。
- 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收入《平埔研究論文集》，頁173-218。
- 張陳基，〈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介紹〉，《全球客家研究》第13期，2019年11月，頁。211-218
- 莊英章、武雅士，〈臺灣北部閩、客婦女地位與生育率：一個理論假設的建構〉，莊英章、潘英海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頁97-112。
- 莊英章、陳運棟，〈晚清臺灣北部漢人拓墾型態的演變：以北埔姜家的墾闢事業為例〉，收入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文化變遷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年，頁1-43。
-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6期，1975年，頁165-190。
- 郭佳玲，〈論戰後臺灣縣(市)志的纂修(1945~2008)〉《臺灣文獻》，第61卷第1期，頁221。
- 陳志豪，〈臺灣隘墾史的研究與回顧—以竹塹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臺灣史料研究》第30期，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7年，頁70-85。

- 陳志豪，〈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主辦，2013年。
- 陳清添，〈當前地方文獻工作的體認〉，《臺灣文獻》第38卷1期，1987年3月，頁262。
- 陳惠齡，〈作為隱喻性的竹塹／新竹符碼—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地方意識與地方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六十七期，2019年，頁227-260。
- 陳惠齡，〈從「傳統竹塹」到「現代新竹」—「第一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意義與省思〉，《竹塹文獻》第58期，2014年12月，頁104-115。
- 黃子堯，〈臺灣客家運動—文化、權力與族群菁英〉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2006年，頁35-64。
- 詹素娟，〈方志纂修與內政部〉，《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0期，1991年9月，頁14-16。
- 廖志軒，〈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民族學界》43期，2019年，頁163 - 194。
- 廖志軒，〈竹塹社的研究回顧與評析〉，《民族學界》43期，2019年，頁170。
- 蕭明治，〈論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以鄉鎮志為例〉，《臺灣文獻》第58卷第2期，2007年6月，頁130-131。
- 謝嘉梁，〈臺灣文獻業務之沿革發展〉，《臺灣文獻》第50卷1期，1999年3月，頁10；另參閱黃文瑞，〈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沿革〉，《臺灣文獻》第45卷2期，1994年6月，頁210。

(四) 畢業論文

吳聲淼，〈隘墾區伯公研究：以新竹縣北埔地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碩士論文，2008年。

李雅婷，〈1987-2008年臺灣客家議題發展之研究：以客家雜誌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杜立偉，〈清代芎林地區漢人社會的建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碩士論文，2011年。

徐慧鈺，〈林占梅先生年譜〉，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張瑞恭，〈賽夏族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紙湖、向天湖社群的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許世賢，〈劉銘傳裁隘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的隘墾社會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年。

郭佩瑜，〈戰後初期臺灣省級政府的地位轉變(1945-1953)〉，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陳志豪，〈北臺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6年。

陳胤宏，〈遠離臺北：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陳鳳虹，〈清代臺灣私鹽問題研究--以十九世紀北臺灣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6年。

彭瑞麟，〈金廣福文教基金會參與客家地區社區營造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論文，2009年。

黃冠彰，〈戰後臺籍菁英對政府施政之肆應——以林獻堂與吳新榮為探討中心(1945-1955)〉，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謝智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詩文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羅烈師，《新竹大湖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個客家農村的歷史人類學探討》，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五）外文資料

Chuang Ying-Chang and Arthur P. Wolf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ume 54 , Issue 3 , August 1995 , pp. 781 -795

Chuang, Ying-chang & Arthur P. Wolf,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ligious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eds.,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 W.(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Irvington.

（六）網路資料

〈成立沿革〉文化部（檢索時間2021年5月13日）網頁：
https://www.moc.gov.tw/content_246.html

〈研討會緣起〉，〈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官方網頁（檢索時間2021年4月8日）：<http://thrrp.ith.sinica.edu.tw/about.php>

〈新竹縣志續修〉，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檢索時間2021年4月21日）網址：<https://www.hchcc.gov.tw/Tw/Publication/BooksDetail?filter=ed718424-8884-4814-beff-5cc0f1a1d017&id=4e8a16ad-d804-4717-81d0-33ebf5b1bf00>

《新竹市志卷首下》〈新竹市志凡例〉，頁3。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檢索時間2021年4月21日）網址：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HCLR_his/150889

「歷史所介紹」，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檢索時間2021年5月13日）網址：<http://in.ncu.edu.tw/~hi/chinese/history02.html>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文化叢書出版審查作業要點〉，2012年5月3日。（檢索時間2021年5月11日）網址：<https://www.hchcc.gov.tw/Tw/Service/Detail?filter=3a8c648f-0b06-4f29-9ec4-1f3f05686c78&id=d0c46fda-3b0d-4d10-b67d-33fa27ce27d1>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官方網頁（檢索時間2021年4月8日）：https://indigenous.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299&s=4222

羅烈師，〈臺灣地區二十年來客家博碩士論文簡述〉，客家委員會研究報告（檢索時間2021年4月30日）網址：<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5&PageID=36792>

唐詩中三都內、外關道*

蔡坤倫**

摘要

本文以唐詩作為文本分析，提取詩中關防記載為討論面向，將關防詩透過唐代三都，即國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內、外交通予以分類。首先是三都間的關道，長安洛陽道有潼關、函谷關；長安太原道有蒲津關、汾水關、陰地關；洛陽太原道有天井關、壺口關。其次是三都對外的關道，長安東南面的藍田武關道有藍田關、武關；長安西南面的秦嶺谷道有駱谷關、散關、百牢關、斜谷關；長安北面往受降城有蘆子關；長安西面往隴山有蕭關、玉門關；洛陽東面往汴州有武牢關；太原西北面往憲州有鴈（雁）門關。總計唐詩中三都對內、對外交通上的關有18座，對於關的位置、變遷、道路等面向加以闡發，並以《唐六典》將唐關分為上、中、下三級標準來推敲文人眼中個別的關層級，可說是陳寅恪以詩證史之意涵。

關鍵詞：唐詩、關防、長安、洛陽、太原

* 拙稿曾宣讀於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主辦「第十屆：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108.5.31）。受益評論人詹士模老師於會中指點。再受益於學報兩位學者的審核，承蒙提供諸多寶貴的卓見與幫助，謹致謝忱。唯文章疏漏之責仍由筆者自負。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Inner and Outer Roads of Guan in Three Capitals of the Tang Poems

Kun-lun Ts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ang poems as the text analysis, and extracts the guan poems in the poems as the discussion face. The guan poems will be classified through the inner and outer traffic in three capitals of the Tang Dynasty (Changan of the capital, Luoyang of dongdu, Taiyuan of beidu). First, roads of guan between the three capitals : Changan-Luoyang-Road has Shaoguan and Hangu-Guan; Changan-Taiyuan Road has Pu-jin-guan, Qi-shui-guan and Yin-di-guan; Luoyang-Taiyuan-Road has Tian-jing-guan and Hu-kou-guan. Secondly, external roads of guan in the three capitals : Lantian-Wuguan-Road in the southeast of Changan has Lan-Tian-Guan and Wu-Guan; Qinling-Valley-Road in the southwest of Changan has Luo-Gu-Guan, San-Guan, Bai-Lao-Guan, Xie-Gu-Guan; North of Changan to Shou-Jiang-Cheng has Lu-zi-guan; West of Changan to Lu-shan has Xiao-guan and Yu-men-guan; East of Luoyang to Bianzhou has Wu-lao-guan; Northwest of Taiyuan to Xian-zhou has Yan-men-guan. External traffic of three capitals is divided into two chapters due to

*** Doctoral degree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resent.

the large length of spac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affic in three capitals of the Tang poems have eighteen. The article elucidates the location, change, and road of Guans, and by "Tang six Code" divides guans of the Tang Dynasty into superior, medium, inferior three levels, and elaborates the individual guans level in the eyes of literati. It is said that Chen, Yin-Ke's meaning by poems evidence history.

Keywords : Tang poems, Guans, Changan, Luoyang, Taiyuan

壹、前言

呂思勉云：「古代列國之間，交通多有制限，是為關梁。」

¹可見「關」制限交通，關與交通重要性密不可分，實為點睛之論。交通猶如人體內血管，血管暢通與否繫乎國家穩定，²而道路上的關隘，尤為掌控交通順暢的關鍵，是以歷代統治者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均將「關」視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軍事設施。《尉繚子·踵軍令》：「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³《淮南子·兵畧訓》亦云：「破路津關，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⁴蘇秉琦認為關卡的設置是國家的象徵，⁵可見關是交通發展至一定程度的產物。關之重要性在於扼守交通路線，誠然有交通線不一定有關，但有關則必有交通線經過。

關與交通既然如唇、齒關係，本文擬就唐詩中的關防記載作為文本分析，⁶目前管見唐詩中的「關」明確知其名稱者計有 25 座。⁷

¹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1版），頁 549。

² 章群序，收錄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專刊，1967.12）。周一士，《中國公路史》（臺北：公路出版社，1957.8，初版），頁 1。

³ 佚名著，張金泉注譯，《新譯尉繚子》（臺北：三民書局，1996.2，初版），卷 4，〈踵軍令〉，頁 101。

⁴ 漢·劉安撰，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10，1版），卷 15，〈兵畧訓〉，頁 1073。

⁵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1，1版），頁 153。

⁶ 清人彭定求（1645-1719）等人於康熙 44 年（1705）3 月開始編纂《全唐詩》，成於康熙 45 年（1706）10 月，以不到兩年時間，在明人胡震亨（1569-1645）與清人季振宜（1630-?）的基礎上，再加以校補而成，總計收錄 48900 餘首唐詩，作者 2200 餘人，計 900 卷。這部卷帙浩大的唐詩全集，對於研究唐史、文學、文化等面向具有一定指標性。詳參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4，1版）「點校說明」。

⁷ 唐詩中提到的 25 座關：潼關、函谷關、蒲津關、汾水關、陰地關、天井關、壺口關、藍田關、武關、駱谷關、散關、百牢關、斜谷關、蘆子關、蕭關、玉門關、武牢關、鴈（雁）門關、穆陵關、江關、鬼門關、柴關、青溪關、鐵門關（鐵關）、

又唐代國都定於長安(京城、西京、中京、上都),⁸高宗顯慶二年(657)稱洛陽為東都(神都、東京),⁹武則天天授元年(690)設置北都(北京)太原,¹⁰長安、洛陽、太原構成唐代都城三角形三端頂點,頂點間的對內與對外交通對於整個唐帝國的盛衰扮演著關鍵角色,存在於三頂點間對內與對外的關防在唐詩中有 18 座,此 18 座關乃為文章中討論的底本。

本文除前言與結語外,中間分為三章。首先是三都間的關道,計有 7 座關,長安洛陽道有潼關、函谷關;長安太原道有蒲津關、汾水關、陰地關;洛陽太原道有天井關、壺口關。其次是三都對外的關道,第一部分是長安東南行越秦嶺嶢山、商山段的藍田武關道,道上有藍田關、武關;長安西南行越秦嶺終南山、大散嶺段的長安秦嶺谷道,道上有駱谷關、散關、百牢關、斜谷關,計有 6 座關。第二部分是長安北行往西受降城有蘆子關;長安西行往隴山有蕭關、玉門關;洛陽東行往汴州有武牢關;太原西北行往憲州有鴈(雁)門關,計有 5 座關,其中三都對外交通因篇幅較多,分作兩章節。總之,唐詩中三都對內、對外交通上的關有 18 座,(圖 1)闡述這 18 座關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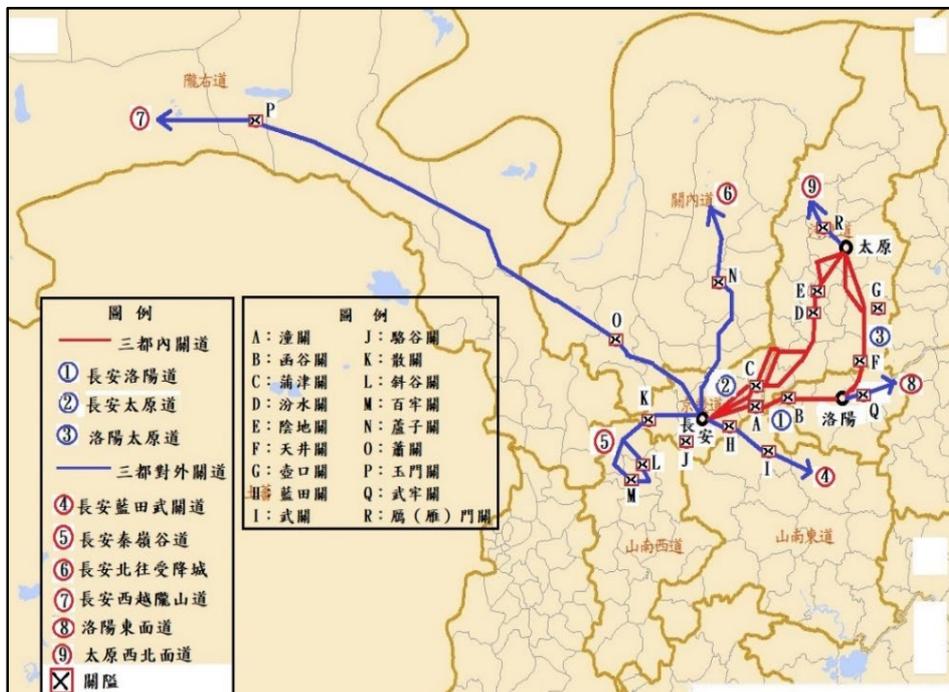
居庸關。

⁸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1版),卷38,〈地理志·關內道·京兆府〉,頁1396。「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詳參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1版),卷37,〈地理志·關內道·上都〉,頁961。

⁹ 「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肅宗元年復為東都。」詳參《新唐書》,卷38,〈地理志·河南道·東都〉,頁981-982。

¹⁰ 《舊唐書》,卷39,〈地理志·河東道·太原府〉,頁1481。「北都,天授元年置,神龍元年罷,開元十一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北京,上元二年罷,肅宗元年復為北都。」詳參《新唐書》,卷39,〈地理志·河東道·北都〉,頁1003。

變遷、道路等面向，同時結合《唐六典》將關區分為上、中、下三層級，¹¹予以劃分與推測唐詩中記載的關等級。



【圖 1】唐詩中三都內、外關道

出處：底圖中研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簡易版)唐代歷史地圖改繪而成。

¹¹ 「凡關二十有六，而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上關六：京兆府藍田關，華州潼關，同州蒲津關，岐州散關，隴州大震關，原州隴山關。餘關有驛道及四面關無驛道者為中關，中關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駱谷、庫谷，同州龍門，會州會寧，原州木峽，石州孟門，嵐州合河，雅州邛萊，彭州蠶崖，安西鐵門，興州興城，華州渭津也。他皆為下關焉。下關七：梁州甘亭、百牢，河州鳳林，利州石門，延州永和，綿州松嶺，龍州涪水。」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1，1版)，卷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195-196。

貳、唐詩中三都間的關道

一、長安洛陽道「關」

隋唐都城在上都長安，同時建東都於洛陽，有唐一代武則天定都洛陽，使得洛陽成為長安之外另一個政治中心。兩都之間官吏、商旅往來絡繹不絕。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十二月定「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¹²從京畿道長安至河南道汴州，沿途穿越東都洛陽，可說兩京驛路是大路驛局部，居當時國內驛路的核心要道。唐代兩京驛路由西向東分成三段：首先是長安東經潼關至虢州湖城縣，¹³其次是湖城縣分南、北兩道後，東至陝州桃林縣匯合後，再行至陝縣。¹⁴最後是陝縣分嶠山南、北兩路東至河南府洛陽。南路雖較迂回，但較北路平坦，唐代公私旅行多取南路。¹⁵路線大致由長安東沿渭水、黃河

¹² 北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5，1版），卷 61，〈館驛使〉，頁 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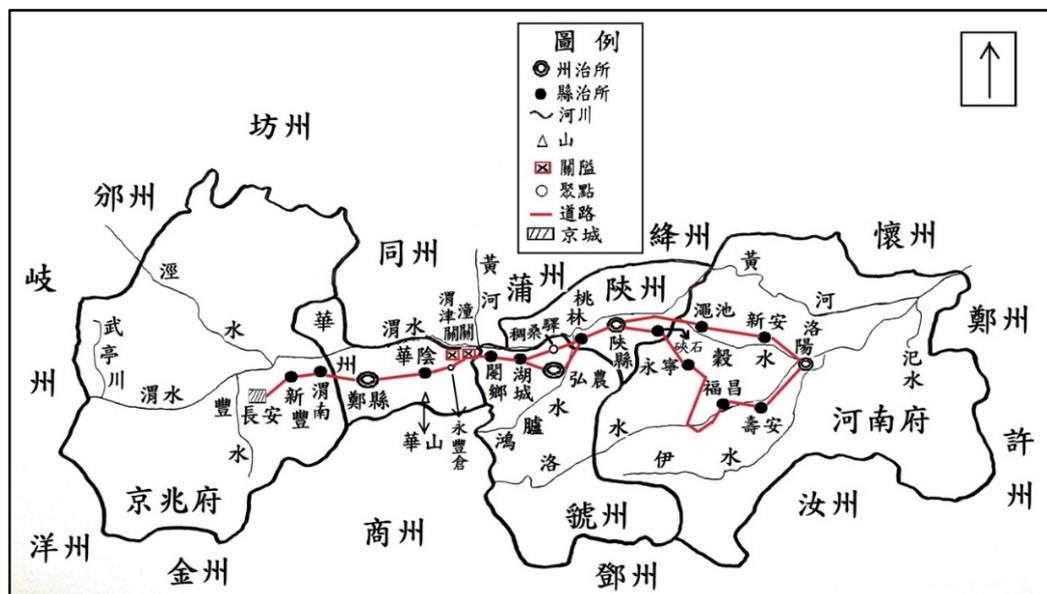
¹³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頁 22-42。王文楚，〈唐代兩京驛路考〉，頁 47-60。〈西安洛陽間陸路交通的歷史發展〉，兩文均收入氏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7，1版），頁 94。

¹⁴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44、45-51。王文楚，〈唐代兩京驛路考〉，頁 60-61、63-65。王文楚，〈西安洛陽間陸路交通的歷史發展〉，頁 95。

¹⁵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17、51-78。王文楚，〈西安洛陽間陸路交通的歷史發展〉，頁 94。

南岸，經華州、潼關至陝州，陝州而東，離開黃河，偏南行至洛陽。

16 (圖 2)



【圖 2】長安至洛陽路線圖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44-45、46-47 改繪而成。】

(一)潼關

潼關位置據《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華州華陰縣記載：「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又云河在關內，南流衝激關山，因謂之『衝關』。」¹⁷關山即華山，華陰縣（今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市）在華山北，潼關在華陰縣東北 39 唐里，則潼關在華山東北。黃河衝擊華山東側

¹⁶ 劉希為，《隋唐交通》（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3，臺 1 版），頁 50。

¹⁷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6，1 版），卷 2，〈關內道·華州·華陰縣·潼關〉，頁 35。

後，受到山勢逼擋，折而東去，(圖 3)，故此關又稱衝關，薛能則以〈關中送別〉「黃河淹華岳」詩，¹⁸以黃河水淹華山來形容此地山、河之險。潼關位於今陝西省渭南市潼關縣，地處黃河口字段南流轉彎 90 度折而向東，關城北臨黃河，南依華山，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荆山已去華山來」，¹⁹張祜〈晚秋潼關西門作〉：「關門西去華山色，秦地東來河水聲」，²⁰由東向西入潼關時，華山位於左側，而入潼關後也進入所謂關中地區，即古代秦地所在，滾滾黃水從西向北而南口字型環繞於關中北側，南流至潼關大幅度轉彎，岑參〈東歸晚次潼關懷古〉：「遂登關城望，下見洪河流」，²¹吳融〈出潼關〉：「華嶽眼前盡，黃河腳底來」，²²既然能登關城而俯瞰「洪流」從「腳底來」，可見關城臨黃河才會有「水聲」不絕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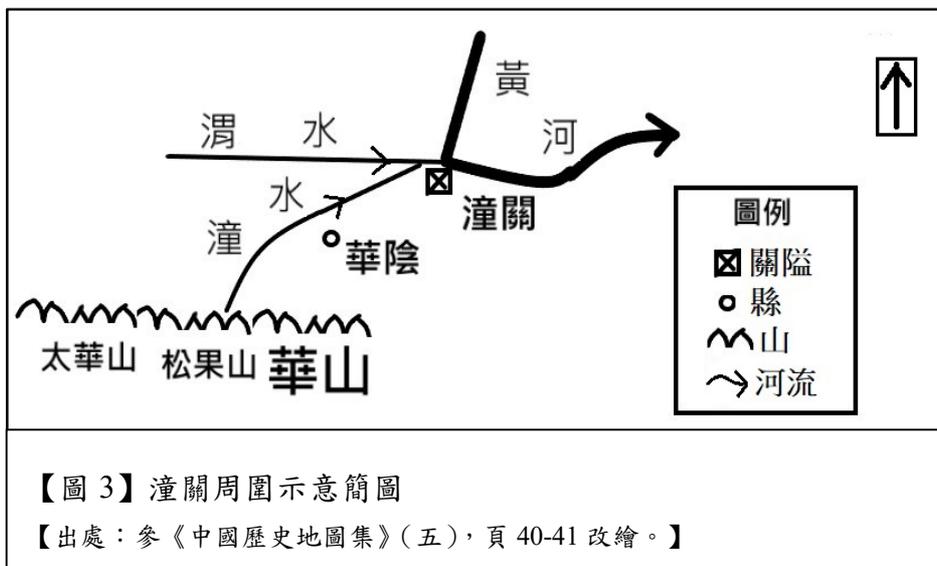
¹⁸ 《全唐詩》(第 17 冊)，卷 558，薛能〈關中送別〉，頁 6471。

¹⁹ 《全唐詩》(第 10 冊)，卷 344，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頁 3857。

²⁰ 《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1，張祜〈晚秋潼關西門作〉，頁 5840。

²¹ 《全唐詩》(第 6 冊)，卷 198，岑參〈東歸晚次潼關懷古〉，頁 2042。

²² 《全唐詩》(第 20 冊)，卷 684，吳融〈出潼關〉，頁 7858。



【圖 3】潼關周圍示意簡圖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 改繪。】

西入潼關後左側除見到華山之外，太華山亦見於眼簾。許渾〈秋日赴關，題潼關驛樓（行次潼關，逢魏扶東歸）〉：「殘雲歸太華」，²³岑參〈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開門見太華」，²⁴據《山海經·西山經》記載，太華山位於松果山西側，²⁵太華山在華陰縣南 8 唐里。²⁶松果山與太華山依序為華山西延餘脈。換言之，不論是松果山或太華山皆僅是華山部分。

崔顥〈題潼關樓〉：「河繞華陰流」，²⁷華陰縣有河流經，此河乃

²³ 《全唐詩》(第 16 冊)，卷 529，許渾〈秋日赴關，題潼關驛樓（行次潼關，逢魏扶東歸）〉，頁 6053。《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1，許渾〈秋霽潼關驛亭〉，頁 6070。《全唐詩》(第 25 冊)，卷 884，許渾〈夜行次東關逢魏扶東歸（行次潼關驛逢魏扶東歸）〉，頁 9991。

²⁴ 《全唐詩》(第 6 冊)，卷 198，岑參〈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頁 2027。

²⁵ 佚名著，方韜譯注，《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2009.3，1 版)，卷 2，〈西山經〉，頁 19。

²⁶ 《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華州·華陰縣·太華山〉，頁 35。

²⁷ 《全唐詩》(第 4 冊)，卷 130，崔顥〈題潼關樓〉，頁 1328。

是渭水支流潼水。《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華州華陰縣潼關：「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²⁸位於潼關西側的潼水乃是潼關名稱源由。潼水名稱古今多變，酈道元的《水經》注文，「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²⁹源自松果山的灌水是北流入黃河的南側支流之一，因北流經逕通谷，故水亦稱通谷水或潼谷水，繼而往東北流入黃河。通谷水古稱濩水，據《山海經·西山經》記載：「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³⁰濩水源自華山西延餘脈的松果山，先是北流入渭河，再東北匯入黃河。酈說灌水同通谷水或潼谷水，關治中云：「通谷水後演釋為潼水」，³¹則潼水亦同潼谷水。總之，不論是《山海經》記載的濩水，酈道元記錄的灌水（通谷水、潼谷水），或是李吉甫（758-814）所謂的潼水，皆指同一條水，因時代背景導致名稱互異。

潼關設置於山、河形勢交錯之地，山者主要是華山、松果山、太華山，河者主流是黃河，支流是渭水與潼水。尤其是黃河衝擊華山，水由南轉向東流正好位於潼關北側，關城北臨黃河，南依華山，設關於此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態勢。張祜〈入潼關〉：「都城三百里（連二百），雄險此迴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³²許渾〈行次潼關題驛後軒〉：「山形朝闕（岳）去，河勢抱（入）關來」，³³〈潼

²⁸ 《元和郡縣圖志》，卷2，〈關內道·華州·華陰縣·潼關〉，頁35。

²⁹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6，1版），卷4，〈河水〉，頁315-316。

³⁰ 《山海經》，卷2，〈西山經〉，頁19。

³¹ 關治中，〈潼關天險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三〉，《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35。

³² 《全唐詩》（第15冊），卷510，張祜〈入潼關〉，頁5814。

³³ 《全唐詩》（第16冊），卷528，許渾〈行次潼關題驛後軒〉，頁6042。

關蘭若〉：「前軒（山）枕大河」，³⁴溫庭筠〈過潼關〉：「地形盤屈帶河流」，³⁵不論是「地勢遙尊嶽」、「山（地）形」、「前軒（山）」均指華山，「河流側讓關」、「河勢抱（入）關」、「大河」指黃河。

徐夔〈憶潼關〉：「山夾黃河護帝居」，³⁶山、河、關構成帝都長安東面的地域控制，是以李遠〈贈潼關不下山僧〉提及「枕上斜看百二關」，³⁷「百二」一詞源自《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集解》引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百二，百中之二，二十萬人也。」³⁸「百二」中的「二」是二萬人抑或二十萬人，蘇林自身說法亦呈現分歧，但百二說明以寡擊多，百二關意指潼關本身具備優勢，足以以少數兵力就能擋住百萬雄師。

唐太宗〈入潼關〉詩：「嶠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霜峰直臨道，冰河曲繞城」，³⁹唐玄宗〈潼關口號〉：「河曲回千里，關門限二京。」⁴⁰「河曲」是指黃河在潼關處轉彎，又因緯度較高，河道時而結冰，形成「冰河」景觀。「嶠函」在秦漢史籍中屢見，即嶠山與函谷關的連稱，一方面嶠山作為漢時山東、山西的分界；另一方面函谷關（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靈寶市）是關東、關西的分界，⁴¹由於嶠山與函谷關

³⁴ 《全唐詩》（第16冊），卷530，許渾〈潼關蘭若〉，頁6057。

³⁵ 《全唐詩》（第17冊），卷582，溫庭筠〈過潼關〉，頁6748。

³⁶ 《全唐詩》（第21冊），卷709，徐夔〈憶潼關〉，頁8155。

³⁷ 《全唐詩》（第15冊），卷519，李遠〈贈潼關不下山僧〉，頁5933。

³⁸ 前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11，2版），卷8，〈高祖本紀〉，頁382。

³⁹ 《全唐詩》（第1冊），卷1，太宗皇帝〈入潼關〉，頁5。

⁴⁰ 《全唐詩》（第1冊），卷3，明皇帝〈潼關口號〉，頁40-41。

⁴¹ 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收錄氏著，《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書局，1987.6，初版），頁85-113。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補正〉，收錄氏著，《秦漢史論稿》，頁114-120。

地理位置相近，山東即關東範圍。隋唐時山東、山西的山指太行山，跨越今河北、山西、河南省，關東、關西的關指今陝西省潼關，函谷關重要性不僅被潼關取代，成為關中新東界，更因為山與關的位置已東西分離，無法配合一致，山東與關東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域。⁴²潼關與東側的函谷關是長安洛陽道上往來必經關隘，兩關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扮演過重要角色，是以詩中將兩關與「兩(二)京」作連結。

潼關掌控兩京東西向道上要關，關門隨關座西向東亦呈東西方位。張說〈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關門東復西」，⁴³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日出(照)潼關四扇(面)開」，⁴⁴潼關的「四扇(面)開」意味潼關東、西面各開二扇門，讓每日往來吏民能夠順利度關。關屬軍事設施，關門又為一關乃至國家進出門戶，不論平日或戰時，駐軍防守有其必要，岑參〈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胡寇尚未盡，大軍鎮關門」。⁴⁵關門之外，從崔顥〈題潼關樓〉詩題中可知關門上置有關樓，⁴⁶並有相關戍防人員，杜甫〈潼關吏〉：「借問潼關吏，修關(築城)還備胡。……請囑防關將，慎勿(莫)學哥舒」，⁴⁷皮日休〈題潼關蘭若〉：「關吏不勞重借問」，⁴⁸關吏、關將之外，岑參〈送楊錄事充(充使)潼關判官〉詩

⁴² 張榮芳，〈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收錄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11，初版)，頁761。

⁴³ 《全唐詩》(第3冊)，卷89，張說〈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頁977。

⁴⁴ 《全唐詩》(第10冊)，卷344，韓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頁3857。

⁴⁵ 《全唐詩》(第6冊)，卷198，岑參〈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頁2025-2026。

⁴⁶ 《全唐詩》(第4冊)，卷130，崔顥〈題潼關樓〉，頁1328。

⁴⁷ 《全唐詩》(第7冊)，卷217，杜甫〈潼關吏〉，頁2283。

⁴⁸ 《全唐詩》(第18冊)，卷613，皮日休〈題潼關蘭若〉，頁7066。

題中道出楊錄事改任潼關判官，⁴⁹「錄事」據《通典·職官》錄事參軍條：「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⁵⁰錄事參軍是州郡佐吏職。「判官」依《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二年（759）三月丙申：「以河西節度副使來瑱為陝州刺史，充虢華節度、潼關防禦團練等使」，⁵¹上元元年（760）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為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⁵²廖立認為判官是防禦判官，隸屬於防禦使下，⁵³可見判官一職隸屬於防禦使下，屬於協防官。

潼關位於黃河南流往東行轉彎處之河南岸，崔顥〈題潼關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繞華陰流」，⁵⁴華山雄峙於京師所在的三輔以東，潼關鎮守古代雍州地，黃河東流經陝州陝縣，潼水流經華陰縣與關城西側。許敬宗〈奉和入潼關〉：「曦馭循黃道」，⁵⁵天剛亮時駕馭馬車循黃道而行，黃道指潼關以東沿黃河南岸而行的「潼關道」，⁵⁶或以「關路」稱之。⁵⁷溫庭筠〈過潼關〉：「十里曉雞關樹暗（靜）」，⁵⁸吳融〈早發（登）潼關〉：「關樹蒼蒼曉」，

⁴⁹ 《全唐詩》（第6冊），卷200，岑參〈五言律詩·送楊錄事充（充使）潼關判官〉，頁2068。

⁵⁰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12，1版），卷33，〈職官·州郡·總論郡佐〉，頁912。

⁵¹ 《舊唐書》，卷10，〈肅宗本紀〉，頁255。

⁵² 《舊唐書》，卷10，〈肅宗本紀〉，頁258。

⁵³ 唐·岑參，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9，1版），卷3，〈送楊錄事充潼關判官〉，頁533。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12，初版），第五、六章。

⁵⁴ 《全唐詩》（第4冊），卷130，崔顥〈題潼關樓〉，頁1328。

⁵⁵ 《全唐詩》（第2冊），卷35，許敬宗〈奉和入潼關〉，頁463。

⁵⁶ 《全唐詩》（第7冊），卷217，杜甫〈潼關吏〉，頁2283。

⁵⁷ 《全唐詩》（第11冊），卷358，劉禹錫〈和令狐相公入潼關〉，頁4031。

⁵⁸ 《全唐詩》（第17冊），卷582，溫庭筠〈過潼關〉，頁6748。

⁵⁹許敬宗〈奉和入潼關〉：「關樹蕩涼颺」，⁶⁰潼關道兩旁種植關樹，徐夔〈憶潼關早行〉：「關柳不知誰氏種」，⁶¹可見植樹類別或以柳樹為主。

陳季卿〈題潼關普通院門〉：「下坂馬無力」，⁶²坂是黃巷長坂，位於潼關東側，潘岳《西征賦》云「溯黃巷以濟潼」。⁶³酈道元注：「河水自潼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⁶⁴東漢（古）潼關興建於高而平坦的黃土原上，黃河緊鄰於坂側，「涉此坂以升潼關」意味由關東經潼關至關中，需先登長坂才能至潼關，因黃河邊無路可通。穆渭生也說：「坂道北面與黃河僅隔一道高崖，道南即是南原，坂道夾處於崖、原之間，長約 15 里，車不方軌。」⁶⁵換言之，潼關置於南原上，黃巷長坂北緊鄰黃河（絕澗），南側南原，此長坂乃作為登南原至潼關城的管道。

潼關是隋唐時期國內第一關，北臨黃河，南依華山，關城座西向東，宿衛東西向兩京交通往來。許渾〈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行次潼關，逢魏扶東歸）〉、〈夜行次東關逢魏扶東歸（行次潼關驛逢魏扶東歸）〉、〈秋霽潼關驛亭〉，薛逢〈潼關河亭〉，〈潼關驛亭〉，⁶⁶詩題

⁵⁹ 《全唐詩》（第 20 冊），卷 685，吳融〈早發（登）潼關〉，頁 7865-7866。

⁶⁰ 《全唐詩》（第 2 冊），卷 35，許敬宗〈奉和入潼關〉，頁 463。

⁶¹ 《全唐詩》（第 21 冊），卷 709，徐夔〈憶潼關早行〉，頁 8155。

⁶² 《全唐詩》（第 25 冊），卷 868，陳季卿〈題潼關普通院門〉，頁 9838。

⁶³ 《通典》，卷 173，〈州郡·古雍州·華陰郡華州·華陰縣〉，頁 4513 引。

⁶⁴ 《水經注疏》，卷 4，〈河水〉，頁 316。

⁶⁵ 穆渭生，〈唐代潼關述略——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陝西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第 4 期，頁 63-64。

⁶⁶ 《全唐詩》（第 16 冊），卷 529，許渾〈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行次潼關，逢魏扶東歸）〉，頁 6053。《全唐詩》（第 25 冊），卷 884，許渾〈夜行次東關逢魏扶東歸（行次潼關驛逢魏扶東歸）〉，頁 9991。《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1，

中有潼關驛、驛樓、驛亭、河亭，唐代潼關屬於京城四面且有驛道的上關，⁶⁷潼關驛則是兩京驛道中沿線驛站之一，驛站上蓋有驛樓。亭據《唐六典》記載，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均設有亭長，⁶⁸以尚書省而言，亭長設置於主事（從九品）之下，職責為「主守省門，通傳禁約」，⁶⁹潼關驛亭應為設置於潼關驛的亭長，宿守驛站的門禁與通報。又因潼關北臨黃河而置，性質上屬於水、陸關，潼關河亭疑似為設置於潼關，宿衛潼關北側河道的亭長。

(二)函谷關

兩京驛道上的潼關與函谷關可說是不同時空背景下的關隘興衰沿革史，秦漢函谷關的地位在隋唐時被潼關取代，退居故關角色。岑參〈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君不見函谷關，崩城毀壁至今在。樹根草蔓遮古道，空谷千年長不改。寂寞無人空舊山，聖朝無外（事）不須關」，⁷⁰岑參在函谷關歡送劉評事出使關西時寫下懷念關詩，詩中以「崩城毀壁」、「古道」形容函谷關與道路的沒落，更以「聖朝無外（事）不須關」象徵盛世時不需要在內陸設關。皮日休〈古函關〉：「破落古關城」，⁷¹司空圖〈秦關〉：「形勝今雖在，荒涼恨不窮」，⁷²張九齡〈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空此置關城」，⁷³皆已物換星移，

許渾〈秋霽潼關驛亭〉，頁 6070。《全唐詩》（第 16 冊），卷 548，薛逢〈潼關河亭〉，頁 6324。《全唐詩》（第 16 冊），卷 548，薛逢〈潼關驛亭〉，頁 6325。

⁶⁷ 《唐六典》，卷 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 195-196。

⁶⁸ 《唐六典》，卷 1，〈尚書都省〉，頁 2。同書卷 8，〈門下省〉，頁 239。同書卷 9，〈中書省〉，頁 271。

⁶⁹ 《唐六典》，卷 1，〈尚書都省〉，頁 12-13。

⁷⁰ 《全唐詩》（第 6 冊），卷 199，岑參〈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頁 2053。

⁷¹ 《全唐詩》（第 18 冊），卷 615，皮日休〈古函關〉，頁 7093。

⁷² 《全唐詩》（第 19 冊），卷 632，司空圖〈秦關〉，頁 7253。

⁷³ 《全唐詩》（第 2 冊），卷 49，張九齡〈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頁 608。

人事已非來喻函谷關的衰微。

函谷關典故史亦是詩人詠懷項目，徐賢妃〈秋風函谷應詔〉：「此時飄紫氣，應驗真人還」，⁷⁴司馬貞引《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⁷⁵此為昔日真人老子騎青牛西出函谷關，紫氣東來之事。宋之問〈函谷關〉：「靈跡才辭周柱下，祥氛已入函關中」，⁷⁶周柱據《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⁷⁷老子因擔任過西周守藏室史或柱下史，管理全國圖書的職官，是以「周柱」借指老子，「祥氛」即老子西來函谷關時散發出來的祥瑞紫氣。

李涉〈曉過函谷關〉：「縱使雞鳴遇關吏」，⁷⁸宋之問〈過函谷關〉：「二百四十載，海內何紛紛。六國兵同合，七雄勢未分。從成拒秦帝，策決問蘇君。雞鳴將狗盜，論德不論勳」，⁷⁹提及函谷關在戰國時秦國與六國間扮演的角色，其中發生於齊湣王(323B.C.-284B.C.)25年(298B.C.)，先有狗盜狐白裘，後有發生於函谷關的雞鳴過關事件，⁸⁰雞鳴、孟嘗君與函谷關三者成為密不可分的關係。胡宿〈函谷關〉：「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謾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⁸¹白馬非馬論，以及西漢時終軍過函谷關，丟棄關吏給予回

⁷⁴ 《全唐詩》(第1冊)，卷5，徐賢妃〈秋風函谷應詔〉，頁59。

⁷⁵ 《史記》，卷63，〈老子韓非列傳〉，頁2141。

⁷⁶ 《全唐詩》(第2冊)，卷53，宋之問〈函谷關(首句缺二字)〉，頁658。

⁷⁷ 《史記》，卷63，〈老子韓非列傳〉，頁2139。

⁷⁸ 《全唐詩》(第14冊)，卷477，李涉〈曉過函谷關〉，頁5439。

⁷⁹ 《全唐詩》(第2冊)，卷52，宋之問〈過函谷關〉，頁636。

⁸⁰ 《史記》，卷75，〈孟嘗君列傳〉，頁2354-2355。

⁸¹ 《全唐詩》(第21冊)，卷731，胡宿〈函谷關〉，頁8369。

關時所需用到的「繻」。⁸²函谷關古道又稱「函谷路」或「函關路」，⁸³函谷道不僅指函谷關而已，常與嶠山連稱，楊齊哲〈過函谷關〉：「地險嶠函北，途經分陝東」，⁸⁴嶠山與函谷關合稱嶠函，嶠函古道在陝州陝縣以東分嶠山南、北二路至洛陽。⁸⁵

二、長安太原道「關」

國都長安至北都太原路線乃由京兆府長安東北行經同州、蒲州、絳州、晉州、汾州至太原府太原。⁸⁶具體路線是長安沿渭水北岸分南、北道東至同州，北道由長安北經中橋渡過渭水，經涇陽縣、三原縣、富平縣、奉先縣至同州治所馮翊縣；南道由長安東出，折北渡東渭橋至高陵縣，東略沿渭水北岸經櫟陽縣入華州下邽縣，渡洛水至同州馮翊縣。南道較北道近捷，唐人多取道於此。同州南可渡渭水至華陰縣，接長安洛陽道。或東行經朝邑縣至黃河蒲津，渡口建有蒲津橋、蒲津關，渡黃河後至河東道蒲州治所河東縣，蒲州至絳州分兩路，一路向北沿黃河東岸行，經寶鼎縣，渡汾水入絳州龍門縣，東行汾水北岸經稷山縣至治所正平縣。一路略沿涑水東北行，經虞鄉縣、解縣、安邑縣，入絳州聞喜縣，渡汾水至治所正平縣。另有由同州朝邑縣北沿黃河西岸行，經郃陽縣、韓城縣至龍門山、龍門關，東渡黃河至絳州龍門縣，接蒲絳道。

⁸² 後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1版），卷64，〈終軍傳〉，頁2819-2820。蔡坤倫，〈漢「繻」小考〉，《中華簡牘學會通報》，第3期（臺北，2010.12），頁49-58。

⁸³ 《全唐詩》（第13冊），卷432，白居易〈出關路〉，頁4771。《全唐詩》（第13冊），卷436，白居易〈社日關路作（為畿尉時作）〉，頁4833。《全唐詩》（第21冊），卷725，于鄴〈春過函谷關〉，頁8312-8313。

⁸⁴ 《全唐詩》（第22冊），卷769，楊齊哲〈過函谷關〉，頁8726-8727。

⁸⁵ 蔡坤倫，〈漢代函谷關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6）。

⁸⁶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127-128。

絳州至晉州分主線與支線，主線由絳州治所正平縣，東北渡汾水而上，經故關店至晉州治所臨汾縣。支線則由絳州稷山縣東北行，渡汾水匯入故關店接主線。晉州臨汾縣東北沿汾水東岸行，經洪洞縣、趙城縣、霍邑縣、汾水關，北入汾州陰地關、靈石縣至冷泉關。冷泉關東北至太原分南、北道，北道由冷泉關折北渡汾水，經孝義縣至治所隰城縣，北入太原府文水縣、交城縣、清源縣至太原。南道由冷泉關東行汾水南岸，經介休縣、平遙縣入太原府祈縣至太原。

(一)蒲津關

李吉甫記載唐代蒲津關位置有關內道同州朝邑縣與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兩說，⁸⁷層級屬上關。⁸⁸《元和郡縣圖志》同州朝邑縣：「以北據朝阪，故以為名。」⁸⁹縣名與位於北側的朝阪有關，朝阪據《水經注·補洛水》：「洛水東南歷強梁原，俗謂之朝坂」，⁹⁰朝坂即強梁原俗稱說法，原是黃土地形上高而平坦處，朝邑縣位於強梁原上，處於縣東南的蒲津關亦在原上。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記載：

秦王即秦惠文王也。蒲版，舜舊都，其北有長版，為邑之險要，故曰蒲版。魏既獻河西之地於秦，因險設關以備秦寇，故曰蒲

⁸⁷ 《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同州·韓城縣〉，頁 37。《通典》，卷 173，〈州郡·同州·朝邑縣〉，頁 4514。《元和郡縣圖志》，卷 12，〈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頁 326。

⁸⁸ 《唐六典》，卷 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 195-196。

⁸⁹ 《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同州·朝邑縣〉，頁 37。北宋·樂史，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11，1 版），卷 28，〈關西道·同州·朝邑縣〉，頁 601。

⁹⁰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4，1 版），卷 16，〈補洛水〉，頁 310。

版關，此魏之界上關也。後其地入秦，改曰臨晉關。⁹¹

朝坂在舜時稱長版，因地勢險要而曾設置為舜的都城（蒲版），戰國時秦、魏兩國爭河西之地，魏國最終獻河西地於秦國，因而在此地設蒲版關作為西禦秦國之邊界關，隨著秦國勢力的增強，蒲版關周圍土地入秦國，此關亦成為秦國內關。

蒲津關稱蒲坂（版、阪）關的原因是以所在長版、朝坂（阪）、蒲坂之強梁原地形命名。玄宗〈早度蒲津關〉：「鳴鑿下蒲坂」，⁹²宋璟〈蒲津迎駕〉：「回鑿下蒲坂」，⁹³張說〈奉和聖製度蒲關應制〉：「蒲坂橫臨晉」，⁹⁴古時皇帝出行、回宮經蒲津關時皆需上下蒲坂。岑參〈宿蒲關東店，憶杜陵別業〉：「關門鎖歸客，一夜夢還家」，⁹⁵關門啟閉遵循晝開夜閉原則，過此時段，只能先找旅店，是以有夜宿「蒲關東店」詩題。

唐代蒲津關位置有同州與蒲州（河中府）兩說，蒲津橋則是連接黃河兩岸的蒲津關，位於關內道同州朝邑縣東，以及河東道蒲州河東縣西之間，作為跨越黃河的用途。徐安貞〈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仙掌臨秦甸，虹橋闢晉關。兩都分地險，一曲度河灣」，⁹⁶宋璟〈蒲津迎駕〉詩「長橋壓水平」，⁹⁷「虹橋」、「長橋」是時人對蒲津橋的別稱，一曲則是對橋外觀的形容，又蒲津橋連接京兆府國都長安與

⁹¹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版），〈魏紀〉，頁149引。

⁹² 《全唐詩》（第1冊），卷3，明皇帝〈早度蒲津關〉，頁35-36。

⁹³ 《全唐詩》（第3冊），卷64，宋璟〈蒲津迎駕〉，頁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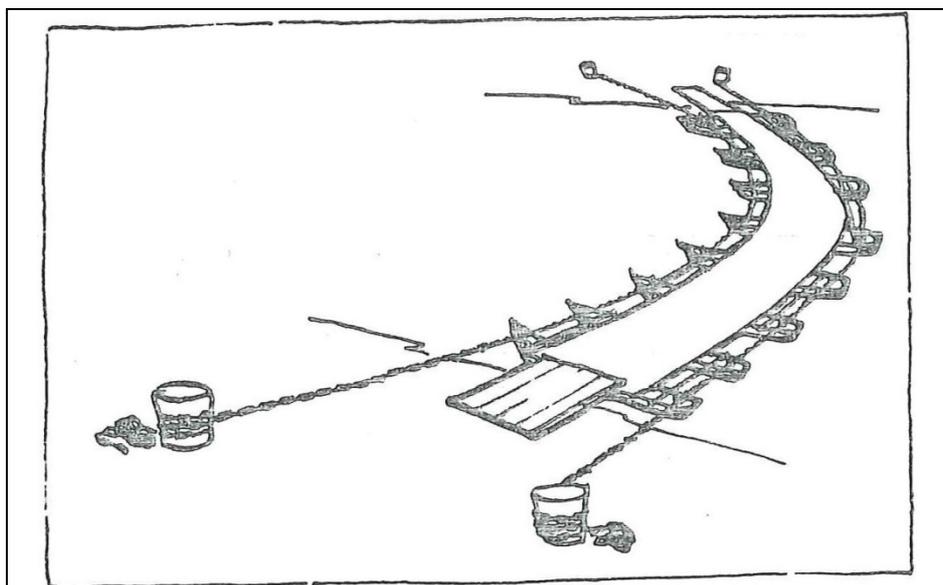
⁹⁴ 《全唐詩》（第3冊），卷88，張說〈奉和聖製度蒲關應制〉，頁964。

⁹⁵ 《全唐詩》（第6冊），卷199，岑參〈宿蒲關東店，憶杜陵別業〉，頁2061-2062。

⁹⁶ 《全唐詩》（第4冊），卷124，徐安貞〈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頁1229。

⁹⁷ 《全唐詩》（第3冊），卷64，宋璟〈蒲津迎駕〉，頁751。

河中府（蒲州）中都河東縣，⁹⁸是以說「兩都分地險」，即國都與中都因橋樑分峙於兩側。此橋並非直橋，而是外觀略彎的舟橋，閻伯瓊《河橋賦》詩云：「屈而且抱」、「浮梁西截於長河」、「崎嶇，似火龍之飲川」，⁹⁹崎嶇有險峻或骨瘦之意，蒲津浮橋地險且細長地橫躺於黃河上，如火龍飲川。後人據此稱曲浮橋、¹⁰⁰（圖4）雙曲橋。¹⁰¹



⁹⁸ 「大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721）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仍舊。」詳參《通典》，卷179，〈州郡·古冀州·河東郡蒲州·河東縣〉，頁4726。「肅宗乾元三年，以蒲州為河中府。」詳參《舊唐書》，卷38，〈地理志·關內道·同州〉，頁1400。

⁹⁹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11，1版），卷395，閻伯瓊《河橋賦》，頁4024-2至4025-1。

¹⁰⁰ 唐震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1，1版），頁230。

¹⁰¹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頁7。

【圖 4】曲浮橋

出處：唐震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頁 229。

蒲津橋橫跨黃河兩岸，為使舟橋於河中有緩點，免於河流湍急時造成橋身擺動，是有設置中渾，讓橋分兩段，河水分流。呂溫〈孟冬蒲津關河亭作〉詩題中提及：「河亭」，¹⁰²薛能《題河中亭子》：「河擘雙流島在中，島中亭子正南空」，¹⁰³島居河中，黃河雙擘分流，過中渾後，黃河又往南流匯合。《爾雅·釋水》：「渾，沙出」，郭璞注：「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渾。」釋曰：「言渾者是沙堆出於水中之名也，故名沙出。」¹⁰⁴渾是水中沙堆為洲，即沙洲之意，蒲津橋跨黃河之河中沙洲（渾），中渾又稱雞心灘、¹⁰⁵河心州、¹⁰⁶洲渚。¹⁰⁷（圖 5）中渾不僅能使橋身於河中有緩和點，減緩河水沖刷力，同時縮短橋身製造時的長度，架橋更為方便，穩定度也相對提高，可見中渾具有「襟束」黃河兩岸蒲津橋於河中之效，亦如薛能詩中所謂「島在中」，至於「島中亭子」指的是中渾上設置的中渾城。

¹⁰² 《全唐詩》（第 11 冊），卷 371，呂溫〈孟冬蒲津關河亭作〉，頁 4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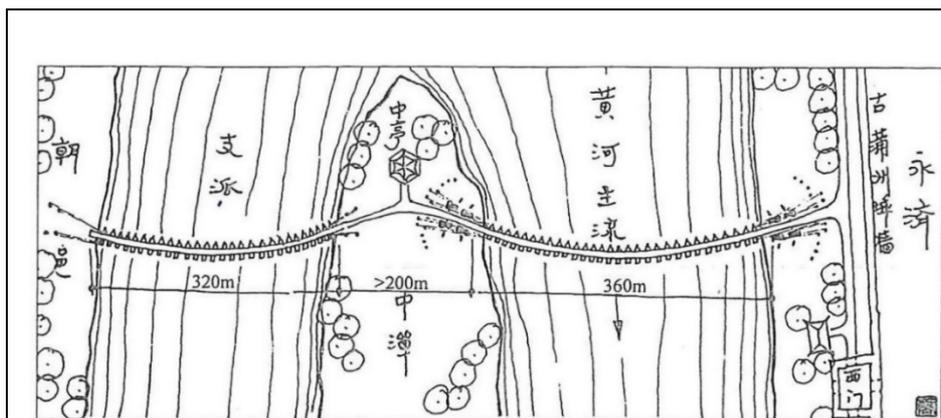
¹⁰³ 《全唐詩》（第 17 冊），卷 560，薛能〈題河中亭子〉，頁 6506。

¹⁰⁴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1 版），卷 7，〈釋水〉，頁 219。

¹⁰⁵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頁 7。

¹⁰⁶ 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文物季刊》，1999 年第 3 期，頁 52。

¹⁰⁷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8，1 版），頁 237。



【圖 5】唐代蒲津橋復原示意圖

出處：唐震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頁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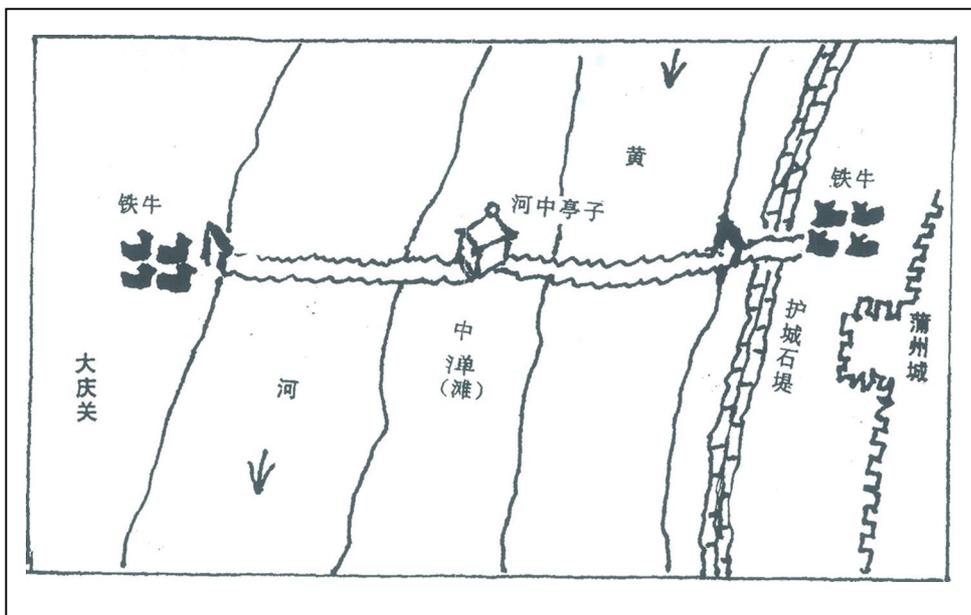
橋樑河岸邊建有護岸石堤，張說〈奉和聖製度蒲關應制〉：「樓映行宮日，堤含宮樹春」，¹⁰⁸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長堤春樹發」，¹⁰⁹徐安貞〈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城花春正發，岸柳曙堪攀」，¹¹⁰河岸、石堤一方面起到保護河道的作用；另一方面與蒲津關、

¹⁰⁸ 《全唐詩》（第 3 冊），卷 88，張說〈奉和聖製度蒲關應制〉，頁 964。

¹⁰⁹ 《全唐詩》（第 2 冊），卷 49，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頁 595。

¹¹⁰ 《全唐詩》（第 4 冊），卷 124，徐安貞〈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頁 1229。

橋形成大河兩岸系列防禦體。(圖 6)



【圖 6】唐代蒲津大浮橋示意圖

出處：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頁 7。

(二) 汾水關、陰地關

汾水關位置據《通典·州郡》記載「汾州靈石縣東南有汾水關」，¹¹¹可知唐代汾水關在汾州靈石縣。張祜〈過汾水關〉：「千里南來背日行，關門無事一侯嬴。山根百尺路前去，十(半)夜耳中汾水聲」，¹¹²「南行」說明汾水關控制晉州、汾州南北向交通。關城又與侯嬴連結，侯嬴是戰國時魏國人，曾受信陵君重用，於魏安釐王二十年

¹¹¹ 《通典》，卷 179，〈州郡·古冀州·西河郡汾州·靈石縣〉，頁 4736。

¹¹² 《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1，張祜〈過汾水關〉，頁 5849。

(257B.C.) 秦將白起圍攻趙國都城邯鄲時，獻計竊虎符，奪魏將晉鄙兵權，成功解圍趙國。¹¹³「半夜耳中汾水聲」意味此關因近汾水，關名由此而來。

陰地關位置依《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又有長寧關」，¹¹⁴可知靈石縣東南與西南分別有汾水關與陰地關。

《舊唐書·僖宗本紀》光啟元年(885)十月「李克用率太原軍南出陰地關」，¹¹⁵軍隊從太原南行經汾州陰地關，此關控制南北向交通。雍陶〈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漢家公主昔和蕃，石上今餘手跡存。風雨幾年侵不滅，分明纖指印苔痕」，¹¹⁶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跡〉：「一拓(掬)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¹¹⁷陰地關能見到入蕃和親公主的手書，此關道亦是北入蕃路徑。

漢高祖開啟和親匈奴，換取邊境安定的作法，唐代繼之。《新唐書·回鶻傳》：「乾元元年，……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¹¹⁸肅宗乾元元年(758)，皇帝以小女兒寧國公主下嫁回鶻。《新唐書·叛臣·僕固懷恩傳》：「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為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¹¹⁹可敦是外族女性的頭銜，回鶻的毗伽闕可汗除娶皇帝女兒之外，同時小兒子即後來的登里可汗亦娶懷恩女兒。《新唐書·回鶻傳》：「大曆三

¹¹³ 《史記》，卷 77，〈魏公子列傳〉，頁 2377-2381。

¹¹⁴ 《新唐書》，卷 39，〈地理志·河東道·汾州西河郡·靈石縣〉，頁 1004。

¹¹⁵ 《舊唐書》，卷 19，〈僖宗本紀〉，頁 722。

¹¹⁶ 《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8，雍陶〈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頁 592 6。

¹¹⁷ 《全唐詩》(第 19 冊)，卷 643，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跡〉，頁 7368。

¹¹⁸ 《新唐書》，卷 217，〈回鶻傳〉，頁 6116。

¹¹⁹ 《新唐書》，卷 224，〈叛臣·僕固懷恩傳〉，頁 6367。

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賜繒綵二萬」，¹²⁰光親可敦即懷恩較大女兒於代宗大曆三年（768）去世，隔年（769）再以懷恩的幼女崇徽公主下嫁。此為崇徽公主行經關城時留下的手跡，又因此關臨汾水，水聲更增添惆悵感。

隋唐時代是中日兩國官方與民間僧侶來往頻繁的時期。日僧慈覺大師圓仁（794-864）於唐文宗開成三年（838）七月二十六日乘船抵達揚州，於揚州開元寺住半年多。繼續巡禮經楚州、海州，三個月左右至登州赤山法華院。在法華院住九個多月後，經歷登州、青州、貝州、趙州、鎮州，兩個多月後至佛教名山五臺山，五臺山瞻禮約五十天，於七月七日下午下山，經忻州、并州（太原府）、汾州、晉州、絳州、蒲州、同州，八月二十日至長安。¹²¹

唐代五臺山位於代州，圓仁於文宗開成五年（840）四月二十八日至五臺山，七月八日至忻州定襄縣，十三日至太原府，八月一日至汾州，二日經州內孝義縣，¹²²四日南行「傍汾河尋山谷行卅五里，到小水店李家斷中。齋後，傍汾河西南行十里，到靈石縣。過縣傍汾河

¹²⁰ 《新唐書》，卷 217，〈回鶻傳〉，頁 6120。《新唐書》，卷 224，〈叛臣·僕固懷恩傳〉，頁 6372。

¹²¹ 日·圓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著，周一良審閱，《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11，1版），〈前言〉，頁 1-6。又圓仁在長安學習與生活四年又十個月，占入唐時間一半左右。武宗會昌五年（845）五月十六日，從長安出發回國，經洛陽、鄭州、汴州、泗州、揚州、楚州、海州、密州，又到登州赤山，於宣宗大中元年（847）九月十八日返抵日本。圓仁於文宗開成三年（838）七月入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九月返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乃他用日記體寫下在唐十年的經歷，非逐日記錄，唯按日分則，計 595 則，文分四卷。

¹²²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三，頁 261-323。

南行廿里，到陰地關」，¹²³汾州靈石縣南 20 唐里有依汾河而置的陰地關。五曰「南行十里，到長寧驛汾水關。關司勘入。是河中府北界晉州汾西縣管內」，¹²⁴前引《通典》、《新唐書》皆載汾水關與陰地關位於汾州靈石縣，但從圓仁日記中可見由北至南的路線中，先經陰地關，再經汾水關，汾水關歸晉州汾西縣所管。前引《通典·州郡》記載汾水關位於汾州，圓仁遊記則記此關在晉州，汾水關位置疑似與不同時期政區變遷有關，或者陰地關在汾州與汾水關在晉州，兩關分處汾、晉兩州南、北端的州內邊界關。

三、洛陽太原道「關」

(一)關道

洛陽北至太原的路線是由都畿道河南府經懷州，入河東道澤州、潞州至太原府。具體路線由洛陽東北行渡黃河至河陽縣，北行經懷州河內縣，越太行山脊的天井關入澤州晉城縣，北行經高平縣入潞州上黨縣。潞州北通太原府分東、西兩道。東道由上黨縣經襄垣縣、鄉縣，西北行入太原府太谷縣至太原。西道由上黨縣西北行經沁縣（今縣）至太原。¹²⁵

(二)天井關、壺口關

《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澤州晉城縣記載：「南有天井關，一名太行關」，¹²⁶韋莊〈天井關〉：「太行山上雲深處」，¹²⁷《通典·州

¹²³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三，頁 324。

¹²⁴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三，頁 325。

¹²⁵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161-162。

¹²⁶ 《新唐書》，卷 39，〈地理志·河東道·澤州高平郡·晉城縣〉，頁 1008。

¹²⁷ 《全唐詩》（第 20 冊），卷 696，韋莊〈天井關〉，頁 8008。

郡》記載「澤州晉城縣有天井關，在縣南太行山上，關前有天井泉三所」，¹²⁸天井關名稱乃因關前有三處天井泉，又關位於澤州晉城縣南的太行山上，而有太行關之稱。許渾〈曉（晚）發天井關寄李師晦〉：「山在水滔滔」，¹²⁹天井關既位於太行山上且鄰近丹水，山、河、關共構形成的防禦體系，交通上隸屬東都與北都驛道上，層級為驛道中關。

《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潞州黎城縣記載：「東有壺口故關」，¹³⁰可知潞州黎城縣東本有壺口關，曾幾何時關城沒落而以故關稱之。韋莊〈壺關道中作〉：「處處兵戈路不通，卻從山北去江東。黃昏欲到壺關寨，匹馬寒嘶野草中」，¹³¹舊有壺關縣乃因縣有壺口關，故稱，¹³²壺口關亦稱壺關，可能與壺關縣有關，至少唐人有此用法。詩中提及藉由壺關道可由山北到江東，這山北疑指太行山，壺口關是太行山西側關隘，控制潞州東北循清漳水至儀州的路徑，層級推測仍屬驛道中關。

¹²⁸ 《通典》，卷 179，〈州郡·古冀州·高平郡澤州·晉城縣〉，頁 4730。

¹²⁹ 《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0，許渾〈曉（晚）發天井關寄李師晦〉，頁 6056。

¹³⁰ 《新唐書》，卷 39，〈地理志·河東道·潞州上黨郡·黎城縣〉，頁 1008。

¹³¹ 《全唐詩》（第 20 冊），卷 700，韋莊〈壺關道中作〉，頁 8044。

¹³² 《水經注疏》，卷 10，〈濁漳水〉，頁 919。

參、唐詩中長安東南、西南面關道

一、長安藍田武關道「關」

(一)藍田武關道

唐代藍田關位於長安東南方，沿此東南行經武關，藍田關與武關交通有重疊，是以張九齡〈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曉武經陳迹」，¹³³曉指曉關，秦漢時期稱曉關，唐時稱藍田關，「曉武」合稱說明此道設置兩關。藍田武關道是長安東南至荊州、襄州的捷徑，唐前期官私行旅多行走於斯，尤其是安史亂後，河北、淮河一帶為藩鎮所據，京師仰賴的東南物資透過水、陸方式往西北輸送，如《舊唐書·穆寧傳》肅宗上元二年(761)：「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¹³⁴白居易於穆宗長慶二年(822)七月，以中書舍人的身分至杭州，途經藍溪時寫下：「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¹³⁵由於黃河、渭水水運易受季節、氣候影響，相對不穩定，陸運藍田武關道，及其沿線漢水、丹水水運則扮演著補給都城重要角色，無怪乎德宗貞元二年(786)十二月，皇帝將此路定為「次路驛」，¹³⁶即從長安、商州、襄州、荊州的路線是僅次兩都間的「大路驛」。

¹³³ 《全唐詩》(第2冊)，卷49，張九齡〈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頁600。唐·張九齡著，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11，1版)，卷3，〈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頁268-270。

¹³⁴ 《舊唐書》，卷155，〈穆寧傳〉，頁4114。

¹³⁵ 《全唐詩》(第13冊)，卷431，白居易〈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赴杭州時作)〉，頁4754。唐·白居易著，顧學頤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0，1版)，卷8，〈閔適·古調詩五言·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頁148。

¹³⁶ 《唐會要校證》，卷61，〈館驛使〉，頁905：「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

驛」，為當時全國第二驛道。

王貞白〈商山〉：「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¹³⁷齊己〈過商山〉：「前程有名利，此路莫艱難」，¹³⁸商山是次路驛通往秦嶺段的別稱，另稱「商洛山」，¹³⁹故韓偓、白居易等人詩題中屢稱此道為「商山道」、「商山路」。¹⁴⁰此道名稱除以兩關命名、皇帝定名或者山勢地貌之外，尚有「名利路」一詞，此因江南名士至京城謀取功名利祿，看中此道的近捷，有時因路程關係，即使夜半，路難行，依舊不減人民求取名利之心。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頂〉詩精闢描述商山名利路：

高高此山頂，四望唯烟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¹⁴¹

商山路聯絡著戰國時秦、楚兩國，故杜甫〈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第二篇：「楚塞難為路（別），藍田莫滯留」，¹⁴²莫在

¹³⁷ 《全唐詩》，卷 701，王貞白〈商山〉，頁 8061。

¹³⁸ 《全唐詩》，卷 840，齊己〈過商山〉，頁 9480。

¹³⁹ 李孝聰以為這段秦嶺又名「商山」、「商洛山」。詳參氏著，《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0，1版），頁 246。

¹⁴⁰ 唐詩中稱「商山道」者，如《全唐詩》（第 17 冊），卷 550，趙嘏〈商山道中（度商山晚靜（淨））〉，頁 6369。《全唐詩》（第 19 冊），卷 638，張喬〈商山道中〉，頁 7322。《全唐詩》（第 20 冊），卷 682，韓偓〈商山道中〉，頁 7826-7827。《全唐詩》（第 23 冊），卷 836，貫休〈商山道者〉，頁 9419。稱「商山路」者，如《全唐詩》（第 9 冊），卷 293，司空曙〈望商山路〉，頁 3338。《全唐詩》（第 11 冊），卷 351，柳宗元〈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椽，遂其生植感而賦詩〉，頁 3934。《全唐詩》（第 13 冊），卷 441，白居易〈商山路有感〉，頁 4926-4927。《全唐詩》（第 13 冊），卷 441，白居易〈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頁 4927。《全唐詩》（第 13 冊），卷 443，白居易〈商山路有感并序〉，頁 4949。

¹⁴¹ 《白居易集》，卷 8，〈閑適·古調詩五言·登商山最高頂〉，頁 152-153。

¹⁴² 《全唐詩》（第 7 冊），卷 231，杜甫〈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頁 2

藍田停留，以免影響前往楚地。

杜牧〈題武關〉：「鄭袖嬌嬈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¹⁴³道出昔日楚懷王入武關，遇秦國伏兵而客死異地，因對於寵姬「鄭袖」的「酣似醉」，導致疏離「屈原」。此路前方有「名誘心」、「利牽身」，來往者何其多。朝中官員的就任、貶謫數度由此經過，是以白居易有「七年三往復」之語。相對於此道名為藍田武關道，充滿著軍事、政治意味，¹⁴⁴名利路反映的是經濟與文化色彩。商山路雖因穿越秦嶺商山段而旅途艱辛，但仍通往京師之近捷，成為人民來往京師重要選擇。此道路線由長安東南行經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至商州治所上洛縣（今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東南行經商洛縣、武關至鄧州內鄉縣（今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沿湍水至新城縣（今河南省南陽市內鄉縣）、治所穰縣（今河南省南陽市鄧州市），南行至襄州安養縣（今湖北省襄陽市），南渡漢水至治所襄陽縣。¹⁴⁵（圖 7）

540-2541。

¹⁴³ 《全唐詩》（第 16 冊），卷 523，杜牧〈題武關〉，頁 5978-5979。

¹⁴⁴ 如北宋·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1 版），卷 220，〈唐紀〉，頁 7037 肅宗至德二載（A.D.757）十月記載：「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時王難得領興平軍。」

¹⁴⁵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9，初版），頁 638-660。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 191-196。李之勤，〈唐代藍武道上的七盤嶺與韓公堆〉，收錄氏著，《西北史地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2，1 版），頁 126-133。



【圖 7】藍田關遷徙位置與路線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52-53 改繪。

(二)藍田關

唐代藍田關層級屬上關，¹⁴⁶位於京兆府藍田縣東南，¹⁴⁷即秦、漢時期的嶢關。¹⁴⁸藍田縣東 28 唐里有藍田山（玉山、覆車山），¹⁴⁹山北有倒虎山（玄象山），¹⁵⁰縣東南 25 唐里處有箕山，¹⁵¹可見藍田縣東、東北、東南群山環繞，關地處群山之中，是以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第一首詩逕稱「嶢關險路」。¹⁵²

藍田關氣候多變化，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陽）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¹⁵³韓湘是韓愈姪兒十二郎的兒子，於穆宗長慶三年（823）進士及第，對比不久前的韓愈則因諫佛骨而遭貶至嶺南道的潮州，從位居「九重天」的京師，朝夕被貶至距離「路八千」的潮州，途經藍田武關道，南望秦嶺而有「雲橫秦嶺家何在」感觸，雲朵飄於山中增添傷感之外，「雪擁藍關馬不前」一方面藍田關簡稱藍關；另一方面雪

¹⁴⁶ 《唐六典》，卷 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 195-196。

¹⁴⁷ 史籍記載藍田關位於藍田縣有「東南」與「南」兩種說法。「東南」說依《史記》，卷 54，〈曹相國世家〉，頁 2023 張守節引《括地志》。「南」說依《元和郡縣圖志》，卷 1，〈關內道·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頁 16。案：《括地志》與《元和郡縣圖志》分別代表兩部唐前、後期的史籍，由此可知唐前期藍田關在縣東南，後期關在縣南，關城有過變遷。

¹⁴⁸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京兆府京兆郡·藍田縣〉，頁 963。

¹⁴⁹ 《元和郡縣圖志》，卷 1，〈關內道·京兆府·藍田縣·藍田山〉，頁 16。

¹⁵⁰ 《太平寰宇記》，卷 26，〈關西道·雍州·藍田縣·倒虎山〉，頁 556：「倒虎山，一名玄象山，在覆車山北。」

¹⁵¹ 《元和郡縣圖志》，卷 1，〈關內道·京兆府·藍田縣·箕山〉，頁 16。

¹⁵² 《全唐詩》（第 7 冊），卷 231，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頁 2541。

¹⁵³ 《全唐詩》（第 10 冊），卷 344，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頁 3859-3860。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1 版），〈詩集〉卷 11，〈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頁 98。

景飄落關城，積雪使得騎馬受阻，想見季節在嚴冬，外在環境與內心憂愁，表露韓愈此刻心境，對於姪孫輩的韓湘正進士及第，未來可能入關為朝，可說是鮮明對比。

杜荀鶴〈辭鄭員外入關〉：「馬度藍關雨雪多」，¹⁵⁴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第二首詩：「馬度（瘦）秦關（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¹⁵⁵藍關氣候嚴寒，多雪之外，雨多亦是特色。陸暢〈出藍田關寄董使君〉：「雲迎水送度藍關」，¹⁵⁶「水送」指臨近藍田關的藍溪，宋之問〈藍田山莊〉：「藍水暮澆田」，¹⁵⁷可知藍溪亦稱藍水。白居易於穆宗長慶二年（822）七月，以中書舍人職稱前往杭州，途經藍溪時寫下：「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策馬度藍溪，勝遊從此始」，¹⁵⁸藍田武關道作為春秋戰國時秦國通往楚國、越國要道，號稱「五千里（唐里）」路程，其中一段是騎馬沿藍溪過藍田關。又〈宿藍溪對月（宿藍橋題月）〉：「昨夜鳳池頭，今夜藍溪（溪橋）口」，¹⁵⁹可見橫越藍溪的橋樑稱為藍橋。

（三）武關

唐代武關據張守節《正義》與《括地志》記載，位於商州治所上洛縣東 180 里，商洛縣東 90 里，隸屬於商洛縣（今陝西省商洛市丹

¹⁵⁴ 《全唐詩》（第 20 冊），卷 692，杜荀鶴〈辭鄭員外入關〉，頁 7972。

¹⁵⁵ 《全唐詩》（第 7 冊），卷 231，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頁 2541。

¹⁵⁶ 《全唐詩》（第 14 冊），卷 478，陸暢〈出藍田關寄董使君〉，頁 5443。

¹⁵⁷ 《全唐詩》（第 2 冊），卷 52，宋之問〈藍田山莊〉，頁 635。

¹⁵⁸ 《全唐詩》（第 13 冊），卷 431，白居易〈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赴杭州時作）〉，頁 4754。

¹⁵⁹ 《全唐詩》（第 13 冊），卷 431，白居易〈宿藍溪對月（宿藍橋題月）〉，頁 4755。

鳳縣)，¹⁶⁰實則關位於上洛、商洛兩縣東南，居丹水北岸今武關河處。武關南側的丹水，水聲時而被詩人引入，李涉〈再宿武關〉：「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潺潺）送客愁」，¹⁶¹由關中所在的「秦城」東南越秦嶺段商山（亂山）至商州，夜宿武關，聽著一夜河畔的潺潺丹水聲，更添鄉愁。雍陶〈春行武關作〉：「風香春暖展歸程，全勝遊仙入洞情。一路緣溪花覆水，不妨閒看不妨行」，¹⁶²藍田武關道自藍田關以東，交通乃沿著源自秦嶺商山段的丹水而行，故詩中稱「一路緣溪」。（圖 8）

藍田武關道是唐代都城往東南向道路，素有次路驛之稱。一方面東南士人求取功名時，以其便捷取道於斯，使道路有名利路之稱；另一方面在朝為官者，不得勢遭貶亦時而取徑而此。李涉〈題武關〉：「來往悲歡萬里心，多從此路計浮沈」，¹⁶³得勢與否，人生「浮沉」與「悲歡」充斥此道。吳融〈武關〉亦云：「時來時去若循環」，¹⁶⁴武關在人來人去循環過程中，背後訴說人生顯耀與沒落的百態。韓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¹⁶⁵韓愈因諫憲宗迎佛骨，遭貶至潮州，途經武關時遇一流放至吐蕃的囚犯而寫下此詩，詩中道出自己亦是「罪重」，歸返京師希望渺茫，與

¹⁶⁰ 《史記》，卷 40，〈楚世家〉，頁 1726《正義》。《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248《正義》引《括地志》。《史記》，卷 54，〈曹相國世家〉，頁 2023《正義》引《括地志》。《史記》，卷 118，〈淮南衡山列傳〉，頁 3091《正義》。《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商州上洛郡·商洛縣〉，頁 966：「東有武關。」

¹⁶¹ 《全唐詩》（第 14 冊），卷 477，李涉〈再宿武關（從秦城回再題武關）〉，頁 5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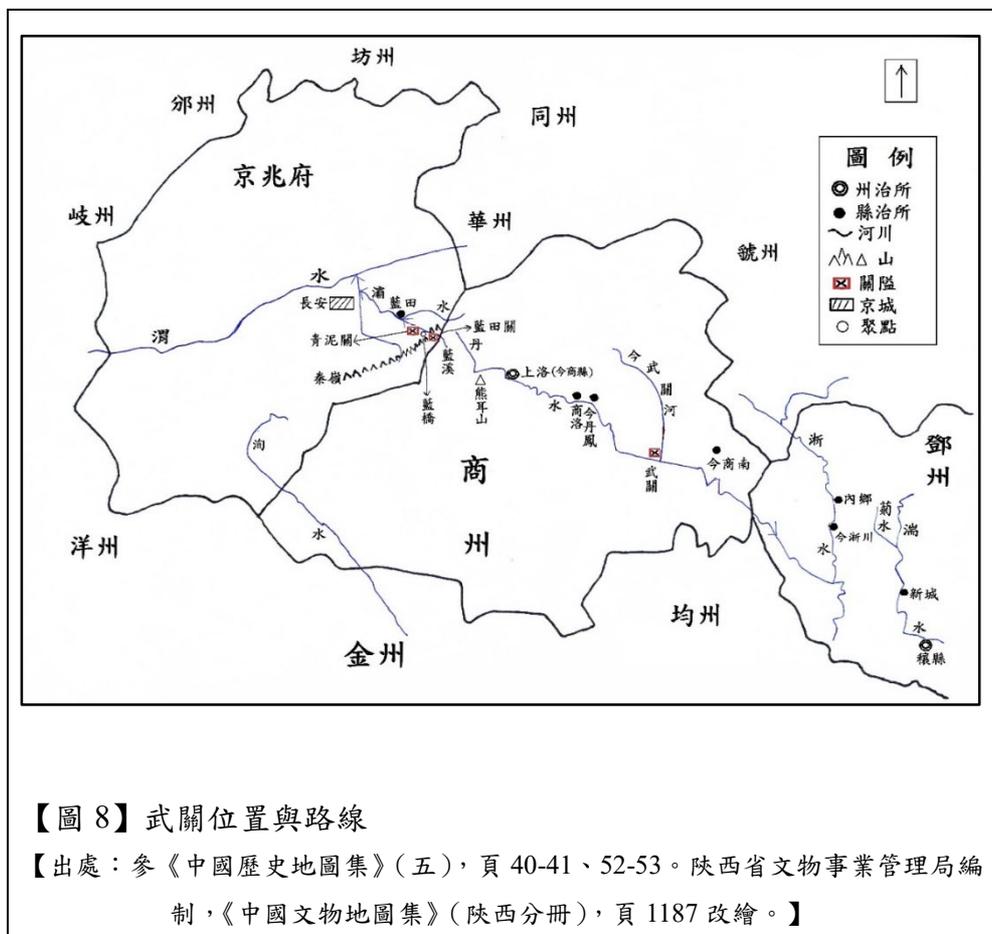
¹⁶² 《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8，雍陶〈春行武關作〉，頁 5920。

¹⁶³ 《全唐詩》（第 14 冊），卷 477，李涉〈題武關〉，頁 5430。

¹⁶⁴ 《全唐詩》（第 20 冊），卷 686，吳融〈武關〉，頁 7882。

¹⁶⁵ 《全唐詩》（第 10 冊），卷 344，韓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謫潮州時途中作）〉，頁 3860。

囚犯被判流刑，發配至吐蕃情況相仿。



《唐六典》雖然記載唐朝天下關有 26 座關，藍田關屬上關，武關卻未見列入任一層級，這說明史籍 26 數字並非代表整個唐朝關隘的總數，頂多只能反應玄宗開元時期關防數。藍田關與武關皆設置於藍田武關驛道上，作為唐代長安通往東南州縣的重要幹道，是以唐後期屢屢有因道路損壞而有整治、拓寬之舉，意味此道的重要性，

居其驛道上且位於京城東南方位的武關，疑似與藍田關同屬上關層級。

藍田關與武關雖然皆處於長安東南方，但以藍田關較近京城，武關偏遠，這離都城一近一遠的兩關，扼守關中東南面的地域，層層防衛更增添此道險峻。或許是因藍田關離長安較近，重要性較武關倍增，史籍僅列藍田關為代表上關，對於同層級同驛道的武關則省略。

二、長安秦嶺谷道「關」

(一)駱谷關

1. 關的位置、變遷

唐代駱谷關位於雍州(鳳翔府)整屋縣(今陝西省西安市周至縣)西南，¹⁶⁶但在縣的西南里數則有 20 唐里與 120 唐里兩說。張守節引《括地志》：「駱谷閒在雍州之整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¹⁶⁷《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京兆府整屋縣：「駱谷關，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北九里，貞觀四年移於今所」，¹⁶⁸嚴耕望、劉樹友考證西南 120 里是漢魏時期的駱谷關關址。¹⁶⁹又《隋書·地理志》京兆郡整屋縣下有「關官」之置，

¹⁶⁶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整屋縣〉，頁 967。

¹⁶⁷ 《史記》，卷 104，〈田叔列傳〉，頁 2779。

¹⁶⁸ 《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京兆府·整屋縣·駱谷關〉，頁 32。

¹⁶⁹ 劉樹友，〈秦嶺諸關考——關中要塞研究之四〉，《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4 期，頁 25。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頁 690。

¹⁷⁰可見駱谷關在隋代早已有之，李之勤也說關最晚設置在隋代，¹⁷¹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當為復置，駱谷關在唐朝建立之初重置，某種程度反應此關道的價值。¹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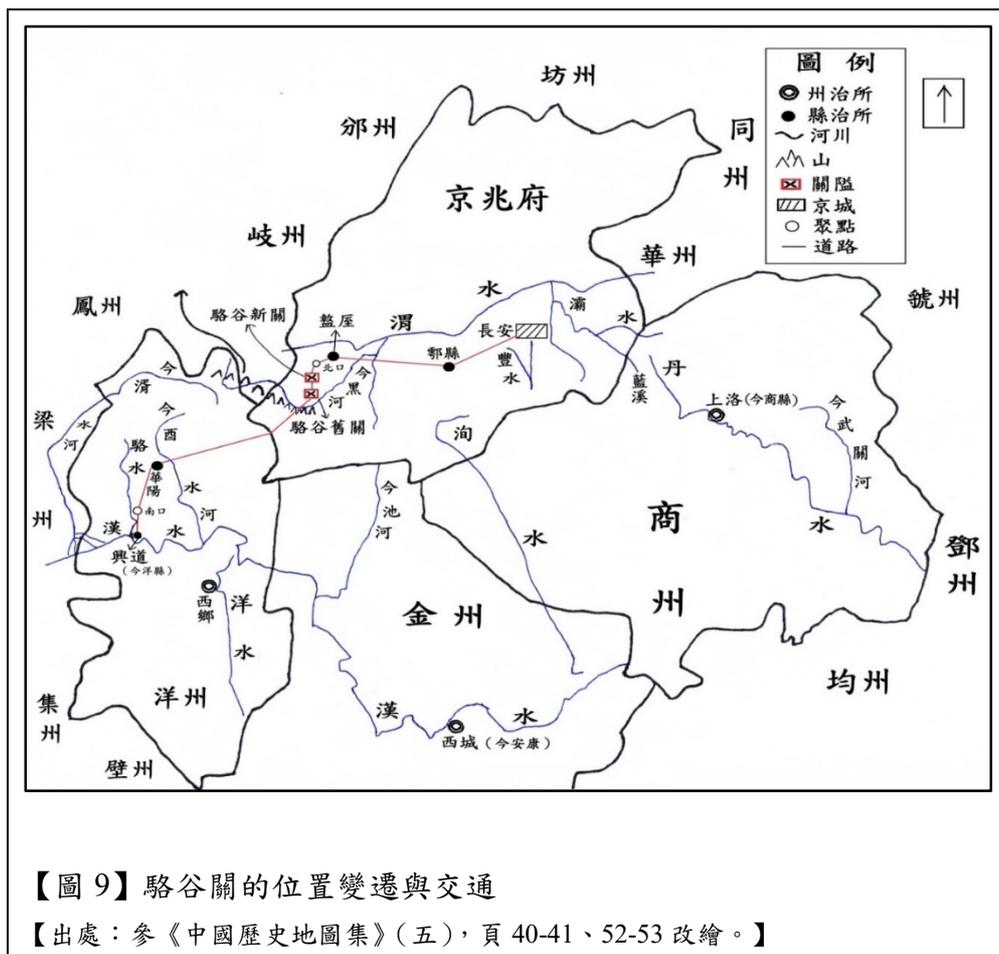
唐代駱谷關因涉及變遷而有新、舊關之別。前引《元和郡縣圖志》京兆府盩厔縣駱谷關：「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北九里，貞觀四年移於今所。」「今關」是指位於盩厔縣西南 120 唐里處的駱谷舊關，高祖武德七年（624）設置的駱谷關是新關，位於舊關北 9 唐里。不過，新關如曇花般，於太宗貞觀四年（630）再次南移 9 唐里回到盩厔縣西南 120 唐里（今 55-65 公里）舊關處。¹⁷³換言之，駱谷關有新、舊之分，新關在舊關北 9 唐里，存在時間始於高祖武德七年至太宗貞觀四年，唐朝仍以盩厔縣西南 120 唐里的駱谷舊關為主。（圖 9）

¹⁷⁰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8，1版），卷 29，〈地理志·京兆郡·盩厔縣〉，頁 808。

¹⁷¹ 李之勤，〈《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省漢中府「儻駱道」條校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 年第 1 輯，頁 236。

¹⁷² 徐志斌，〈論唐代儻駱道的特點與價值〉，《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3 期，頁 18。

¹⁷³ 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7，1版），頁 243。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收錄氏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7，1版），頁 158。



【圖 9】駱谷關的位置變遷與交通

【出處：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52-53 改繪。】

2. 關道與關層級

駱谷關所扼交通是由谷道形成的。《元和郡縣圖志》山南道洋州興道縣：「按駱谷在長安西南，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¹⁷⁴《新唐書》洋州興道縣：「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¹⁷⁵ 整

¹⁷⁴ 《元和郡縣圖志》，卷 22，〈山南道·洋州·興道縣·駱谷路〉，頁 562。

¹⁷⁵ 《新唐書》，卷 40，〈地理志·山南道·洋州洋川郡·興道縣〉，頁 1034。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3，

屋縣西南的駱谷北口稱駱或駱谷，洋州興道縣的南口稱儻或儻谷，連接南、北口道路稱為駱谷道、儻谷道、儻駱道，駱谷關因置於北口駱谷而得名。北口的駱水河谷，以及南口的儻水河谷並非直接相通的谷道，而是經過西駱谷水、黑水、潯水、酉水、儻水等五條水的河谷，組成一條迂迴曲折的山谷道路。¹⁷⁶路線是由長安西南行至京兆府鄠縣（今陝西省西安市盧縣），西行至盩厔縣，南行入駱谷北口，經駱谷關至洋州華陽縣（今陝西省漢中市洋縣），西南行至駱谷南口，南行至治所興道縣。¹⁷⁷

駱谷道由五條河谷形成山谷道路，道路崎嶇之外，沿途亦多危險。《資治通鑑》記載德宗貞元三年（787），皇帝自駱谷道至梁州，途中遇大雨，道路濕滑，衛士多叛亡。¹⁷⁸《元和郡縣圖志》洋州興道縣：「谷中多反鼻蛇，青攢蛇一名焦尾蛇，常登竹木上，能十數步子黃人。人中此蛇者，即須斷肌去毒，不然立死。」¹⁷⁹此道多毒蛇。李紳〈南梁行〉自注：「駱谷中多毒樹，名山琵琶。其花明豔，與杜鵑花同。樵者識之，言曰，早花殺人。」¹⁸⁰名為山琵琶的樹，本身有毒能殺人。

岑參〈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五馬當路嘶，按節投蜀都。千崖（巖）信縈折，一徑何盤紆。層冰滑征輪，密竹礙隼旗。深林迷昏旦，

1 版），卷 56，〈陝西·漢中府·儻駱道〉，頁 2668：「南口曰儻，……北口曰駱。」

¹⁷⁶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 177。

¹⁷⁷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頁 689-695。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 177-180。

¹⁷⁸ 《資治通鑑》，卷 232，〈唐紀〉，頁 7491 德宗貞元三年（787）。

¹⁷⁹ 《元和郡縣圖志》，卷 22，〈山南道·洋州·興道縣·駱谷路〉，頁 562。

¹⁸⁰ 《全唐詩》，卷 480，李紳〈南梁行〉，頁 5459。

棧道凌空虛。……峰攢望天小」，¹⁸¹道中曲折、懸崖、茂密竹林，冬天時層冰，駱谷關興建於此，更增添險要。《丹淵集》描述駱谷「高峯偃蹇雲崔嵬，層崖巨壑長峽開。龍蛇縱橫虎豹亂，古棧巧裂埋深苔。行人側足恐懼過，飛鳥斂翅哀鳴回。」¹⁸²「高峯」、「層崖」，龍蛇、虎豹肆虐，棧道裂開，深苔暗藏於內。德宗時有詔令佈達於洋州等百姓，「絕礪縈迴，危棧綿互。時經霖雨，道阻且長。」¹⁸³總之，此道山高谷深，棧道險要，不僅動、植物多毒，且經常連綿大雨，致使道路受阻而隊伍拉長。

駱谷道在唐代使用頻率以後期較盛。代宗寶應元年（762）九月下詔，往來於駱谷、金牛、子午道路者，除官員、進奉朝廷者外，從今以後，隨身器仗必須在過所上載明種類、名目，才准予通行，否則一律扣留。¹⁸⁴《舊唐書·來瑱傳》：「寶應二年正月，貶播州縣尉員外置。翌日，賜死於鄆縣，籍沒其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于坎中。」¹⁸⁵寶應二年（763）一月，來瑱被貶，隔日即被賜死於京兆府鄆縣，一方面鄆縣是駱谷道所經地之一；另一方面想見此道亦是貶官，押解罪犯的驛道。杜甫〈三絕句〉第二首：「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鬻臂時，回頭卻向秦雲哭」，¹⁸⁶杜甫等逃難入蜀，回時經駱谷僅剩一人，此詩書寫於代宗永泰元年（765）。¹⁸⁷

¹⁸¹ 《全唐詩》（第6冊），卷198，岑參〈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頁2031。《岑嘉州詩箋注》，卷1，〈五言古詩·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頁114-119。

¹⁸² 北宋·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正編4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臺1版），卷13，〈駱谷〉，頁2。

¹⁸³ 《全唐文》，卷463，陸贄〈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頁4727-2。

¹⁸⁴ 《唐會要校證》，卷86，〈關市〉，頁1352。

¹⁸⁵ 《舊唐書》，卷114，〈來瑱傳〉，頁3368。

¹⁸⁶ 《全唐詩》（第7冊），卷229，杜甫〈三絕句〉，頁2490。

¹⁸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10，1版），卷14，〈三絕句·其二〉，頁1240-1242。

翌年(766),皇帝下詔宰相杜鴻漸往劍南平崔寧亂事,杜氏「出駱谷」至劍南,¹⁸⁸並由駱谷回程,「過鄠,廚驛豐給」,¹⁸⁹顯見驛道沿途有廚房提供食物供給官員。

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發生涇原兵變,涇原兵等擁立朱泚(時任幽州隴右節度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亦附之,攻陷長安,皇帝逃於京城西北京兆府奉天縣(今陝西省咸陽市乾縣),朱泚等續犯奉天縣。¹⁹⁰當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河北率軍至咸陽,奏請與李晟軍隊結合,終究懷光有二心,興元元年(784)二月反,德宗緊急逃離,「車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¹⁹¹德宗由駱谷道經洋州興道縣、城固縣至梁州,由於事發突然,加上駱谷道艱險,驛廚無法補給食物給隨行官員。《讀史方輿紀要》記載:「關中多故,朝廷每繇駱谷而南,以其道之近且便也。」¹⁹²可見駱谷道是京城西南經洋州至南鄭(梁州治所)的捷徑,否則德宗不會將此道視為避難的首選路線。

憲宗元和元年(806)春正月,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叛,高崇文(時任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奉命由斜谷路,李元奕(時任左右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由駱谷路,與嚴礪(時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康(時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匯集於劍南道北部劍州梓潼縣(今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¹⁹³共同討伐劉闢。元和四年(809),元稹以監察御史的身分,奉命出使東蜀,彈劾並上奏曾任職於劍南東川節度使的嚴礪,由

¹⁸⁸ 《新唐書》，卷 144，〈崔寧傳〉，頁 4705。

¹⁸⁹ 《新唐書》，卷 132，〈劉子彙傳〉，頁 4524。

¹⁹⁰ 《新唐書》，卷 7，〈德宗紀〉，頁 189-190。

¹⁹¹ 《舊唐書》，卷 133，〈李晟傳〉，頁 3664-3665。

¹⁹² 《讀史方輿紀要》，卷 56，〈陝西·漢中府·儻駱道〉，頁 2669。

¹⁹³ 《舊唐書》，卷 14，〈憲宗紀〉，頁 414-415。《讀史方輿紀要》，卷 56，〈陝西·漢中府·儻駱道〉，頁 2669。

於劾奏時，嚴礪業已去逝，轄下七州刺史皆受責罰。不過，元稹卻也得罪嚴礪同黨。¹⁹⁴關於此次元稹至四川查辦案件，王開以為是由駱谷道至東川節度使轄治梓州展開調查，回程亦由原路。¹⁹⁵元和五年（810），元稹又舉劾河南尹房式，並擅自將其停權，朝廷反對，罰元稹一季薪俸，召回長安，途經華州華陰縣（今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市）西敷水驛，遭人擊傷顏面，朝廷卻以元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以及舉劾房式為過，最終被貶至山南西道通州（今四川省達州市）司馬。¹⁹⁶通州在洋州南方，元稹赴任路線仍是行駱谷道至洋州後再南行。

文宗大和九年（835），李訓（時任禮部侍郎）政變失敗，單騎入終南山區，投靠寺廟僧侶宗密，宗密與訓甚為友好，欲幫其剃髮藏匿，宗密徒弟以為不可。李訓不得已，欲往鳳翔，投靠鄭注（時任鳳翔節度使），才剛出終南山，即被盩厔縣鎮將宗楚所擒，押送京師，途中說服士兵將其殺死。¹⁹⁷李訓出入終南山，終被盩厔縣鎮將所擒，路線上欲出終南山後北行駱谷道，由盩厔縣西行至鳳翔。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入關中，田令孜（時任左軍中尉）帥神策兵五百，護送皇帝自長安西面第二門金光門離開，由駱谷道南行經洋州興道縣至梁州（興元府）南鄭，若敵軍勢力猶盛，則至成都。¹⁹⁸

¹⁹⁴ 《舊唐書》，卷 166，〈元稹傳〉，頁 4331。

¹⁹⁵ 王開，《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 179。

¹⁹⁶ 《新唐書》，卷 174，〈元稹傳〉，頁 5227-5228。《資治通鑑》，卷 238，〈唐紀〉，頁 7671 憲宗元和五年（810）。

¹⁹⁷ 《舊唐書》，卷 169，〈李訓傳〉，頁 4398。《資治通鑑》，卷 245，〈唐紀〉，頁 7915-7916 文宗太和九年（835）。

¹⁹⁸ 《資治通鑑》，卷 254，〈唐紀〉，頁 8239-8241 僖宗廣明元年（880）。《舊唐書》，卷 19，〈僖宗紀〉，頁 709。

駱谷道雖然艱險，但畢竟是京城通至漢中、四川的捷徑之一，¹⁹⁹又《唐六典》將駱谷關記為中關，²⁰⁰或許是因玄宗開元時未置驛，此時屬四面中關，但從上述代宗、德宗、憲宗、文宗屢見利用駱谷道的史實，可知唐後期對此關道使用頻率甚繁，至少可以說安史亂後，駱谷關層級已屬上關。

(二)散關、百牢關、斜谷關

1.散關名稱、位置

散關名稱與大散嶺、散谷水有關。《讀史方輿紀要》陝西散關係記載：「有大散嶺，置關嶺上，亦曰大散關，為秦、蜀之噤喉。」²⁰¹散關因設置於大散嶺上，又稱大散關，大散嶺是秦嶺山脈在此段的專稱，此地有「秦嶺」石碑可證。²⁰²李賢等注：「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²⁰³又《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

¹⁹⁹ 「儻駱道是由關中至漢中最近的同時也是通行條件最惡劣的一條古道。」「儻駱道的地理環境極為惡劣，其間山高谷深，道路蜿蜒起伏於人煙稀少、野獸毒蟲出沒的原始森林中間，路途異常艱險。」詳參雷震，〈歷史時期的儻駱道及其作用〉，《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頁40-41。「駱谷道的艱險陡峭超過褒斜、子午二道，但它有捷近的優點。」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176。「駱谷道以特別近捷和艱險著稱。」李之勤，〈儻駱古道的發展特點、具體走向和沿途要地〉，《文博》，1995年第2期，頁44。「儻駱道的里程，從長安至漢中，誠較褒斜、子午、故道等為近，但便則未必。」李之勤，〈《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省漢中府「儻駱道」條校釋〉，頁236。「若以山道長度來算，則儻駱道最短，具有長度短的優勢。」「若就道路平坦度而言，唐代儻駱道地形上的特點是路途險阻，並不平坦，其安全程度不比它道為好。」徐志斌，〈論唐代儻駱道的特點與價值〉，頁18。

²⁰⁰ 《唐六典》，卷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195-196。

²⁰¹ 《讀史方輿紀要》，卷52，〈陝西·散關〉，頁2497。穆渭生語「崖壁聳立」的大散嶺上。詳參氏著，〈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頁262-263。

²⁰² 劉樹友，〈秦嶺諸關考——關中要塞研究之四〉，頁23-24。

²⁰³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5，1版），卷14，〈順陽懷侯

鳳翔府寶雞縣：「陳倉山，在縣南十里」，²⁰⁴寶雞縣乃依序經由陳倉縣、鳳翔縣改名而來，²⁰⁵陳倉縣南 10 唐里處不僅有陳倉山，且有散谷水流經的舊散關，可見散關（大散關）名稱源自山、水。

李賢等注舊散關在唐代陳倉縣南 10 唐里，有散谷水流經，可見散關位置不只一處，李仲操認為散關在漢、北魏與唐三朝代位置皆不同，但關址皆沿散谷水而變遷，依序在下游、中游、上游。²⁰⁶散谷水南源自秦嶺段的大散嶺，經散關後自南向北匯入渭水。史載唐代散關位置有二，張守節引《括地志》：「散關在岐州陳倉縣南五十里。」²⁰⁷《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鳳翔府寶雞縣（今陝西省寶雞市陳倉區）記載：「散關，在縣西南五十二里」，²⁰⁸一說關在縣南 50 唐里，另說在縣西南 52 唐里，據陳夢家、馬正林、劉樹友考辨，譚其驥地圖的標示，²⁰⁹唐散關實在寶雞縣

西南 52 唐里（小程約 23.6288 公里；大程約 28.366 公里，今約 23.6-28.4 公里）的大散嶺上，居散谷水上游。（圖 10）

嘉傳》，頁 568。

²⁰⁴ 《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鳳翔府·寶雞縣·陳倉山〉，頁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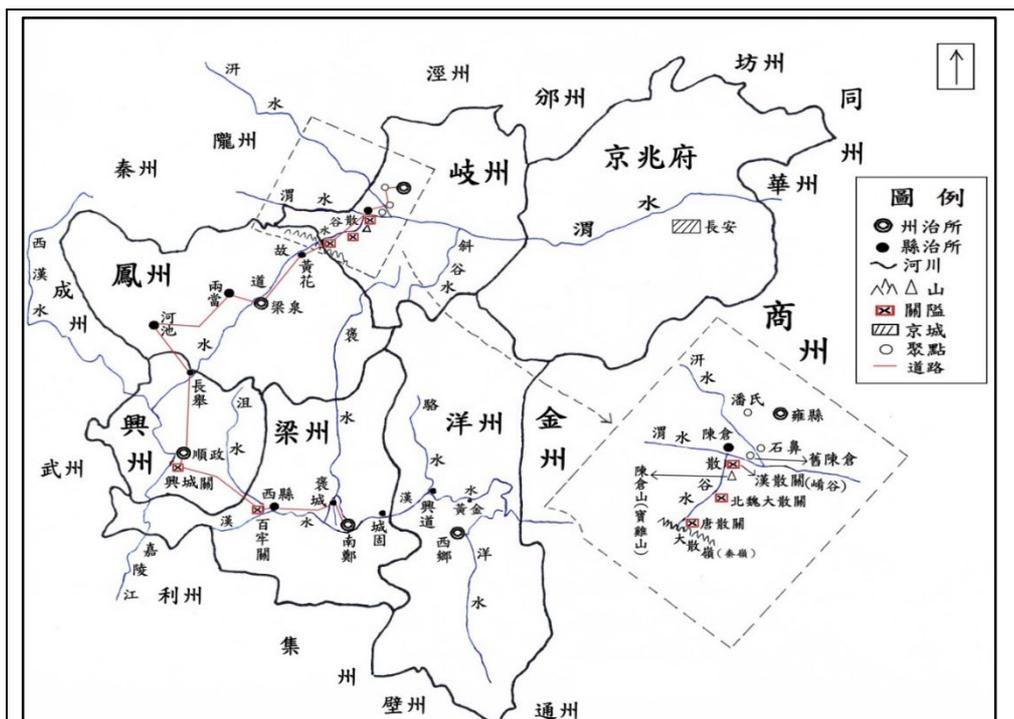
²⁰⁵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寶雞縣〉，頁 967

²⁰⁶ 李仲操，〈歷代散關遺址小考〉，《人文雜誌》，1985 年第 6 期，頁 74。

²⁰⁷ 《史記》，卷 63，〈老子傳〉，頁 2141。

²⁰⁸ 《元和郡縣圖志》，卷 2，〈關內道·鳳翔府·寶雞縣·散關〉，頁 43。

²⁰⁹ 陳夢家，〈畝制與里制〉，《考古》，1966 年第 1 期，頁 41。馬正林，〈關於古散關遺址〉，《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1 期，頁 105。劉樹友，〈秦嶺諸關考——關中要塞研究之四〉，頁 24。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五）（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10，1 版），頁 40-41。



【圖 10】散關遷徙位置與路線

出處：依參《中國歷史地圖集》(五)，頁 40-41、52-53 改繪。

散關氣候依羅鄴〈大散嶺〉：「過往長逢日色稀，雪花如掌撲行衣。嶺頭卻望人來處，特地身疑是鳥飛」，²¹⁰山高天寒、雪花撲衣、鳥飛嶺頭隱喻大散嶺高聳與登爬艱險。李商隱〈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²¹¹李商隱妻王氏於宣宗大中五年（851）驟逝，同年冬天，李商隱應

²¹⁰ 《全唐詩》（第 19 冊），卷 654，羅鄴〈大散嶺〉，頁 7523。

²¹¹ 《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9，李商隱〈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頁 6148。唐·李商隱著，葉葱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臺北：里仁書局，198

東川節度使柳仲郢之邀，「從軍」至節度使擔任官職，想到赴蜀路途，以及甫喪妻之痛，既無家人為他寄送衣服，困於散關的三尺雪，夢境中見到妻子坐在舊鴛機上為其縫製衣服的场景，對比現在的自己，道盡無限哀傷，而積雪三尺反映散關多雪，更增添行者路途的艱險。

2. 散關道—兼論百牢關、斜谷關

散關道起自鳳翔府（岐州、扶風郡，今陝西省寶雞市）至興元府（梁州、漢中郡，今陝西省漢中市）。細言之，岐州治所雍縣（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西南行至陳倉縣，西南渡渭水至散關（上關），略循故道水，越秦嶺至鳳州黃花縣（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縣），西南行至治所梁泉縣（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縣），西行至兩當縣（今甘肅省隴南市兩當縣），西南行至河池縣（今甘肅省隴南市徽縣），東南行至興州長舉縣（今陝西省漢中市略陽縣），南行至治所順政縣（今陝西省漢中市略陽縣），南行至興城關（中關），東南行至梁州百牢關（下關），東北行至西縣（今陝西省漢中市勉縣），東行至褒城縣（今陝西省漢中市南鄭縣），東渡褒水，循漢水北岸至治所南鄭縣。（圖九）全程上、中、下關各居其一，亦見此道重要性。²¹²

元稹〈使東川·百牢關〉：「嘉陵江上萬重山」，²¹³百牢關位於嘉陵江上游重山峻嶺處。武元衡詩提及自己在憲宗元和時，自領有蜀地七年奉詔回京，途經百牢關。²¹⁴元稹則說自己：「九年內，五度百

7.7)，卷上，〈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頁 30-31。

²¹²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頁 759-797。關於唐代利用散關道的記載可參見蔡坤倫，《唐代關防——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秀威出版社，2020.5），頁 300-309。

²¹³ 《全唐詩》（第 12 冊），卷 412，元稹〈使東川·百牢關〉，頁 4569。

²¹⁴ 《全唐詩》（第 10 冊），卷 316，武元衡〈元和癸巳，余領蜀之七年，奉詔徵還，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經百牢關，因題石門洞（石洞門）〉，頁 3551-3552。

牢關」。²¹⁵于武陵（于鄴）從蜀國回長安、洛陽途中行經百牢關。²¹⁶《唐六典》將百牢關列為梁州下關之一²¹⁷，一方面唐代長安至南鄭縣交通有子午道、駱谷道；另一方面據嚴耕望考，散關道上的鳳州梁泉縣東南行經斜谷關至梁州褒城縣是為褒斜新道，實為北魏時的迴車道，唐前期新道非主道，中唐至五代成為南北交通幹線，褒斜新、舊道在唐代呈現「Y」字形，字形上半部為北段分東、西支，字形下半部為南段（褒谷段），斜谷關不僅位於南段，且在此關南側不遠處亦為北段東、西支分歧點，地理位置在褒斜新、舊道中甚為關鍵。²¹⁸雍陶〈西歸出斜谷〉：「行過險棧出褒斜」，²¹⁹斜谷關南側幾近於Y字的中心交錯點，扼守唐代褒斜新道，深峻險要。換言之，南鄭縣北往斜谷關所在的褒斜新道，進而接散關道，如此則不一定要再西繞百牢關而西北接散關道，百牢關地位因而降低，可見斜谷關地位更勝百牢關，層級應為驛道中關。

散關在唐代位列上關之一，²²⁰因此關「當山川之會，扼南北之交，北不得此無以啟梁、益，南不得此無以圖關中」，²²¹秦嶺大散嶺段北有散谷水匯入渭水再入黃河，南有故道水經嘉陵江匯入長江，居大散嶺段的散關可說是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的分水嶺。得散關則有利於南取梁州、益州，北進關中，作為關中西南要關，戰略地位重

²¹⁵ 《全唐詩》（第12冊），卷410，元稹〈百牢關〉，頁4558。

²¹⁶ 《全唐詩》（第18冊），卷595，于武陵〈過百牢關貽舟中者〉，頁6896。《全唐詩》（第21冊），卷725，于鄴〈過百牢關貽舟中者〉，頁8316。

²¹⁷ 《唐六典》，卷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195-196。

²¹⁸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頁750-753。

²¹⁹ 《全唐詩》（第15冊），卷518，雍陶〈西歸出斜谷〉，頁5923。

²²⁰ 《唐六典》，卷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195-196。

²²¹ 《讀史方輿紀要》，卷52，〈陝西·散關〉，頁2497。

要。陳子昂〈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知之〉：「蜀門自茲始」，²²²點出散關是入蜀的起點。王勃〈散關晨度〉：「重門臨巨壑，連棟起崇隈」，²²³形容散關居高山峻嶺，下臨深溝「巨壑」，雄關居地勢險要。王維〈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危徑幾萬轉」，²²⁴從王維詩題中可知，自散關略沿故道水南行，越秦嶺後至鳳州黃花縣途中，此段路名「磴道」，地理形勢號為「深林密竹」、「盤曲四五十里（唐里）」，又《通典》鳳州黃花縣底下記載為「有黃花川為名」，²²⁵可見黃花縣名源自黃花川，散關南至黃花縣不僅有秦嶺、黃牛嶺等山，更有故道水與黃花川等河。

肆、唐詩中長安北、西面、洛陽東面、太原西北面

關道

一、長安北往受降城「關」：蘆子關

(一)關的名稱、位置

《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延州延昌縣北有蘆子關，²²⁶蘆子關首見於唐代，又杜甫著有〈塞蘆子〉詩，²²⁷可見關又稱蘆子。蘆子之名據南宋人蔡夢弼語蘆關：「去延州百八十里，有土門山，兩崖峙立如門，

²²² 《全唐詩》（第3冊），卷83，陳子昂〈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知之〉，頁897。

²²³ 《全唐詩》（第3冊），卷56，王勃〈散關晨度〉，頁674。

²²⁴ 《全唐詩》（第4冊），卷125，王維〈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頁1250。

²²⁵ 《通典》，卷176，〈州郡·古梁州·河池郡鳳州·黃花縣〉，頁4614。

²²⁶ 《新唐書》，卷37，〈地理志·關內道·延州·延昌縣〉，頁971。

²²⁷ 《杜詩詳註》，卷4，〈塞蘆子〉，頁327-329。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版）。

形若葫蘆，故謂之蘆子。」²²⁸蘆子關地處土門山，土門山由於兩崖對峙如門的兩扇，形狀上宛若葫蘆，故名。此關名稱史家載名為蘆子關，詩人記為蘆子，南宋蔡氏則以蘆關簡稱，蘆關名稱應溯源五代時後唐，《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四年四月：「延州奏，蕃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金明鎮」，²²⁹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四月，蘆子關所在的延州上奏，蕃夷部族搶劫運送的糧餉以及攻城的器具，逼使蘆關的將兵退守金明鎮，能讓軍隊棄關撤退想見此次外族入侵的嚴重。總之，唐代蘆子關亦稱蘆子，五代後唐以後簡稱蘆關。

前引《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蘆子關位於延州延昌縣北，可知關隸屬延州，不過《元和郡縣圖志》卻有相異記載，且涉及與塞門鎮相對位置，至於塞門鎮位置亦有兩說。《元和志》關內道延州延昌縣記載：「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²³⁰位於夏州的蘆子關在塞門鎮南 18 唐里，此塞門鎮在蘆子關北方說。《元和志》關內道延州延昌縣另載：「塞門鎮，在縣西北二十里。鎮本在夏州寧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²³¹塞門鎮原本在夏州寧朔縣界，玄宗開元二年（714）遷到蘆子關南金鎮所，嚴耕望以為「金」疑為「今」之誤，²³²即蘆子關南側的今鎮所是遷移後的塞門鎮所在，新塞門鎮位於延州延昌縣西北 20 唐里，此塞門鎮在蘆子關南方說。

²²⁸ 《讀史方輿紀要》，卷 57，〈陝西·延安府·安塞縣·蘆關〉，頁 2724 引。艾冲，〈論唐代「河曲」內外駐防城群體的分布及其對北疆民族關係的作用〉，《唐史論叢》，2008，頁 141。

²²⁹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5，1 版），卷 44，〈唐書·明宗紀〉，頁 604。

²³⁰ 《元和郡縣圖志》，卷 3，〈關內道·延州·延昌縣〉，頁 78。

²³¹ 《元和郡縣圖志》，卷 3，〈關內道·延州·延昌縣〉，頁 78。

²³²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 237。

換言之，塞門鎮有新、舊之別，舊塞門鎮位於蘆子關北的夏州寧朔縣，新塞門鎮於玄宗開元二年時遷到蘆子關南的延州延昌縣西北，至於蘆子關則隸屬夏州。

李吉甫認為塞門鎮在唐代出現新、舊之別，至於與之相對位置的蘆子關則未曾變遷，皆屬夏州，然而，《新唐書·地理志》則記此關屬延州，究竟唐代蘆子關隸屬何州？《資治通鑑·後唐紀》明宗長興四年(933)胡三省注：「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²³³塞門寨即唐代新塞門鎮，北宋人趙珣以為蘆關在延州延昌縣，新塞門鎮北 15 宋里。近人考證蘆關位置，如艾冲：「夏州的南界以蘆子關所在的白於山為限」，²³⁴說明依白於山而建的蘆子關位於夏州南界。王北辰：「位於陝西安塞縣北約 70 公里土門山谷，北與靖邊縣接界」，²³⁵穆渭生接踵其說，「故址在今安塞縣西北 70 公里與靖邊縣交界處，當延河源頭。」²³⁶今安塞縣於唐代時屬延州，靖邊縣屬夏州，土門山谷可視為白於山系列山峰，顯見後人論證以為蘆子關在夏州與延州的邊界。

溯源兩部地理志記載的政區時間，《元和志》以貞觀十三年(639)《大簿》中的十道為綱領，述唐憲宗元和時統治和 47 鎮割據地其下治理的州縣。²³⁷《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政區以開元、天寶為主體，政區沿革下限當以唐末天祐年間為斷。²³⁸是否可以說兩部地理書反

²³³ 《資治通鑑》，卷 278，〈後唐紀〉，頁 9083 明宗長興四年(933)四月。

²³⁴ 艾冲，〈唐代靈、鹽、夏、宥四州邊界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 年第 1 輯，頁 30。

²³⁵ 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歷史地理》，1990 年第 9 輯，頁 273。

²³⁶ 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頁 309。

²³⁷ 《元和郡縣圖志》「前言」，頁 1。

²³⁸ 華林甫，〈二十世紀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評〉，《中國地方志》，2006 年第 2 期，頁

映唐代前、後期政區變化，兩州邊界的變遷，導致蘆子關有位於夏州與延州之別？但從宋人記載以及近代學者考證，蘆子關位置似乎仍以在延州為多數時期，為延、夏兩州邊關，位於清水（今延河）源頭，王開以為關分峙於河水兩岸，²³⁹可見此關在性質上屬於水、陸關。

(二)關道與關層級

長安北往靈州、豐州、勝州的三條驛道，嚴耕望依序命名為西線長安西北通靈州驛道、中線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東線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²⁴⁰中線是由長安北行經坊州、鄜州、延州，西北行經夏州至豐州西受降城及天德軍，道路經蘆子關。長安北經坊州、鄜州、延州段的路線與東線重疊，延州則是東線與中線的分歧地。三線中以中線最為捷近，史云「從天德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餘便至京師。」²⁴¹四日多即能從關內道北境傳遞訊息至京師，可說中線是三線中的主幹道。（圖 11）

中線由長安北微東行經京兆府涇陽縣、三原縣、華原縣、同官縣，入坊州宜君縣、中部縣，入鄜州三川縣、東北循洛水至洛交縣、伏陸縣，入延州膚施縣。延州膚施縣後分東北與西北行兩脈道路，東北行即前述至勝州路線，西北行溯清水經金明縣、罷交縣、新塞門鎮、蘆子關，入夏州關北五城與木瓜嶺至寧朔縣、朔方縣，北微西行入豐州九原縣。九原縣後分西北至黃河北岸西受降城，東北至天德軍。²⁴²蘆子關扼守關中北面長安北至豐州、西受降城、天德軍路線

41-49。陳凱，〈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史林》，2010年第1期，頁58-60。

²³⁹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頁208。

²⁴⁰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259。

²⁴¹ 《元和郡縣圖志》，卷4，〈關內道·新宥州〉，頁107。

²⁴²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頁231-238。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

之要關，且為驛道所經，至少在唐中後期屬驛道中關。

交通路線受到自然環境山、河的制約，唐代勝州、夏州、鹽州、宥州、靈州是今日鄂爾多斯高原所在地，鄂爾多斯高原屬於內蒙古高原南部，西、北、東三面黃河環繞，南接長城，以白于山與黃土高原為界，形成關中北面重要的自然地形屏障，都城北往受降城與河套均需繞行高原四周較低處或沿黃河岸而行，意味著自然環境的山、河制約長安北面的交通網絡，同時與在此設置的關隘，共同形成軍事防禦體。

《唐六典》記載唐代天下二十六座關並未見蘆子關，²⁴³但從〈彭衙行〉詩提及：「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小留同（固/周）家窪，欲出蘆子關。」²⁴⁴彭衙在同州白水縣，長安陷入敵軍之際，杜甫北行白水縣、²⁴⁵鄜州洛交縣、延州膚施縣，出蘆子關至靈武追隨肅宗，沿路艱險之景溢於言表。²⁴⁶〈塞蘆子〉云：「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²⁴⁷杜甫認為位於秦嶺北的延州是京城北邊門戶，倘能派兵一萬守住州內北界的蘆子關，則可扼止安祿山與

史》，頁 207-209。

²⁴³ 《唐六典》，卷 6，〈尚書刑部〉「司門」條，頁 195-196。

²⁴⁴ 《全唐詩》（第 7 冊），卷 217，杜甫〈彭衙行〉，頁 2274-2275。《杜詩詳註》，卷 5，〈彭衙行〉，頁 413-417。

²⁴⁵ 李德輝，〈唐京北地區交通與唐後期邊塞行旅詩〉，《唐代文學研究》，2004，頁 64。

²⁴⁶ 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頁 273。案：作者語彭衙在同州白水縣。

²⁴⁷ 《全唐詩》（第 7 冊），卷 217，杜甫〈塞蘆子〉，頁 2274。《杜詩詳註》，卷 4，〈塞蘆子〉，頁 327-329。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頁 273 語此詩寫於安史亂起。

史思明入京後繼續北上的可能，此舉展現出杜氏的「軍事意識」。²⁴⁸蘆子關在唐中期以後扮演著都城北面軍防重要性，亦是經過延、夏兩州驛道的邊關，層級屬於驛道中關，史籍分類的唐代天下關層級只能表示玄宗開元期間的情況。

蘆子關不僅作為京城北邊門戶，²⁴⁹同時緊鄰長城南側，並與河外五城形成外圍防禦圈。穆宗長慶四年（824）三月甲戌日，時敬宗已登帝位，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為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²⁵⁰五城分布據艾冲記載，宥州、陶子與夏州三城形成鼎立之勢，扼制無定河上游東進的河谷通道；烏延、臨塞、陰河三城也相互配合，肩負著無定河南側支流——蘆河河谷的防務。²⁵¹換言之，長城南側的五城，以及木瓜嶺上堡壘與蘆子關形成犄角，共同承擔京城北面安危。

《太平廣記》引〈獨異志〉記載一則趙雲遊廊時事件，從中可窺知蘆子關交通路線，其載：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

²⁴⁸ 鮮于煌，〈論杜甫的「軍事意識」〉，《渝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75。

²⁴⁹ 史念海，〈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收錄氏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版），頁14。案：史氏同意此關作為長安北面關。

²⁵⁰ 《舊唐書》，卷17，〈敬宗本紀〉，頁509。《新唐書》，卷37，〈地理志·關內道·夏州·朔方〉，頁973-974。

²⁵¹ 艾冲，〈論唐代「河曲」內外駐防城群體的分布及其對北疆民族關係的作用〉，頁141-142。

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蹙頰鼻額，援掖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蓄之，為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暱，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²⁵²

唐憲宗時天水人趙雲遊鄜州時時，途經坊州治所中部縣，醉話中要求縣吏加刑於一位罪不甚重，吏欲縱放的犯人，使其被杖刑。數月後，趙雲行至蘆子關，途中遇到日前因己語而害其被杖刑之人，乃被拉入一室，受其凌虐至身形、聲音皆變，後被置於烏延驛中服雜役。數年後，逢其弟為御史，按查靈州獄政，雲密告其事，透過李銘乃得昭雪而獲救。

此案例乃是趙雲旅行經坊州中部縣時，因醉語害一人被杖刑，爾後行至延州蘆子關時被加害人囚禁與凌虐，並將其拉至烏延驛從事雜役。趙雲行走路線涉及唐代坊州、鄜州、延州，加上曾在長城南側五城之一的烏延城週圍烏延驛所在的夏州，此道即唐代長安北至

²⁵²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六）（北京：中華書局，1961.9，新1版），卷286，〈中部民〉，頁2279。蔡坤倫，〈略論〈塞蘆子〉詩所見蘆關與五城〉，《嘉大應用歷史學報》，第5期（嘉義，2020.12），頁107-130。

二、長安西越隴山道「關」

(一)蕭關

1.蕭關、蕭關縣位置與木峽關的出現

《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原州平高縣記載：「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是也」，²⁵³漢、唐蕭關皆位於原州平高縣東南 30 唐里。盧照鄰〈上之回〉：「回中道路險，蕭關烽候多」，²⁵⁴陶翰〈出蕭關懷古〉：「驅馬擊長劍，行役至蕭關。悠悠（然）五原上，永眺關河前。北虜三十萬，此中常控弦。……大漠橫萬里，蕭條絕人煙」，²⁵⁵張蠙〈過蕭關〉：「出得蕭關北，儒衣不稱身。……曉戍殘烽火，晴原起獵塵」，²⁵⁶漢代蕭關不僅宿衛「北虜」匈奴，而且也是南北向回中道北行必經關隘，關城沿線設置「烽候」，烽火台與關共同組成北邊防敵陣線，過此關即為荒野「大漠」，人煙稀少，敵我界線分明，連衣服「儒衣」等中原服飾亦需調整。由於蕭關在唐時重要性降低，故文獻稱為「故城」。史念海認為漢時蕭關在唐代廢棄，另於原州北設置蕭關縣，正是因為蕭關道受到侵蝕，已荒蕪難行，代之而起的乃是經過平涼縣的平涼道。木峽關的建立代替漢時蕭關，控制經過平涼而至於長安的道路。²⁵⁷

蕭關縣位置據《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原州蕭關縣記載：「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隋他樓縣，大業元年置，神龍三年廢，別立蕭關縣，

²⁵³ 《元和郡縣圖志》，卷 3，〈關內道·原州·平高縣·蕭關故城〉，頁 58。

²⁵⁴ 《全唐詩》（第 2 冊），卷 41，盧照鄰〈上之回〉，頁 512。

²⁵⁵ 《全唐詩》（第 4 冊），卷 146，陶翰〈出蕭關懷古〉，頁 1475。

²⁵⁶ 《全唐詩》（第 20 冊），卷 702，張蠙〈過蕭關〉，頁 8068-8069。

²⁵⁷ 史念海，〈唐代原州的木峽關和石門關〉，收錄氏著，《河山集》（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1 版），頁 240-241。

以去州闕遠，御史中丞侯全德奏於故白草軍城置，因取蕭關為名。」²⁵⁸唐代蕭關縣南至平高縣 180 唐里，隋煬帝大業元年（605）設置他樓縣，中宗神龍三年（707）廢，另於故白草軍城置蕭關縣，縣名取其蕭關名稱。「蔚如水在縣之西，一名葫蘆河，源出原州西南頽沙山下。」²⁵⁹即蕭關縣在蔚如水東，水源自原州西南頽沙山下。唐代於原州平高縣北 180 唐里，蔚如水東設置蕭關縣，由於經平涼縣的道路逐漸取代蕭關道，蕭關道路使用頻率降低而漸荒廢，但關城並未消失，從沈亞之論曰「邠寧軍北因崆峒，守蕭關」，²⁶⁰以及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復蕭關」語可知，²⁶¹與其說蕭關在唐代成為故關，不如說是次關。換言之，靈州南來的北敵，入原州蕭關縣，沿蔚如水南行 180 唐里至平高縣，平高縣西南 40 唐里至頽沙山上的木峽關，²⁶²再東越隴山行平涼道。（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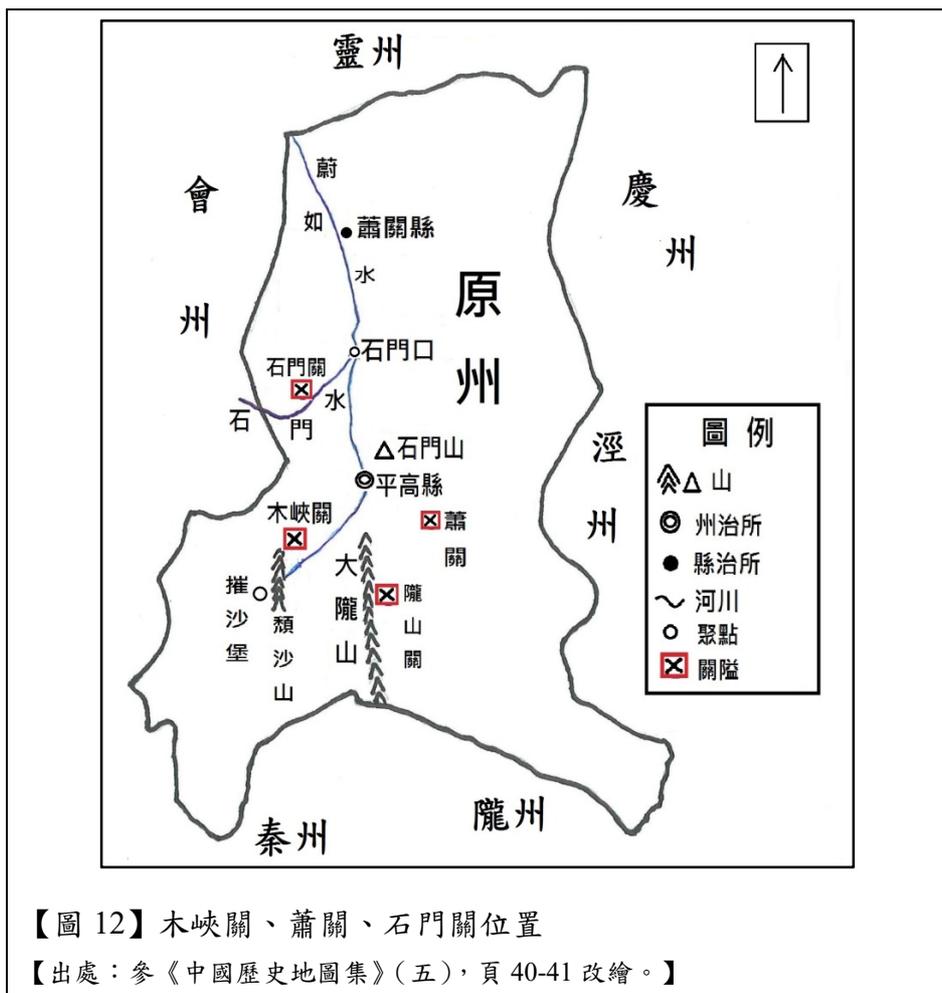
²⁵⁸ 《元和郡縣圖志》，卷 3，〈關內道·原州·蕭關縣〉，頁 60。

²⁵⁹ 《元和郡縣圖志》，卷 3，〈關內道·原州·蕭關縣·蔚如水〉，頁 60。

²⁶⁰ 北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5，1 版），卷 492，〈策·直言〉，沈亞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頁 2520-2。

²⁶¹ 《資治通鑑》，卷 248，〈唐紀〉，頁 8039 宣宗大中三年（849）。

²⁶² 里數 40 里乃依嚴耕望考證。詳參氏著，《唐代交通圖考》（二），頁 406。蔡坤倫，〈唐代關中西面隴山北段關隘沿革考——兼論絲路東段中道的興起〉，《輔仁歷史學報》，第 39 期（臺北，2018.6），頁 83-120。



2.長安西逾隴山的三道---兼論蕭關道的興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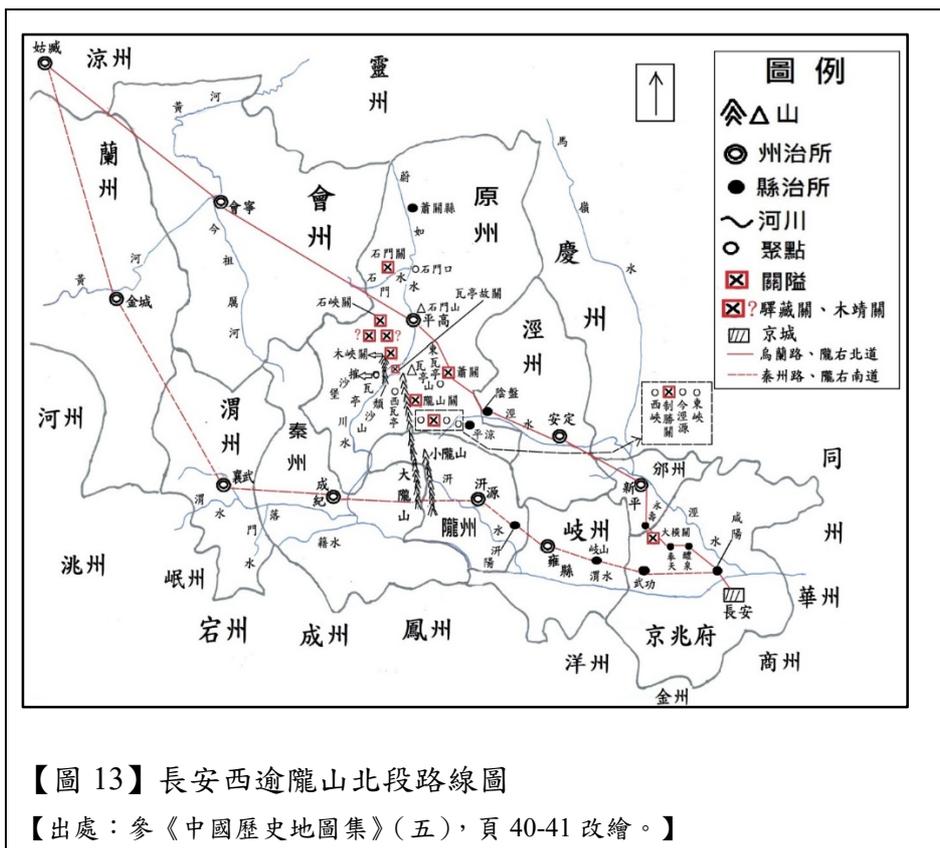
隴山是唐代關中西逾會州、隴右道重要山脈之一，主要盤據在
原州、隴州、秦州境內，呈西北-東南走向。古代隴山包括今六盤山
和隴山，大隴山相當今北段六盤山，小隴山相當今南段隴山。²⁶³長

²⁶³ 劉滿，〈秦漢隴山道考述〉，《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2 期，頁 264。

安西逾隴山的道路亦隨隴山北段與南段而有北、中、南三道之分，但三道皆屬絲路東段的部分，隴山北道與中道穿越隴山北段的大隴山，隴山南道越過隴山南段的小隴山，大、小隴山構成唐代關中西面的天然屏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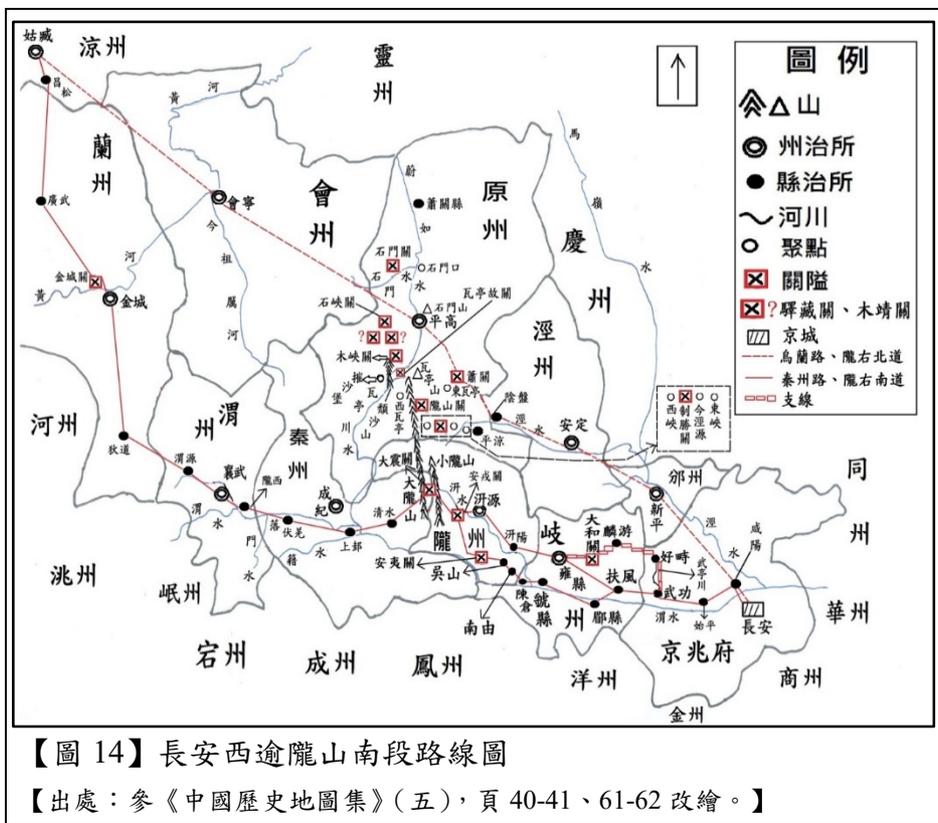
北道稱烏蘭路或隴右北道，大致沿涇水西北行。由京城西北行經咸陽縣、醴泉縣、奉天縣、大橫關（上關）至邠州，再經涇州、原州蕭關、會州、蘭州至涼州，其中在涇州的陰盤縣是北道與中道分歧點。中道又稱長安平涼道（雞頭道），由陰盤縣向西經原州平涼縣、東峽、今涇源縣、制勝關（驛道中關）、西峽，登大隴山頂上的隴山關後，一方面西行經瓦亭關，與隴山北側口的木峽關銜接，再北往平高縣，匯入北道；另一方面可由此抵達隴山以西。中道的確在唐代短暫取代北道陰盤縣—蕭關—平高縣段，使得蕭關所在的北道短暫居幕後。但終究在起點陰盤縣與終點平高縣與北道共用，加上路徑較遠，北道仍是主幹道。蕭關道依舊存在，關的層級仍屬於驛道中關。

（圖 13）



南道稱秦州路或隴右南道。路線是由長安西行經岐州、隴州、秦州、渭州、蘭州至涼州，微觀之則是由主線與南、北兩支線形成。主線是由長安經京兆府的咸陽縣、始平縣、武功縣，西行入岐州扶風縣、雍縣（治所），西北入隴州汧陽縣、汧源縣（治所）、安戎關、小隴山、大震關（上關）、大隴山，西行入秦州清水縣、上邽縣、伏羌縣，西行入渭州隴西縣、襄武縣、渭源縣，西北行入蘭州狄道縣、金城縣（治所）、金城關、廣武縣，西北行入涼州昌松縣、姑臧縣（治所）。北支線是由京兆府武功縣向北經好畤縣，西行入岐州麟遊縣，西南行經大和關（四面中關→上關），再匯入主線道上的雍縣。南支線是

由岐州扶風縣，西南行經郿縣、虢縣、陳倉縣，西北行入隴州南由縣、吳山縣、安夷關（下關），再匯入主線道上安戎關。此道主、支線構成的交通，沿途由一上關一中關一下關扼守。（圖 14）



(二)玉門關

《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沙州壽昌縣記載：「玉門故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²⁶⁴玉門故關指漢代設置的玉門關，位於唐代沙州壽昌縣西北 117

²⁶⁴ 《元和郡縣圖志》，卷 40，〈隴右道·沙州·壽昌縣·玉門故關〉，頁 1027。

唐里，交通屬於北道。又隴右道瓜州晉昌縣記載：「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²⁶⁵位於瓜州晉昌縣東的玉門關為唐代關址，可見漢唐玉門關位置不同，漢在沙州，唐在瓜州，唐代玉門關乃漢代關址東遷，較近長安城。同書隴右道沙州壽昌縣記載：「陽關，在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本漢置也，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²⁶⁶陽關則在壽昌縣西 6 唐里，玉門關南方，交通隸屬於南道。換言之，唐代隴山南、北道在涼州後匯為一線，繼續西經甘州張掖縣、肅州酒泉縣、瓜州玉門關、晉昌縣至沙州敦煌縣，大致循古代河西走廊路段。沙州治所敦煌縣再分南、北道，北道經玉門故關，南道經陽關。玉門關既然在驛道上，且離京城已有一段距離，層級屬驛道中關。

李昌符〈登臨洮望蕭關〉：「漸覺風沙暗，蕭關欲到時」，²⁶⁷臨洮一方面是長城西端起點；另一方面是隴山南道途經蘭州的狄道縣（臨洮縣），而蕭關則位於隴山北道的原州平高縣東南。朱慶餘〈自蕭關望臨洮〉：「玉關西路出臨洮，風卷邊沙入馬毛」，²⁶⁸由詩題中可見，

²⁶⁵ 《元和郡縣圖志》，卷 40，〈隴右道·瓜州·晉昌縣·玉門關〉，頁 1028。案：唐代玉門關是否在瓜州晉昌縣東 20 步，學者對此有所質疑，進而引發玉門關位置的討論。可參李并成，〈唐玉門關究竟在哪裡〉，頁 280-286。又玉門關位置有漢、唐、五代以後位置不同，相關文章如陳夢家，〈玉門關與玉門縣〉，頁 138-146。馬雍，〈西漢時期的玉門關和敦煌郡的西境〉，頁 147-150。吳初驤，〈玉門關與玉門關候〉，頁 167-174、〈漢代玉門關及其入西域路線之變遷〉，頁 179-190。趙永復，〈漢代敦煌郡西境和玉門關考〉，頁 175-178。李并成，〈五代宋初的玉門關及其相關問題考〉，頁 200-204。趙評春，〈西漢玉門關、縣及其長城建置時序考〉，頁 213-219。紀宗安，〈絲綢之路新北道考實：兼談玉門關址的東遷〉，頁 244-256。李正宇，〈新玉門關考〉，頁 257-269。李并成，〈漢代玉門關新考〉，頁 274-279。以上文章均收錄於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 版）。

²⁶⁶ 《元和郡縣圖志》，卷 40，〈隴右道·沙州·壽昌縣·陽關〉，頁 1027。

²⁶⁷ 《全唐詩》（第 18 冊），卷 601，李昌符〈登臨洮望蕭關〉，頁 6953。《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4，朱慶餘〈望蕭關〉，頁 5870 詩句與李昌符詩完全雷同。

²⁶⁸ 《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4，朱慶餘〈自蕭關望臨洮〉，頁 5876。

這一南一北的兩個地點在唐人眼中可以互相遠眺到彼此。不論是蕭關或玉門關，「風沙暗」、「風卷邊沙」皆道出兩關為邊關，地質為沙地，氣候屬多風，易將沙質土層帶起形成漫天迷濛的昏暗天色。

正因為漢、唐玉門關位置不同，唐詩中的玉門關有詠故關，也存在著描繪新關。李正宇認為新玉門關地處細土平原，林草甚茂，絕無黃沙萬里大漠氣象，²⁶⁹依此標準來檢視唐詩中的玉門關，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玉門關城迴且孤，黃沙萬里白草枯」，²⁷⁰李白〈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²⁷¹高適〈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胡人吹（羌）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明）月閒」，²⁷²「黃沙萬里」、「白草枯」、「蒼茫雲海」、「蕭條」顯然是玉門故關的場景。王之渙〈出塞〉：「黃砂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²⁷³「孤城」據寧瑞樸指出唐瓜州城，²⁷⁴「萬仞山」指瓜州城南的大雪山。「春光」藉指皇帝恩澤，無法達到玉門關，在瓜州城的玉門關當為唐代新關，邊關性質也讓人至此充滿孤寂感。來濟〈出玉關〉：「銜悽渡玉關。……垂涕念生還」，²⁷⁵岑參〈玉關寄長安李玉簿〉：「東去長安萬里餘，……玉關西望堪腸斷」，²⁷⁶此種「銜悽」、「垂涕」、「腸斷」的悲離心情充分

²⁶⁹ 李正宇，〈新玉門關考〉，收錄於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頁 268。

²⁷⁰ 《全唐詩》（第 6 冊），卷 199，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頁 2058-2059。

²⁷¹ 《全唐詩》（第 1 冊），卷 18，李白〈關山月〉，頁 193。

²⁷² 《全唐詩》（第 6 冊），卷 214，高適〈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塞上聞笛）〉，頁 2243。

²⁷³ 《全唐詩》（第 1 冊），卷 18，王之渙〈出塞〉，頁 186。《全唐詩》（第 8 冊），卷 253，王之渙〈涼州詞〉之一，頁 2849 詩句與〈出塞〉完全雷同。

²⁷⁴ 轉引自李正宇，〈新玉門關考〉，頁 268。

²⁷⁵ 《全唐詩》（第 2 冊），卷 39，來濟〈出玉關〉，頁 501。

²⁷⁶ 《全唐詩》（第 6 冊），卷 201，岑參〈玉關寄長安李玉簿〉，頁 2104。

反應在邊關上。

三、洛陽東、太原西北道「關」

(一)武牢關

武牢關據《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845）記載：「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容」，²⁷⁷縣因臨汜水而得名，關位於河南府汜水縣，關城東側山峰上有昔日王世充、竇建德的雕像。《新唐書·五行志》記載：

咸通元年，潁州大水。四年閏六月，東都暴雨，自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七月，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九月，孝義山水深三丈，破武牢關金城門汜水橋。六年六月，東都大水，漂壞十二坊，溺死者甚眾。七年夏，江淮大水。秋，河南大水，害稼。十四年八月，關東、河南大水。²⁷⁸

唐後期懿宗咸通元年（860）各地陸續發生水災，先是潁州，接著四年（863）閏六月東都洛陽亦是，七月擴及許州、汝州、徐州、泗州等，九月水淹孝義山達三丈之深，武牢關的金城門以及連接汜水的橋樑皆受到破壞。從西元 860 至 873 年，14 年期間洪水成災，遍及洛陽、潁州、許州、汝州、徐州、泗州、江淮、河南、關東等地。

張祜〈宿武牢關〉：「行人候曉久裴徊，不待雞鳴未得開。堪羨寒溪自無事，潺潺一夜宿（向）關來」，²⁷⁹雞鳴是關門開的前提，否則只能夜宿關旅店，由於武牢關臨汜水，「潺潺」水聲伴隨宿關的旅客。

²⁷⁷ 《舊唐書》，卷 18，〈武宗本紀〉，頁 606。

²⁷⁸ 《新唐書》，卷 36，〈五行志〉，頁 935。

²⁷⁹ 《全唐詩》（第 15 冊），卷 511，張祜〈宿武牢關〉，頁 5842。

吳融〈武牢關遇雨〉：「澤（深）春關路迥，暮雨細霏霏」，²⁸⁰武牢關地處洛陽以東，控制洛陽至汴州開封的要關之一，洛陽東行經偃師縣、鞏縣、汜水縣、武牢關，入鄭州滎陽縣、管城縣、中牟縣，入汴州開封，層級應屬驛道中關。

（二）鴈（雁）門關

《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憲州天池縣記載：「有鴈門關」，²⁸¹憲州是由嵐州分出，〈地理志〉：「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領縣三。樓煩。玄池。天池」，²⁸²昭宗龍紀元年（889）李克用奏請另於嵐州東南分置憲州，鴈門關設置於憲州與太原府邊界，太原府西北行人憲州必經此關，許棠〈雁門關野望〉：「高關閒獨望，望久轉愁人。紫塞唯多雪，胡山不盡春」，²⁸³鴈同雁，反應詩人與史家書寫方式不同，雁門關作為北都西北行人憲州要道，層級應屬驛道中關。

伍、結語

本文主要以唐詩中的關防詩為文本分析，結合唐代上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之對內與對外交通，得出唐詩中三都內、外交通上的關計有 18 座，這 18 座關控制唐代三都間與對外交通，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先是三都間的關道有長安洛陽道，道上有潼關、函谷關；長安太原道有蒲津關、汾水關、陰地關；洛陽太原道有天井關、壺口關，三都間的關計有 7 座。其次是三都對外的關道，以長安東

²⁸⁰ 《全唐詩》（第 20 冊），卷 685，吳融〈武牢關遇雨〉，頁 7865。

²⁸¹ 《新唐書》，卷 39，〈地理志·河東道·憲州·天池縣〉，頁 1005。

²⁸² 《新唐書》，卷 39，〈地理志·河東道·憲州·天池縣〉，頁 1005。

²⁸³ 《全唐詩》（第 18 冊），卷 603，許棠〈雁門關野望〉，頁 6966。

南面來說，藍田武關道上有藍田關、武關；以長安西南面而言，秦嶺谷道上有駱谷關、散關、百牢關、斜谷關。最後是長安北面往西受降城有蘆子關；長安西面往隴山有蕭關、玉門關；洛陽東面往汴州有武牢關；太原西北面往憲州有鴈（雁）門關，三都對外關計有 11 座。

唐代關防詩涉及面向甚廣，勾勒關的面向以地理形勢居多數，次則有交通、典故史等，大體文章中藉由詩中提及的史事，進而連結關的位置或變遷等，同時以《唐六典》將唐關分為上、中、下三級標準，推敲詩中個別關的層級。但無論如何，在解析每首關防詩的意涵仍僅為初階，未來仍有待個別關討論時再深入釐清。再者，在爬梳關防詩的過程中，諸如關道中的驛站詩為數亦不少，入蜀與入京詩更是士人、為官者求取功名順遂或受重用與否的象徵，這類詩句在旅途中或因停留關防而寫下，此等皆可納入解構關防詩的考量點。

參考文獻

一、典籍

- 佚名著，張金泉注譯，《新譯尉繚子》，臺北：三民書局，1996.2，初版。
- 佚名著，方韜譯注，《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2009.3，1版。
- 前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11，2版。
- 前漢·劉安撰，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10，1版。
- 後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6，1版。
-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5，1版。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1版。
-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6，1版。
-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4，1版。
-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12，1版。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1，1版。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6，1版。
- 唐·岑參，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9.1版。

- 唐·張九齡著，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11，1版。
- 唐·白居易著，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0，1版。
- 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1版。
-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8，1版。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10，1版。
-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版。
- 唐·李商隱著，葉葱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臺北：里仁書局，1987.7。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5，1版。
- 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2，1版。
- 北宋·王溥撰，牛繼清校證，《唐會要校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5，1版。
- 北宋·樂史，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11，1版。
- 北宋·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6，1版。
- 北宋·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正編4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臺1版。
-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9，新1版。
- 北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5，1版。

- 北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5，1版。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4，1版。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11，1版。
-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3，1版。
- 日·圓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著，周一良審閱，《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11，1版。

二、專書

-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版。
- 王開主編，《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8，1版。
-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1版。
-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0，1版。
- 周一士，《中國公路史》，臺北：公路出版社，1957.8，初版。
- 唐寰澄編著，《中國古代橋梁》，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1.1，1版。
- 劉希為，《隋唐交通》，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3，臺1版。
- 蔡坤倫，《唐代關防——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秀威出版社，2020.5。
- 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7，1版。

-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12，初版。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10，1版。
- 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專刊，1967.12。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5，初版。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1985.9，初版。
-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1，1版。

三、期刊、學位論文

- 王元林，〈蒲津大浮橋新探〉，《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頁52-58。
- 王文楚，〈西安洛陽間陸路交通的歷史發展〉，收錄氏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7，1版，頁82-103。
- 王文楚，〈唐代兩京驛路考〉，收錄氏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7，1版，頁46-81。
- 王北辰，〈唐代長安—夏州—天德軍道路考〉，《歷史地理》，1990年第9輯，頁264-274。
- 史念海，〈唐代原州的木峽關和石門關〉，收錄氏著，《河山集》（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1版，頁239-248。
- 史念海，〈隋唐時期的交通與都會〉，收錄氏主編，《唐史論叢》（第六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10，1版，頁1-57。
- 艾冲，〈唐代靈、鹽、夏、宥四州邊界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輯，頁26-31。
- 艾冲，〈論唐代「河曲」內外駐防城群體的分布及其對北疆民族關係

- 的作用》，《唐史論叢》，2008，頁131-146。
- 吳初驤，〈玉門關與玉門關候〉，收錄於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167-174。
- 吳初驤，〈漢代玉門關及其入西域路線之變遷〉，收錄於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179-190。
- 李之勤，〈《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省漢中府「儻駱道」條校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1輯，頁229-237。
- 李之勤，〈唐代藍武道上的七盤嶺與韓公堆〉，收錄氏著，《西北史地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2，1版，頁126-133。
- 李之勤，〈儻駱古道的發展特點、具體走向和沿途要地〉，《文博》，1995年第2期，頁44-53。
- 李正宇，〈新玉門關考〉，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257-269。
- 李仲操，〈歷代散關遺址小考〉，《人文雜誌》，1985年第6期，頁74-75。
- 李并成，〈五代宋初的玉門關及其相關問題考〉，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200-204。
- 李并成，〈唐玉門關究竟在哪裡〉，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280-286。
- 李并成，〈漢代玉門關新考〉，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274-279。

- 李德輝，〈唐京北地區交通與唐後期邊塞行旅詩〉，《唐代文學研究》，2004年，頁60-65。
- 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收錄氏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7，1版，頁142-165。
- 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補正〉，收錄氏著，《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書局，1987.6，初版，頁114-120。
- 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收錄氏著，《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書局，1987.6，初版，頁85-113。
- 紀宗安，〈絲綢之路新北道考實：兼談玉門關址的東遷〉，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244-256。
- 徐志斌，〈論唐代儻駱道的特點與價值〉，《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頁17-20，轉29頁。
- 馬正林，〈關於古散關遺址〉，《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頁105-106。
- 馬雍，〈西漢時期的玉門關和敦煌郡的西境〉，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147-150。
- 張思足，〈連接秦晉有一橋——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頁5-8。
- 張榮芳，〈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收錄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11，初版，頁737-766。
- 陳凱，〈試論「兩唐書地理志」的斷限問題〉，《史林》，2010年第1期，

- 頁58-60。
- 陳夢家，〈玉門關與玉門縣〉，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138-146。
- 陳夢家，〈畝制與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頁36-45。
- 華林甫，〈二十世紀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評〉，《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2期，頁41-49
- 雷震，〈歷史時期的儻駱道及其作用〉，《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頁40-44。
- 趙永復，〈漢代敦煌郡西境和玉門關考〉，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175-178。
- 趙評春，〈西漢玉門關、縣及其長城建置時序考〉，收錄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8，1版，頁213-219。
- 劉滿，〈秦漢隴山道考述〉，《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頁264-269。
- 劉樹友，〈秦嶺諸關考——關中要塞研究之四〉，《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頁23-27，轉46頁。
- 蔡坤倫，〈唐代關中西面隴山北段關隘沿革考——兼論絲路東段中道的興起〉，《輔仁歷史學報》，第39期（臺北，2018.6），頁83-120。
- 蔡坤倫，〈略論〈塞蘆子〉詩所見蘆關與五城〉，《嘉大應用歷史學報》，第5期（嘉義，2020.12），頁107-130。
- 蔡坤倫，〈漢「繻」小考〉，《中華簡牘學會通報》，第3期（臺北，2010.12），頁49-58。
- 蔡坤倫，〈漢代函谷關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

文，2009.6。

穆渭生，〈唐代潼關述略——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陝西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63-66。

鮮于煌，〈論杜甫的「軍事意識」〉，《渝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72-77。

關治中，〈潼關天險考證——關中要塞研究之三〉，《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35-39。

1937年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

對中國的報導

吳昆財*

摘要

安危他日終須一仗。1937年7月，在世人的驚訝之下，中日之間發生的大戰，代表著中國人一場生死存亡的奮鬥史。為求其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不至於亡國滅種，於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團結所有的力量，爭取所有的支持，全民決定奮勇一搏。單單是上海淞滬之役，中國人就與兇猛的日軍奮戰超過百天以上，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誇辭大話。

究竟1937年中日戰爭之始，戰場的諸多變化為何，頗值得吾人探討。本文的研究主軸乃欲從著名的美國雜誌《新聞周刊》(Newsweek)，所留下的第一手戰地報導的文獻與史料，而分析與探討這場影響中國人命運的戰爭，究竟如何推演。最後能得出一些真相，以供後人參酌與省思。

關鍵詞：中日戰爭、國聯、蔣介石、宋美齡、《新聞周刊》(Newsweek)

* 吳昆財，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

An Analysis of China's Reports

by *Newsweek* in 1937

Kun-tsai Wu*

Abstract

In July 1937, under the astonishment of the world, the great battl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presented a history of life and death strugg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seek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 as not to subdue the country and the spec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ang Kai-shek, all the forces and all the support were united, and the whole people decided to fight bravely. In the Battle of Songhu in Shanghai alone, the Chinese fought fierce Japanese troops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days and shattered the rhetoric of the Japanese army's death in China in March.

What are the many changes in the battlefie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is worthy of our discussion. The main research topic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is war that has affected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left by the famous American magazine “*Newsweek*”. How to deduct. Finally, some truths can be drawn for later consideration and reflection.

Keywords : Sino-Japanese War, League of Nations, Chiang Kai-shek, Soong May-ling, *Newsweek*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壹、前言

1937年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代表著史詩般的一年，因為就在這一年的七月七日，日本突然對中國盧溝橋發動攻擊，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於焉誕生，中國從此展開了八年浴血奮戰，以求民族生存的對日抗戰過程。當然這場遠在萬里之外的亞洲戰爭，對於美國媒體而言，這絕對也是一項不能錯過的戰地報導。於是所有當時美國的主流媒體，紛紛奔赴中國戰場，希望將第一手戰事傳送給美國本土，關切中日戰爭的讀者。在諸多的媒體中，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也是一份不落人於後，積極報導與分析中日戰爭的雜誌。

本文撰述的目的就是希望藉由1937年《新聞周刊》，有關中國的文本，探討該雜誌對分析與報導中日戰爭，還原在那個時代，美國的這份主流媒體，如何把真實的戰爭傳達給美國社會，並造成某種的輿論，以影響了美國政府日後對中日戰爭的態度與外交決策。

貳、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新聞周刊》 對中國的報導

在這個史詩般的1937年，《新聞周刊》有關中國以及中日戰爭報導與分析的文本，就時間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7年1至7月；第二階段是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至12月底。其中大部的文本都集中在第二個階段。就文本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四個部分：一，中國戰場；二，日本本土對中日戰爭的反映；三，美國政府與社會的反應；四，歐洲列強與國聯的反應。以後分別討論。

就本文所分析這一年分的《新聞周刊》，在1937年7月之前有

關中國的報導只有 5 篇，而且置於該雜誌的外國新聞裡，大部分都不是重要的新聞，只有在 5 月 1 日文章是置於當期外國新聞頭條。

基本上，這個階段《新聞周刊》的對華文本，主要集中在中國國內上與中日關係，其內容包括，有關 1936 年 12 月的西安事變；國民政府如何對付煙毒犯；滿洲國問題；蔣介石與白崇禧的關係；另外，還有是中日關係。

就西安事變而言，這是周刊在該年度首先的文本報導，文章表示由於吸食鴉片的張學良將軍綁架了獨裁者蔣介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件，導致了一場「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荒誕的危機。」不過，最後的結局是，周刊描述：

就在聖誕節夜晚來臨之前，在西安東邊 500 公里的洛陽有 5 架飛機呼嘯而來。此時，忠心的南京軍人還很擔心張少帥部隊會以探照燈和防空機槍對付國府軍機。不過，當探照燈發現是國府軍機上的標誌後，地面部隊並沒有任何的阻攔。

下一刻，洛陽的國軍感到了驚訝，接著是一片的歡呼，重獲自由的蔣委員長從一架飛機走下來，伴隨他的是那位面帶微笑的妻子。

洛陽立即電告南京，消息同時向全國廣播。整個中國，全民陷入喜悅之中，上街遊行，燃放數以千計的炮竹以示慶祝。

之後，有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報導，南京政府曾經譴責張學良，要公開處決他，但最後他不是逃亡，也不是留在西安繼續進行困獸之鬥，而是隨著蔣介石回到洛陽，自願做個囚犯。

隔天中午，20 萬名瘋狂的南京市民，數以打計的政府官員，和 5000 名軍人迎接獨裁者返回南京。2 小時後，搭載張學良的飛機也隨之降落南京機場，並在重重警衛戒護下，這位東北軍閥驅車前往

宋子文在南京郊外的住所。

道歉：那些期待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齣悲喜劇裡，能見到蔣、張兩人相互譴責的人，很快地就發現他們是錯了。伴隨著真實的東方式意外結局，獨裁者和張少帥兩人都因令國家磨難，而接受責難。

張學良公開向蔣介石道歉，他表示自己是粗暴、無禮，也犯了極大的罪。他誠心等待處分，以儆效尤。而只要有利於國家，即使是死也不會拒絕。

同時，獨裁者也堅持接受譴責，蔣自責的表示，由於不良的領導權，做為國軍的指揮官，在這場事件中，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這是來自內人的痛苦。現在你瞭解我的真誠，先前你受到反動者的煽動，誤信我沒有真誠對待人民，我不堅持革命理想，所以我應該為這次的危機受到譴責，必須向全國人民道歉。

不過，周刊卻也認為西安事件留下了一個歷史的謎團：「無論如何，蔣的釋放仍留下了一堆謎團。某些人甚至認為整個事件都是假造的，他們指出由於西安事件促使了獨裁者蔣介石，成為全中國最受歡迎的英雄。群眾並且從而支持南京政府，容忍國軍對 15 萬紅軍，所採取的態度。」¹此時的周刊也發現了蔣介石在西安事後，國共關係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雖然還是努力統一中國，不過他卻也邀請所謂共產黨員出席清明節，在陝西祭奠 4 千多年前的中國人始祖黃帝。中共回應於此，則派了林伯渠與會（林伯渠曾在前清和在 1927 年蔣清黨之前，擔任公職。）其後，蔣貼出 25 萬元懸賞一個人的項上人頭，這個人就是毛澤東。《新聞周刊》形容毛澤東是一位具有德

¹ *Newsweek*, January 2, 1937, V. 10, "CHINA: Dictator Apologizes, Restores His Kidnaper to Post", pp. 10-11.

國學派的前新聞記者，有許多暱稱，例如中國列寧、中國史達林和中國林肯。毛澤東顯然想藉由清明節的代表出席，再度表示只要蔣宣布對日作戰，則他願意暫時放棄馬克思想。²

質言之，周刊認為蔣介石已改變昔日對中共的圍剿策略，準備國共聯手對日軍了。

就蔣介石與白崇禧的關係而言，周刊在該年 5 月 1 日的文本，以當期的外國版頭題分析兩人的互動。《新聞周刊》在當期的國外新聞裡，以一篇名為「當基督徒對手採取黃金法則時，法西斯軍閥的十年夢想已接近實現」“Fascist War Lord’s Ten-Year-Old Dream Nears Reality as Christian Rival Applies Golden Rule”把中國列為頭條，而故事就從白崇禧開始。

年值 42 歲的白崇禧，是一位法西斯主義者，他欣賞德國希特勒，厭惡日本，被喻為中國第二聰明的將軍，主掌中國南方最強大的省分廣西，地位如同古巴的爾根西奧·巴蒂斯塔將軍（Fulgencio Batista）。1926 年，白崇禧選擇遺忘對蔣介石的妒忌，加入國民政府的北伐工作，主要目標是粉碎盜匪和封建主，並且自從 1912 年以來首次的中國統一大業。

此後的十年歷經的是爭吵、失望與鬥爭，終於奮鬥的目標即已近在眼前了。白曾夢想自己是國家的救世主（National Savior），此刻如果能和日本一戰，就有機會證明他的氣慨。4 億中國人不知道這件事，外面世界也不知，不過《紐約時報》駐中國代表卻挖掘到真相。頗受蔣介石信任的該報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報導了一項秘密協議：在 1937 年 6 月，南京政府準備國防會議，成員包括蔣

² *Newsweek*, April. 17, 1937, V. 10, “Oldest Country Shocks Americans, Engulfs Communists”, pp. 22-23.

委員長、前軍部部長白崇禧、現任軍部部長何應欽將軍，以及副軍部部長，體重約 300 磅的基督將軍馮玉祥。這項在四人體制的設計下，能夠對那些最樂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產生嚇阻作用。這個體制也對蔣介石在外交、軍事與戰略的英勇與堅毅表現致敬。³

1929 年，白崇禧曾經視蔣介石擁抱基督教為叛徒，所以在廣西發動一場叛變，最後雖然失敗了，但篤信伊斯蘭教的白崇禧，依然對這位昔日猶如兄弟般的蔣介石，懷恨在心。1931 年當日本開始有系統的入侵華北，如同年佔領東北，1932 年圍堵上海時，蔣的力量卻只能維持自己成為南京政府的獨裁者，但缺乏足夠力量摧毀外敵。

1936 年夏天，白崇禧再度起兵叛變，指責蔣介石對日軍入侵華北的態度是怯懦的。白聚集了 20 萬名德式訓練的精銳部隊，加上 30 萬來自廣東的士兵北上。蔣則以 60 萬大軍嚴陣以待。他們曾是朋友，而今他們也分手了。不過，兩個月後，日軍與滿蒙軍隊聯手入侵綏遠省北部，表面上是想成立蒙古共和國，但實際上是要設立傀儡政權。於是蔣親自飛往北方，打垮了敵人的先鋒部隊，於是蔣白兩人再度合併，蔣的政敵把部隊撤退了。

蔣白雙方最大的考驗與最大的轉折點來自西安事變。當張學良與中共傭兵聯手挾持蔣介石，並要求贖金的代價是：對日戰爭。美國記者阿班 (Hallett Abend) 就形容在這次「怪異」(fantastic) 的危機之中，四川、山東和河北三省的軍閥，曾經施壓白崇禧發動第三次叛變。這些軍閥指控蔣未能成功地發動對共黨的戰爭，以及也缺少採取對抗日本的行動。不過，白崇禧拒絕了這項陰謀。因為他所關心的是如何把中國從混亂的內戰之中拯救出來，而這和蔣的政策是一致

³ 有關阿班在華的報導，可參酌他的著作：《採訪中國》(My Year in China, 1926-1941) (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的。其後，獨裁者很快地從西安被釋放出，並且寬宥了很多概念都從鴉片管中出來的張學良，同時也對曾經視蔣介石為傀儡的中共做出承諾。

最後，白崇禧也得到了回饋，如果執行四人體制的計劃，白就成為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就一位新手而言，白崇禧已證明了他與中國最早的南方共黨，7年的強有力的戰爭。同時，也促進了白崇禧所佔據多山的地區，健全的經濟基礎。他有名的裝甲車，可以在全國最佳的公路上加速奔馳。

就國民政府如何對付煙毒犯而言，《新聞周刊》的分析指出：也報導了南京政府大力整治烟毒犯問題。將近一年半以來，蔣介石建立一套「自我療治」(dope-cure)的醫療體系。他威脅如果不戒除烟癮，就是處死，而期限將在1937年1月1日截止。為了殺雞儆猴，政府甚至公開展示了2000具棺木。寬限期一過，1月3日，天津當局立即處決了130名毒犯和相關罪犯。⁴

從1月9日以後直到了4月17日時，《新聞周刊》才又以專文介紹中國事務。在一篇名為「最古老的國家震驚了美國人，吞沒了共產黨員」(“Oldest Country Shocks Americans, Engulfs Communists”)的文章裡提及50位外國遊客從天津被帶往北平參觀中國古代的天壇，導覽員對訪客表示，這座天壇曾是古代天子祭天之地，禁止平民百姓進入，但現今民主的南京政府則開放給大眾。此時，呈現在遊客眼前的是，有中國士兵猛推了6位被五花大綁的人犯，將他們踹倒在地上。在一陣沈默後，有位官員手握手槍走到其中一位犯人背後，朝著背頸……其後土地上就淌著鮮血和腦汁，同時伴隨著槍聲與尖

⁴ *Newsweek*, January 9, 1937, V. 10 “Dictator Saves Face and Honor, Pardons Kidnaper”, pp. 16.

叫聲。其中一位美國訪客驚嚇跌倒。

這些罪犯都是鴉片吸食者。此刻，外國遊客在這個具有 4 千年歷史的中國土地上，看到了獨裁者蔣介石必須面對超過百年以上無法解決的毒品問題，而這全導因於於大英帝國在 1840 年所引發的中英鴉片戰爭。

不過，根據《新聞周刊》的觀察，如今日本對中國鴉片的販售，已經超越了英國。例如透過它的傀儡政權—冀東政府的殷汝耕，每年走私 1 億 2 千 5 百萬元的走私品，加上不斷增加的鴉片數量。就在處決毒犯的同時，國軍也突襲了 400 位走私者，並且沒入相當的毒品，將其公開燒毀。而在其燒焦的標籤上，依舊可以讀出：「日本製造」的字樣。⁵

就中日關係而言，《新聞周刊》在七七之前，發表了一篇有關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談話，為了解決過去 6 年來中日的緊張關係，乃特派駐華大使川越茂至南京，準備和國民政府進行談判。同時為了拉攏國民政府，日方甚至也準備放棄被中國人視為賣國賊的殷汝耕，也要歸還冀東地區，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中國承認日本對滿洲的主權。不過，周刊判斷蔣介石已經答應中共要對日本的侵略，並且共同宣誓要把「日本逐出中國」。⁶

⁵ *Newsweek*, April. 17, 1937, V. 10, "Oldest Country Shocks Americans, Engulfs Communists", pp. 22-23.

⁶ 殷汝耕，出生於浙江奉化，45 歲的殷汝耕，與獨裁者蔣介石同鄉。殷早年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並試著融入日本文化之中。殷在蔣的北伐裡，給了蔣非常好的印象。不過，在日本入進上海後，殷選擇在其日本妻子，也就是日軍將領之妹的引薦下，前往日方控制的華北。1935 年，任命殷為擁有 700 萬人口的冀東政府主席。由此地，殷汝耕從日本走私 1 億 2 千萬元的貨品，包括毒品、服飾，以及家庭用品等，進入中國。在南京，殷已被痛恨為賣國賊。*Newsweek*, July 3, 1937, V. 10, "Japanese Premier Finds He Is No "Genius Type", pp. 17-18.

參、1937年七七事變至年底《新聞周刊》 對中國的報導

當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中日戰爭於焉展開後，《新聞周刊》對中國的報導立即進入了另一個階段。該周刊所投入的關注與篇幅，已非昔日所能想像。分析周刊在1937年下半年度的文本，共有23篇，其中共有5期以封面故事論述有關中日戰爭；另有8篇是以當期頭版的外國新聞報導。相較於前半年寥寥可數的5篇文本，由此可知周刊對於中日戰爭以及中國新聞的重視。（附件一）

從下半年的文本分析，《新聞周刊》主要集中在四個部分，報導與分析這場世紀戰爭：一，中國戰場；二，日本本土對中日戰爭的反應；三，美國政府與社會的反應；四，歐洲列強與國聯的反應。有關中國戰場如上海保衛戰，華北等戰區的戰爭，以及國聯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已有不少文章分析與討論，本文暫且不論述，僅就周刊如何報導日本國內對於中日戰爭發生後的反應，以及美國政府在這場戰爭的態度。

就日本國內而言，《新聞周刊》主要是報導日本政府、軍方與其國內民眾的反應。當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初，周刊立馬報導了近衛首相的第一時間反應：「立即中斷釣魚與打高爾夫球的假期，立即召開內閣會議。」⁷而此時，這位長久以來被喻為是危機中的偉大領導人，這次卻是崩潰到失眠。⁸

日本昭和天皇則是在三間私人寺廟，著盛裝祈求日軍的勝利，

⁷ *Newsweek*, July 17, 1937, V. 10, "Blanks Shoot Bullets In Japanese Summer War Games", pp. 16-17.

⁸ *Newsweek*, July 24, 1937, V. 10, "Japanese Premier Finds He Is No "Genius Type", pp. 12-14.

接著，在5天的國會開會期間，天皇改穿元帥服與會，很不尋常地指出：基於太陽之子的後代，很遺憾中國不瞭解日本真正的目的。⁹

在日軍備戰與心理狀態，周刊如此記述：

場景拉到日本的東京乃木神社，這裡曾是乃木希典將軍的住宅，乃木曾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裡，占領中國的旅順港。當他的天皇明治死亡之時，乃木選擇自殺。所以，乃木已經代表了日本軍人的德性。被派往出征中國的日本軍官在出發前，在乃木神社祭奠，三呼萬歲。之後，軍官轉向他的父母，挺直地行禮致敬。接著他的親友通過他的面前，磕頭表示：「平安回來！恭禧！」最後，這位軍官葬身於中國。周刊說，類似如此的情況數以千計軍官的行禮過程，發生在全日本各地。所有日軍被訓令，為了保護在大陸的日本同胞，以及摧毀紅軍（Red Dragon）和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參與懲罰性的遠征。

日本人參戰的熱切，正猶如美國在1776年所展現的精神。他們認為不僅是共產主義，甚至是傲慢的西方強權都在威脅黃種人的未來。而蒙昧的中國人並不瞭解於此。因此，這是年輕且有活力日本人的職責，必須讓中國人明白這項事。

至於日本國內社會對於這場突然如其來的中日大戰，也可謂是憂心忡忡，周刊的報導是：

中日兩國的城市，都有可能被捲入戰事之中，即使距離砲火最遠處的東京，也是害怕遭到攻擊。日本的首都公共建築物、各國使

⁹ *Newsweek*, September 6, 1937, V. 10, "Japan Risks Whole Army and Navy in 1,500-Mile Offensive to Assert Supremacy", pp. 5.

館、各地橋樑、工廠和鐵路車站，到處都有日軍包圍著。街上也是充斥著肅殺的氣氛。所有備役軍人必須放棄手上工作，準備入營服役。這樣戰爭的熱潮令人回想到 1914 年的情境。此時，很多婦女團體正在編織軍服，以便加速日軍的運作。留在軍部辦公室的，已被視為是最無用的。這種嚴重的危機程度，可謂是 1932 年上海屠殺以來，昭和天皇首次「授權」派遣日軍前往中國，所留給日本的深刻印象。一般猜測戰爭已經降臨了，小麥、火炭、木材等物資價格一飛沖天。

戰爭造成的代價，乃是經費的支出，這是日本軍人所不知的，但周刊卻非常清楚：

日本每年花費的經費多達 9 億美元，多出每年的收入達 2 億 4 千萬。日本已經負債多達 31 億 5 千萬美元，而且還在逐年增加之中。1937 年前半年，日本出超亦達 2 億 4 千萬美元之多。如今日幣面值 50 分日圓，僅剩 29 分。黃金安全儲備量已在線下，物價高漲亦達危險的高度。

面對這一經濟的衰退概況，素來以自由派而聞名的近衛親王已計劃要求日本國會，增加數百萬的軍費以應付戰爭的需要。¹⁰

當 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國發生美國船艦《帕奈號》(U.S.S *Panay*)，遭受日本攻擊而沉於長江，這個重要的美日外交事件時，周刊則特別刊載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反應：

歷史上沒有一個勝利者猶如日本，竟然以道歉方式讓自己摔了一跤。負責長江戰區的海軍上將長谷川清遞出辭呈。海軍空中作戰指揮官三並貞三被召回東京（周刊判斷可能將被要

¹⁰ *Newsweek*, September 6, 1937, V. 10, "Japan Risks Whole Army and Navy in 1,500-Mile Offensive to Assert Supremacy", pp. 5.

求自殺)。在東京街上，計程車司機、商人、女侍攔下了美國人，再三「道歉」。一位日本婦女甚至來到美國駐日大使館，剪掉頭髮繫上禮儀線，加上白色康乃馨，獻給美國大使，以表達最高的同情之意。¹¹

就美國的中日戰爭態度而言，《新聞周刊》從兩項議題切入分析。其一是中立法案，其二是美國船隻遭受到非法攻擊。先論前者，為了保護美國僑民以及不介入中日戰爭，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宣布，這是一個非常混亂與可怕的情況。他警告 7780 名在中國的美國人，或者離開，或者留在危險之中。¹²此外，有關美國的中立法案。美國曾在 1935 年義大利墨索里尼入侵衣索比亞之前，國會為了避免美國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戰，就預先制定了暫時中立法案(temporary Neutrality Act)，其後進一步成為永久法案。此時授權總統，任何時間只要他發現國外有「戰爭狀態」(state of war)，即可執行中立法案。

中立法案強制規定，禁止對交戰國出口武器、彈藥和戰爭工具，並且禁止對正在戰爭的政府貸款。另外自由裁量權，授予總統能夠擴大對其他貨物的禁運，如棉花、鋼鐵、石油等，同時也禁止美籍船隻為交戰國運送貨物，而且規定戰爭國家必須現金交易。

美國國會的立法有二個直接目的：其一，避免龐大的出口潮導致美國捲入世界大戰。其二，避免與交戰國在公海上產生衝突。就在 8 月份，中日雙方交戰方熾之際，美國國內對於中立法案的執行與否，

¹¹ *Newsweek*, December 27, 1937, V. 10, "The Sinking of a Gunboat Changes Aspect of China War—America Leads World in Warning Japan It Must Curb Military Hotheads", pp. 7-11.

¹² *Newsweek*, September 13, 1937, V. 10, "Hitler Befriends Mikado's Brother While Reich Masterminds Aid in China's Defense", pp. 5-8.

就受到激烈地討論。和平主義者主張，羅斯福總統應該立即發佈中立法案。但現實主義者則執反對意見，因為他們認為中立法案是不公平的，且不必要的。執行這一法案可能有利日本，因為日本擁有大規模的軍需工業，和大量的商船。此舉反而有害於中國。甚至最後會永久損害美國的出口利益。¹³

至於美國船隻遭受到日軍非法攻擊方面，《新聞周刊》報導了在戰爭中，有3次美遭受波及，首先是8月20日的「《奧古斯塔號》(U.S.S. *Asgusta*)」事件：

就在中日交戰之際，美國一艘軍艦《奧古斯塔號》，8月20日下午6時30分停靠上海，並挨著日本《吾妻號》巡洋艦旁停放。美艦上40名水手準備在上岸觀看熱門影片：《我可能活著》(That May I Live)。這時他們不明為何物所擊中，有些人定神後才發現炮擊，另有些人躺在了甲板上，這個砲擊造成了17名士兵受傷，1人死亡。

其次是「《胡佛總統號》(*President Hoover*)」事件，一艘美國籍郵輪《胡佛總統號》受到4架中國戰機3顆炸彈的攻擊，因為中方以為《胡佛總統號》是為日本所有，誤炸導致7名船員受傷，其中2名傷勢嚴重。¹⁴

不過，最為嚴重的美船受創事件，乃以1937年年底的「《帕奈

¹³ 周刊指出，在1937前7個月，美國出口到日本總值達到192050000美元，獲利85%。出口到中國是36955000美元，獲利是49%。見 *Newsweek*, September 27, 1937, V. 10, "U. S. Promotes Neutrality, China Jogs Geneva, Japan Marches On", p. 17.

¹⁴ *Newsweek*, August 28, 1937, V. 10, "Shells, Blood, Humiliation Teach Shanghai Meaning of What Price Pride", pp. 5-7.

號》(U.S.S. Panay)」事件最為著名。在這一件引發美日外交衝突，引起羅斯福總統震怒，美國政府抗議，更導致日本民眾恐懼的事件，《新聞周刊》特別在1937年12月27日的年度最後一期，以「沈沒的戰艦改變了中國戰爭的觀點——美國率領世界警告日本必須抑制一頭熱的軍事」“The Sinking of a Gunboat Changes Aspect of China War—America Leads World in Warning Japan It Must Curb Military Hotheads”，作為外國新聞的頭版，對中日戰爭報導畫下了當年度的句點。

故事表示，從冰天雪地的蒙古草原到中國熱帶海岸地區，日本的國旗在中國可謂是撲朔迷離。美國軍艦在12月底已經駛往青島，因為山東發生暴動，群眾威脅省主席，同時攻擊日本在山東財產，也準備無差別對付外國人，包括在黃海港口避難的300名美僑。

在漢口，當中國官員和外國人望見從地平線日以繼夜飛來的日本軍機時，從南京撤退的政府官員也正在爭辯是否進一步再進行撤退。

在香港，外國人以懷疑的心態，望著英國軍隊正在海岸線架起了鐵絲網，以及清理軍械武器。不過香港附近，90萬名廣州市民卻是恐懼地聽到了遙遠的轟隆聲，日本空軍正在破壞所有的交通設施，日軍已在路上了。

在中南半島的叢林裡同樣也散發著恐懼的情緒，不管是新加坡當地人、或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澳洲的畜牧人，以及菲律賓的棕色人，他們都懷著相同的心情。

由於到處取得勝利，日軍中的沙文主義者宣稱：「現在我們是主人了！西方野蠻人已經逃跑了——團結在躍起的太陽之下吧！——我們將射殺外國人而不受懲罰。我們做得越好，那些入侵者的死傷

就越多。讓亞洲引起注意吧！」¹⁵

的確，日軍的作為的確讓全世界注意了亞洲。羅斯福總統放棄了華府那種令人昏昏欲睡的外交政策，並且以美國史無前例的方式警告日本。他要求日本天皇必須注意有關《帕奈號》沈船事件，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對外國政的警告。

有趣的是，《新聞周刊》報導，當《帕奈號》在海上建造期間，曾經發生火災。當建造完成時準備下海時，它又卡住了無法順利滑下。當時有些迷信的苦力嘀咕：「有鬼在她的身上……她將來會沈下去。」

不過，自 1927 年下船以來的 9 年，這艘雙層、敞艙駁船，並且和其他 5 艘美艦相同，都是以島名為命名的《帕奈號》，歷經了許多暴風雨和戰鬥，始終在江河上保護和平的船隻，免於遭受盜賊，以及中共游擊隊的攻擊，雖然她曾經在一次拯救傳教士行動，受到地方暴動者的撞擊，但還是屹立不搖，也都沒有沈下河裡。12 月 12 日，450 噸級，並配有 3 吋防空機槍的《帕奈號》，就在被圍困的南京城外，前前後後執行任務，盡其所能載送外國籍人士撤離至漢口。

《帕奈號》執行任務的那個晚上，南京市民將會記得就是一萬個猶如魔鬼的日本步兵、海軍陸戰隊和更為野蠻的小軍閥傭兵們，正在城內街道上，因勝利而瘋狂，如同嗜血一般。

下午 1 點 35 分時，《帕奈號》把船艦駛往距離南京 45 公里處的上游江面處，但仍不夠遠。這時離《帕奈號》2000 公尺高的日本軍機，朝著她俯衝而來，一陣掃射，沒有任何的警告。結果是《帕奈號》

¹⁵ *Newsweek*, December 27, 1937, V. 10, "The Sinking of a Gunboat Changes Aspect of China War—America Leads World in Warning Japan It Must Curb Military Hotheads", pp. 7.

艦長海軍少校休斯 (Comdr. James J. Hughes) 受到攻擊，腳折斷了。他也目睹船上的機槍毀壞、破裂的玻璃四處散開，船桅倒下，整個船艦搖搖擺擺。

接著之後的爆炸導致了更多的人員的傷亡，包括一名義大利籍記者桑德里 (Sandro Sandri)、一等倉庫管理員艾因斯明格 (Charles L. Ensminger) 的死亡，以及美國駐南京二等秘書派克斯頓 (Hall Paxton) 等人受傷。

2點5分時，艦長下令人員棄船求生，船上難民們躲到3公尺高的河岸邊，但日軍戰船用槍火監視著任何的一舉一動。接著，3點54分，《帕奈號》沒於江底。當天晚上，所有外國人就盲目地躲在江裡的沼澤地。其後，難民們被安徽省和縣的農民救起。12月17日，難民們在英軍艦《蜜蜂號》(H.M.S. Bee) 的救援之下抵達上海。¹⁶

肆、結語

從上述的分析，吾人得知《新聞周刊》對於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中國，以及這場世紀中日戰爭的重視程度，在質與量的文本報導，皆遠遠超過於先前。同時，周刊以豐富的圖文詳盡論述中日戰爭中所衍生出來的相關議題，例如，日本國內各界對戰爭的反應，以及身為第三者美國對於中日戰爭所採取中立的立場，以及如何維護美國僑民在戰爭場域的權益，甚至連美軍與人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傷害，周刊皆鉅細靡遺的把這些史實呈現給讀者，也為這段中日戰爭史初期，留下來了重要的參考文獻。

¹⁶ *Newsweek*, December 27, 1937, V. 10, "The Sinking of a Gunboat Changes Aspect of China War—America Leads World in Warning Japan It Must Curb Military Hotheads", p. 7.

徵引文獻

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1937年。

阿班 (Hallett Abend)，《採訪中國》(*My Year in China, 1926-1941*) (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附件一

| 日期 | 照 片 | 主 題 | 篇 | 附 記 |
|-------|-----------------------|--|---|---|
| 01.02 | 蔣介石夫婦 | Dictator Apologizes, Restores His Kidnapers to Post | 1 | |
| 01.09 | 槍決人犯 | “Dictator Saves Face and Honor, Pardons Kidnapers” | 2 | |
| 04.17 | 滿洲國成立五周年慶祝大會 | “Oldest Country Shocks Americans, Engulfs Communists” | 3 | |
| 05.01 | 蔣介石、汪精衛 | “Fascist War Lord’s Ten-Year-Old Dream Nears Reality as Christian Rival Applies Golden Rule” | 4 | 當期外國新聞頭條 |
| 07.03 | | “Japanese Premier Finds He Is No “Genius Type” | 5 | 文章指出具有 O 型血，且是自由派的日本新任首相近衛文麿親王，已派任川越茂至南京，準備和國民政府談判結束中日6年的緊張關係 |
| 07.17 | 日軍在天津火車站的移動、宋哲元 | “Blanks Shoot Bullets In Japanese Summer War Games” | 6 | |
| 07.24 | 中國士兵作戰、日本妻子歡送士兵出征、北平城 | “Japan Again Forces Issue, Tightens on Northern Provinces” | 7 | 當期外國新聞頭條，7張照片 |
| 07.31 | 張學良、盧溝橋、美國 | “Rumors and Shells Fail to Impress the Marines” | 8 | 共有9張照片，其中以4張學良被軟 |

| | | | | |
|-------|---|--|----|-------------------------------------|
| | 婦女 Carol Lathrop、美國芝加哥愛國者關注中日戰事、駐紮北平的美國陸戰隊 | | | 禁的照片介紹張在西安事變後的近況 |
| 08.07 | 日本士兵封面照片、蔣介石、中國地圖、日本最老長者、馮玉祥、日軍爬上北平的屋頂、日本櫻花祭、富士山等17張照片 | “Japan Takes Center of Creation, But Both Sides Strive to Avert Much-Feared War” | 9 | 當期封面故事「友誼的感覺」 (“Friendly Feelings”) |
| 08.21 | 中國人在美國高舉抗議日本入侵中國的封面照片、日本少將河邊虎、上海租界的各國駐軍、國軍戰機及其訓練與裝備、日本騎兵訓練等13照片 | “‘Ping Sui’ and a Murder; Man, Nature Again Devastate China” | 10 | 當期封面故事 (“Hands Off China”) |
| 08.28 | 中國婦女親吻孩子的封面照片、上海地圖、南 | “Shells, Blood, Humiliation Teach Shanghai Meaning of What Price Pride” | 11 | 當期封面故事「再度被吞噬」 (“Engulfed Again”) |

| | | | | |
|-------|--|--|----|---|
| | 口通道、廣州軍人、平津車站、日本本土婦女求神問卜 | | | |
| 09.06 | 法國與義大利駐紮上海租界照片、松井石根、中日與台灣地圖、陝西與山西邊界的紅軍遊行支持西班牙的人民革命 | “Japan Risks Whole Army and Navy in 1,500-Mile Offensive to Assert Supremacy” | 12 | 當期外國新聞頭條。周刊特別指出中共並不了解西班牙的真實情況，就如同雖然紅軍宣稱他們是共產黨，但對於共產主義的瞭解也是模糊的 |
| 09.13 | 中國陣亡戰士、上海戰爭照、蔣夫人、秩父宮雍仁親王等13張照片 | “Hitler Befriends Mikado’s Brother While Reich Masterminds Aid in China’s Defense” | 13 | 當期外國新聞頭條 |
| 09.20 | 日軍佔領中國農村、中日戰爭地圖、日將領寺內壽一 | “Shanghai Smoke Obscures Tokyo Aims in North China and Siberia” | 14 | 當期外國新聞頭條 |
| 09.27 | 日本進攻華北地圖、日軍轟炸上海車站、中國難民逃入上海租借地等 | “U. S. Promotes Neutrality, China Jogs Geneva, Japan Marches On” | 15 | 當期外國新聞頭條 |
| 10.04 |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 (Nelson T. | “‘Pei Chee’ Bring Modern War to Modern Chinese Capital” | 16 | |

| | | | | |
|-------|--|--|----|---|
| | Johnson) 在南京漂浮 的大使館船 照、日本秩 父宮雍仁親 向德國無名 英雄祭拜照 | | | |
| 10.11 | 白崇禧、日 本華北佔領 區、朱德與 毛澤東照、 土肥原賢 二、英國抵 制日貨漫畫 | “Nanking Calls Ablest General To Rally North China Armies” | 17 | |
| 10.18 | 近衛文麿 | “Japanese War Machine Pushes on Relentlessly” | 18 | |
| 10.25 | 難民逃亡封 面照片、釋 照空 Trebitch Lincoln、上 海難民、日 本在上海軍 人 | “Soviet Aid Brings New Hope to the Tottering Republic” | 19 | 當期封面故事 |
| 11.01 | 李宗仁照片 | “Chinese Reds Gum the Works of Japanese War Machine” | 20 | |
| 11.08 | 戰場上死傷 的國軍、日 軍轟炸粵漢 鐵路橋樑、 美國出席布 魯塞爾代表 戴維斯 (Norman | “Empty Victories for Japan, Vague Hopes for 9- Power Pact” | 21 | 當期封面故事 “Men Die in China and Talk in Brussels” |

| | | | | |
|-------|--------------------------------------|--|----|----------|
| | Davis)、荒木貞夫將軍 | | | |
| 11.15 | 昭和天皇、上海接嬰處 | “Cold Weather Endangers Japan’s War Strategy” | 22 | |
| 11.22 | 松井石根、英美法三強代表 | “Climax in China” | 23 | |
| 11.29 | 中日戰爭圖、蔣委員長夫婦照片、南京中山陵 | “Siege of Asia: Chinese Defeat Becomes a National Disaster” | 24 | |
| 12.06 | 孔祥熙、日本東京慶祝日德義防共協定成立布條、秩父宮雍仁親王照 | “Arms for China: Foreign Aid Cheers Chiang, Provokes Japanese Rage” | 25 | |
| 12.13 | 日軍在上海佔領區打棒球 | “Japan Hastens Campaign to Control All Shanghai--A Flag and a Grenade Embroil Tokyo With and U.S. Marines” | 26 | |
| 12.20 | 中日戰爭作戰、日軍佔領中國勝利照、汪精衛、中日作戰圖等 | “Disaster at Nanking Spells End of Chinese Republic—The ‘Invincible Liberator’ Escapes; Defenders’ Last Hope Lies in Retreating” | 27 | 當期封面故事 |
| 12.27 | 松井石根、美國《帕奈號》艦長海軍少校休斯(Comdr. James J. | “The Sinking of a Gunboat Changes Aspect of China War—America Leads World in Warning Japan It Must Curb Military Hotheads” | 28 | 當期國際新聞頭版 |

| | | | |
|---|--|--|--|
| <p>Hughes) 照；德日義 法西斯軍隊 遊行；日本 集合埃及、 伊朗、滿洲 國、蒙古以 及中國代表 學習泛亞洲 主義與反西 方的會議 照；日本在 華中部隊的 行軍圖；日 軍在華北傀 儡國的跋涉 圖</p> | | | |
|---|--|--|--|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徵稿要點

- 一、《嘉大應用歷史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為一學術性刊物，以刊登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專兼任講師以上，或已取得博士學位者，未經刊載於其他學術刊物相關學術論著為主。
- 二、本學報為不定期刊，稿件隨送隨審，稿件錄用後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議，決定刊登之期別。
- 三、學報撰稿格式依〈嘉大應用歷史學報撰稿須知〉規定辦理。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以未曾發表者(含網路發表)為限，會議論文請確認該會議無出版會後論文集。論文中牽涉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學報不負文責。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亦或有關瓢竊情形之作品請勿投送，否則一切文責自負，來稿一經錄用，作者不得要求抽回，非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同意，請勿在其他刊物發表。
- 五、依據本學報編輯制度，所有稿件均經學報編輯委員會依論文內容推薦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二位以上審查，期刊編輯委員會依據審查意見，決定刊登與否。所有稿件恕不退還，投稿者請自行備份。
- 六、文稿請註明姓名、服務機關、職稱、電話、地址及 E-mail 信箱，以利連絡。
- 七、稿件打字排版後，將送請作者自行校對。
- 八、錄用之文稿，即致贈當期學報二本及該稿件電子檔，不另致贈稿酬，其版權為本期刊所有。
- 九、文稿稿件之繳交：完稿電子檔一份、完稿書面一份、個人資料表一份(姓名、簡歷、聯絡電話、地址及 e-mail)。寄至：621-03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應用歷史學系收(請於封面附加《嘉大應用歷史學報》投稿字樣)並 e-mail 至信箱，joun_ncyuhg@mail.ncyu.edu.tw。
- 十、聯絡方式；電話：05-2263411#2001、傳真：05-2266540。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

第六期

出版發行／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電話：(05) 226-3411分機2001

傳真：(05) 226-6540

網址：<http://www.ncyu.edu.tw/ncyuhg>

編輯者／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池永歆

編輯委員／呂慎華 吳昆財 吳建昇

涂函君 莊淑瓊 郭至汶

陳希宜 陳凱雯 談珮華（依姓名筆畫排序）

執行編輯／O.Q.

助理編輯／唐偉家

內頁排版／林滋珉 吳佳倩 葉泯

封面設計／秦孝芬 黃若綺 盧淨玉

印刷／金三裕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創刊／2016年11月

刊期／不定期出刊

出版日期／2022年02月

版次／初版一刷

定價／新台幣360元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GPN 2010503215

ISSN 25200216
